南北朝史話

程应镠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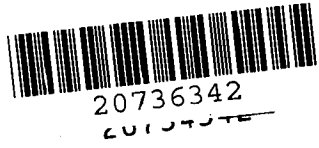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史话

K239.3/1

南北朝史话

程应镠

K239.3
745/2



北京出版社

736342

南北朝史话
程应镠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25,000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8,000
书号：11071·124　定价：0.49元

出版说明

为了普及历史知识，我们出版一套《中国历代史话》，包括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三册。每册有重点地介绍有关断代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给读者提供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叙述上，力求具体生动，通俗易懂，避免空泛议论和没有史实根据的虚构，并附有地图、图片和帝系表，以便广大读者更好地阅读。

这套史话是普及读物，主要是供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阅读，也可供中学历史教师参考。

目　录

开场白……1

第一章　南朝的政治和经济

一　寒人做皇帝……5
二　一个短命王朝……9
三　“托身人上，忽下如草”……11
四　从里司到皇帝……16
五　“风流宰相”……20
六　“寒人掌机要”……22
七　“土断”和“检籍”……25
八　“耕当问奴，织当访婢”……29
九　佃客和部曲……30
十　自耕农的命运……33
十一　“亡命”和“山贼”的暴动……36
十二　两万斛大船……41

第二章　北朝的政治和经济

十三　走向文明……47
十四　道武帝拓跋珪……50
十五　“赫赫武功”……54
十六　盖吴起义……57

十　七　崔浩之死 …… 61
十　八　“新　民” …… 63
十　九　坞壁和坞壁主 …… 66
二　十　“班　禄” …… 71
二十一　“三长法” …… 74
二十二　“均田制” …… 77
二十三　魏孝文帝 …… 80
二十四　“争富”和“佞佛” …… 86
二十五　六镇风暴 …… 91
二十六　河北起义 …… 95
二十七　关陇起义 …… 98
二十八　高欢小传 ……100
二十九　另一个短命王朝 ……104
三　十　宇文泰父子 ……107
三十一　府兵制 ……111

第三章　南朝和北朝的关系

三十二　盱眙之围 ……116
三十三　“交聘”和“互市” ……120
三十四　“金陵王气黯然收” ……123

第四章　南北朝的文化

三十五　宗教思想的弥漫 ……127
三十六　一个不卖论求官的志士 ……132
三十七　魏太武帝和周武帝的灭佛 ……134
三十八　云岗和龙门石窟 ……138
三十九　自然科学的发展 ……142

四　十　农学的珍贵遗产 ……144
四十一　山水诗和《敕勒歌》……148
四十二　从《世说新语》到《颜氏家训》……152
附表一　南朝帝系表 ……161
附表二　北朝帝系表 ……162
后　记 ……165

开 场 白

——略说南北朝

南北朝是两晋以后，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的时期。从公元四二〇年起，到五八九年止，共一百七十年。

这一时期，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更换(宋，又叫刘宋，以别于赵匡胤在九六〇年建立的赵宋)。四个朝代当中，统治时间最长的是宋，最短的是齐；长的不到六十年，短的只有二十三年。这四个朝代，历史上叫做南朝。

宋朝建立后不久，四三九年，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混战的局面。这个统一维持了将近一百年，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接着是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五七七年，北周灭北齐，北方又重新统一。从北魏到北周，北方先后建立的朝代，历史上叫做北朝。

南北政权对立的时期，历史上叫做南北朝。

五八一年，北周的外戚杨坚夺取了帝位，建立隋朝。杨坚即历史上的隋文帝。五八九年，隋文帝灭陈，结束了南北对立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少数贵族和大地主在政治上处于垄断地位。士族（享有种种特权的地主阶级中的上层，其中最有权势的是高门）力量在两晋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门阀统治不但激化了社会阶级的矛盾，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这一时期，不属于士族

的统治阶级中的庶族（一般地主，又叫寒人或寒门，有大有小），在政治上，逐渐显示了重要的作用。南朝以皇帝为中心的寒人当权集团，取代了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

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加深了民众的痛苦。

在北方，鲜卑拓跋部贵族和汉族大地主，围绕着汉化，实质上即封建化问题，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斗争；由于他们的根本利益一致，各个时期，因不同情况，又实行不同的联合。这种联合和斗争，在北方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不论是在南方或北方，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都是比较剧烈的。南北的对立，北方东西的对立，以及南方和北方政权的较迅速的更换，正是这种斗争的集中表现。

南北朝时期，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和贵族手里，大量的劳动力也为这些人所占有。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部曲佃客占领制，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因南北情况不同，北方多而南方少。劳动者被束缚在地主的、贵族的、封建国家的土地上，从事牛马一样的劳动，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农民自耕的土地，面积很小，国家繁重的赋役却落在他们的身上。北魏“均田制”实行后，北方自耕农的数目增加了。

劳动者被迫逃亡，或者举行起义。南朝境内的起义，一百四十年间较著名的多到四十次；北朝起义的次数更多，规模也更大。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不但冲击了封建地主和贵族的统治，而且推动了拓跋部的封建化，加速了北方各族的融合。

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市场上出现了较多的商品。商品中农产品占了很大的部分，另一部分是手工业产品。政治军事的中心地，同时成为商业贸易集中的

城市。南方优越的地理条件便利了航运交通，又为商业发达提供了有利的因素。

封建国家依靠着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市税、关税、估税（相当于近代的营业税）的收入，供养大小官吏，建筑豪华的宫殿、佛寺和坟墓，满足地主、贵族荒淫无耻的生活享受。

因长期战乱而凋敝的北方经济，在北魏统一以后，特别是在洛阳重建的前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北魏后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一时呈现着繁荣的景象。和南朝相比，北朝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的赋税。北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除了因统一而来的社会比较安宁外，“均田制”的实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宗教在这一时期成了地主阶级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社会的黑暗，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残杀，对于一辈子勤劳和贫困的人们，宗教让他们在人世生活中温顺和忍耐，用博得上天恩赏的希望来安慰他们；富贵的变幻无常，死生的飘忽莫测，宗教不仅非常廉价地给了那些剥削者以进入天堂的“门票”，还使他们妄求一个永不凋谢的锦衣玉食的长生。

道教、佛教的香烟弥漫着南北，道观和佛寺随处点缀着如画的河山和瑰丽的城镇。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往往和宗教发生关系。矛盾的真相，往往被宗教这一神秘的网络隐蔽起来。

农民在宗教的掩蔽下，反抗强暴，在统治阶级的历史书里，被称为“妖贼”。

北朝的宗教斗争，比南朝剧烈。非汉族的皇帝，往往通过宗教来表示对汉族大地主的态度。道教被认为是汉族的宗教。佛教信奉的神，被看作是“胡神”。因此，北朝佛教和道教的斗争，直接牵涉到所谓“胡”汉的斗争。

佛教和土地结合，产生了有势力的僧侣。当这个势力影响到

皇权的巩固时，皇帝又以灭佛的名义来消灭这个势力。

宗教又影响着哲学、文学和艺术。在这些意识形态的领域里，也存在着斗争。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南朝发生的神灭和神不灭的辩论。

为佛教服务的雕塑、绘画，这一时期，有着辉煌的成就，成为我国古代艺术的重要遗产。

第一章　南朝的政治和经济

一　寒人做皇帝

——刘裕和他的子孙

东晋末年，一个出身地主阶级下层的人取得了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

这个人叫刘裕，小名寄奴，历史上称为宋武帝。四二〇年，他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宋朝，做了两年皇帝，死去了。

刘裕是以镇压孙恩起义起家的。在镇压孙恩起义中，他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从一个普通军官，掌握了东晋兵权。在他之前，不少出身高门大族的野心家，觊觎过司马氏的皇位，远一点的象王敦，近一点的象桓温，都失败了。四〇三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取代司马氏做了皇帝，只不过一百天，他和他的追随者，就被刘裕打倒了。

东晋偏安，祖逖、庾亮、殷浩、桓温都曾北伐。他们不是得不到士族的支持，便是坐失时机，都没有成功。这时，北方的南燕和东晋接壤，经常侵扰东晋的边境。南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占有现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一部分地方。羌族在关中建立的后秦，统治着现在陕西、山西西南部和河南黄河以南的地方，也和东晋为敌。四〇九年，刘裕北伐南燕，长驱过了大岘（现在山东沂县北），攻下南燕都城广固（现在山东益都县西北），

俘获南燕主慕容超，取得了青州。四一六年，他分兵五路，水陆并进，举行又一次北伐。不到一年，汉魏（曹魏）以来的名都——洛阳和长安，都被他打下了。长安自三一六年被匈奴人刘曜攻陷，盼望着汉族的旌旗，已经一百零一年了。后秦主姚泓，被俘后送到了建康（现在江苏南京市，东晋的都城，后来南朝也在这里建都）。北伐的成就，提高了刘裕的威望。

在消灭南方割据势力方面，刘裕也做得很出色。从四一一年起，五年当中，他先后打败了卢循、刘毅、谯纵和司马休之，南方出现了一百多年来没有过的统一。当鲜卑拓跋部征服了黄河流域，继续向南发展的时候，统一的、比较强盛的宋朝把它阻止在长江以北，使比较发达的江南经济和文化，免受破坏，得以继续发展。

东晋司马氏的政权，是依靠南北大族，在汉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刘裕帝业的经营，与此却不尽相同。

西晋灭亡，北方士民纷纷避难来到江南。刘裕的祖先也在这时候迁到长江边上的京口（现在江苏镇江市）。京口一带，原来地广人稀，自从北方流民来了，逐渐成为东晋的重镇，号称北府。居民强悍，勇于从军。东晋在这里招募军队，练成一支劲旅，叫做北府兵。北府兵在淝水之战立过功勋。这一支军队，后来被派去镇压孙恩起义。当时，刘裕是刘牢之的部下。刘牢之部下的其他军官，抢掠财物，军纪败坏，只有刘裕约束部属，纪律比较严明。

刘裕年轻的时候，种过地，砍过柴，捕过鱼，做过小买卖。京口有一家姓刁的大族，为首的叫刁逵，残害地方，称为“京口之蠹”。刘裕也受过刁家的欺侮，吃过苦头。有一次，他和刁家人赌博，输了，还不起赌债，还被刁逵缚在马桩上。

从刘裕的经历看来，他是属于地主阶级中的下层，所谓寒门的。历史上说他“奋起寒微”，正表明他的出身和那些高门士族

的子孙不同。

刘裕的追随者，大多数也和他一样，没有门户可以依傍。他最亲信的刘穆之，在得志之前，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立过许多战功的王镇恶，是前秦宰相王猛的孙子，前秦灭亡后，流寓荆州，当他被刘裕提拔起来的时候，不过是个靠近边境的小县县令。

地主阶级中这些所谓的寒门，在政治上，不容易找到出头的机会；时机一来，便奋力夺取政治权力，争取富贵荣华。刘裕是这样，他的追随者也是这样。阻碍他们青云直上的，便是那个占统治地位的士族。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给了士族以沉重的打击，许多士族的头面人物，被起义军杀死，士族的腐朽无能，也充分暴露，这就为寒门在政治上开辟了活动的天地。

桓家是东晋的世家大族，刘裕讨灭桓玄，把这个士族的头目拉下了台。名门出身的王愉、王绥、谢混、郗僧施，在桓玄垮台之后，也一个个被刘裕杀掉了。这些人被杀，罪名不完全一样。在他们心目中，刘裕是个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小人物。他们对刘裕的态度，都非常傲慢，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刘裕取得了政治上的最高统治地位，士族的势力，日渐衰落，象过午的阳光，逐渐西斜。但这一过程持续了二百年，直到唐初，经过了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的涤荡，才告结束。

刘裕临终的时候，顾命大臣中有一个叫谢晦的人。刘裕对儿子说，谢晦这个人，很有才干，假如将来有人反对你，那就必定是他。谢晦是谢安一家的人，东晋头一号的名门出身，和这个出身寒微的皇帝之间，猜疑似乎特别深。

士族的统治地位被削弱了，专制主义的皇权重新抬头。宋以后的齐、梁、陈，和宋相比，各有一些不同，但在这一点上，却基本一样。

刘裕死后，他的继承者多数是暴君。文帝刘义隆好一些，但这个人猜忌、犹疑，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他性格上的这些特点表现得很突出，而这些特点也就给了当时事变以影响。最后，他竟死在自己亲生儿子的手中。

比暴君更恶劣的，是一些衣冠禽兽。前废帝刘子业，就是其中的一个。刘子业十六岁即帝位，不到一年便被杀死。在南朝君主中，他是狂暴淫乱的一个典型，集中表现了地主阶级残暴丑恶的本质。他把已经出嫁的一个姑姑纳入后宫，却扬言她已经死了。他姐姐山阴公主对他说："你后宫里女人以万计，我却只有一个男人！"他就为这个淫恣的妇人置了三十个"面首"（男妾）。刘子业还把自己的叔伯、兄弟的妻子和自己的姐妹聚在一起，强使他的左右去侮辱她们。刘铄的寡妇江氏抗拒，刘子业便把她三个儿子杀死。

南朝皇帝和刘子业一样的不少，刘子业不过是一例。

宋朝统治了六十年，六十年中，争权夺利的"骨肉相残"丑剧一出接着一出。刘裕九个儿子，善终的只有一人。文帝十九个儿子，孝武帝刘骏二十八个儿子，明帝刘彧十二个儿子，死于"骨肉相残"的十有八九。宫廷里密布着疑云、暗剑，公开叛乱和平叛的战争几乎没有间歇地进行着。宋朝的文武大臣，也往往在莫须有的罪名中被诛戮。曾经跟刘裕北伐，打到长安，为宋朝立过许多汗马功劳的檀道济，在刘裕死后，担负了守边重任，被北魏认为是最有谋略的一员大将，就是被宋文帝杀害的；那个为孝武帝父子出过死力的沈庆之，到了八十高年，也不免于横死。

当刘裕的子孙争权夺利，"骨肉相残"的丑剧愈演愈烈的时候，一个不甚为人注意的将门之子成了权力斗争舞台上的主角。这个人叫萧道成，他建立了齐朝；距刘裕当皇帝时，差不多已经六十年了。

二 一个短命王朝

——齐朝兴亡

萧道成当了皇帝，不过两年多，死了，历史上称为齐高帝。他临死时说："我本来是个布衣，想不到有做皇帝的一天！"

这并不是假话。他在宋朝末年，官一天一天做大了，还是谨慎小心，不敢得罪那些士族首领，给他们写信，也表示自己是个常人，没有远大的志向。

宋朝的"骨肉相残"，造成了萧道成做皇帝的机会。宋明帝在位的十多年间，宋朝廷的兵权逐渐落到了萧道成的手里。

宋朝自元嘉（宋文帝的年号）末年以来，赋税一天天加重，徭役一天天增多。宋孝武帝以后的皇帝，生活奢侈浪费，贪财好利。孝武帝拆掉刘裕生前住过的房屋，重盖了一座叫做"玉烛"的新宫。有人在他面前赞美刘裕的节俭，他却以为祖父本来是个"田舍公"，住那样的房屋已是过分，他自己可不能再那么寒伧下去了。州郡官僚，卸了职回到京城，本来要向皇帝贡献财物；孝武帝不以这种贡献为满足，还要强迫他们赌博，不掏光这些人的口袋，总不肯罢休。这一批地方大吏，便转过来从老百姓身上求得补偿，对老百姓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叫他们血肉都尽。这又使萧道成说空话笼络人心，得到了借口。

这个平日以常人自居、谨慎小心的人，当时机到来的时候，却表现得异常果断。后废帝刘昱（即苍梧王，宋明帝的儿子）被杀，召开大臣会议，商讨权力应当谁属时，皇族刘秉、士族领袖袁粲略一迟疑，萧道成便"须髯尽张，目光如电"。他的同谋者王敬则立即拔出白刃，在旁跳着、嚷着："天下事皆应关萧公！

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刀！”并迫不及待地要萧道成马上登上皇帝宝座，说：“事须及热！”

萧道成和这个小吏出身的王敬则毕竟有所不同。他幼年曾跟儒学大师雷次宗读过儒家的经典“三礼”和《左氏春秋》，他认为要登上皇帝宝座，还得依照历史惯例，演完一出“禅让”的戏。

这出戏差不多演了两年。当王敬则押着宋朝末代皇帝——顺帝刘准，演出最后一幕“禅位”的时候，十三岁的皇帝问王敬则：“我要被杀了吗？”并且涕泪涟涟地喃喃着：“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

萧道成做皇帝以后，一心盘算着为子孙建立万世的基业。有一天，他召见当时的学者刘瓛，问久安之道。刘瓛说，以宋为戒，虽危可安；否则，虽安必危。刘瓛的话，很合萧道成的心意。他临死嘱咐儿子要节俭，要任用贤才，要对亲族宽厚。但事情的发展，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鉴于宋朝以奢侈亡国，萧道成提倡节俭。宫廷里用的器具，铜的改用铁，黄金的也改用铁，还把“玉导”（古代男子头上的饰物）打碎，表示要杜绝奢侈的根源。但是，他不可能杜绝奢侈的根源，也不可能认识奢侈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的儿孙似乎故意捉弄他，几乎个个奢侈。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萧道成死后，他的儿子萧赜继位，历史上称为齐武帝。在萧道成经营帝业时，萧赜是个得力的助手。他遵照父亲遗命没有杀自己的兄弟。

萧赜死后，他的堂弟萧鸾（齐明帝）用阴谋夺取了帝位，就大杀齐高帝和齐武帝的子孙，走上了宋朝“骨肉相残”的老路。这也是萧道成没有料到的。

萧鸾内心充满了忧惧，他的灵魂是怯弱的。做了许多坏事，却妄想“鬼神”赐福给他，相信那些自称能和“鬼神”打交道的

妄人。在他看来，人世间无处不是陷阱，无地不是网罗；因为他自己便是个惯于设陷阱、张网罗的人。他不敢轻易地离开自己布置的小天地，每逢出外，往东便声言往西，往南便声言往北。他杀高帝、武帝子孙，一定先要烧香礼拜，呜咽流泪一番才下手。他生了病，也不敢声张。临死前还对儿子东昏侯萧宝卷说，要记住隆昌（齐郁林王萧昭业的年号，为萧鸾所废）的教训，“作事不可在人后”，要先下手为强。萧鸾在位四年。

萧宝卷在位二年，把他父亲留给他的文武大臣，差不多杀光了。这一次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火，从建康内外，延烧到了长江中部和长江下游的一部分地方。

五〇一年，雍州刺史萧衍打进了建康。地方武力打败了中央武力，这在南朝还是第一次。

五〇二年，萧衍建立梁朝，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为梁武帝。

萧道成建立的齐朝，是一个短命王朝，前后不过二十三年。

三　“托身人上，忽下如草”

——梁武帝的统治

“托身人上，忽下如草”，有人这样批评梁武帝。这个批评很尖锐，意思是：当皇帝的，却把老百姓看得象草芥一样！

梁武帝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活到八十六岁。五四九年，叛军侯景打进台城（建康的宫城），他作过这样的自白：“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真实地流露了无可奈何的心情。这时，他又老又病，想吃蜜，也要不着，最后，饿死了。

侯景本来是东魏的大将，投奔梁朝，后在寿阳（现在安徽寿县）造反，一直打到建康，攻占台城。这个人很野蛮，很残暴，

到了江南，给南方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造成这场灾难，梁武帝当然逃不了历史的责任。但有些历史家却仅仅怪他不应当接受侯景的投奔，对于他的“节俭”、“勤劳”，还不胜赞美。

7

说起他的节俭，穿的是布衣，而且洗了又洗；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据说，他在位时，宫女都不穿拖到地上的长衣；祭天地祖宗的时候，也不用牲。但他的宠臣，山珍海味吃不完，腐烂了，一车一车拉出去抛掉，一月十几车，他却不闻不问。有人向他提意见，说风俗奢侈得很，应当提倡节俭，他便以自己省吃俭用做挡箭牌，叫提意见的人不敢再开口。

说到勤劳，他在冬天五更起来办事，手冻裂了也不肯停笔，的确也算是勤劳的。但他办了些什么事呢？在建康，他建造了很多佛寺，使佛寺一时增加到五百多。最大的同泰寺，就是他造的。他早晚到寺礼拜，还四次舍身，表示要当和尚，不做皇帝了。但是每次舍身，都由群臣赎了出来，赎身钱共花了四万万文。钱是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又通过群臣的手，落入了僧侣的口袋。

萧衍到了晚年，信佛信得入迷，每次判决犯人死刑，都要装模作样，整天表示不高兴。后来南宋有一位历史家问道：梁武帝啊！你在洛口（现在安徽怀远县境）打败仗，死了多少人？筑浮山堰（现在安徽凤阳县境），死了多少人？你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侯景之乱，长江流域从西到东，无辜的老百姓，死于兵火、死于饥饿的，又有多少呢！你判个把死刑，却整天装着不高兴，这是一个大欺骗啊！你不但是儒、道的罪人，也是佛教的大罪人！

这位历史家问得有道理，萧衍耍的一套花招，的确是个大欺骗。不过萧衍倒不是什么儒道佛教的罪人，而是残害劳动人民的大罪人。

梁朝有个人叫鱼弘，做了几任郡太守，公然对人说，我做太

守，郡中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中民庶尽。这样的郡太守，当然不只鱼弘一个。“四尽”之下，无辜的老百姓被迫而死的，在梁武帝统治的近五十年当中，真不知有多少！

有一次，梁武帝去南郊祭天，一个老人拦住他的车驾，对他说：“你对老百姓用法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能反过来，就好了。”

梁武帝怎么能“反过来”呢？他关心的是经历了长期富贵荣华的高门大族，是在政治上显示了力量的寒门豪家，是萧氏一门的王侯。“托身人上，忽下如草”，他和宋、齐两朝的皇帝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他更千方百计地要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想把士族和寒门之间的关系摆摆平；想变皇族之间的“骨肉相残”为“骨肉恩爱”。

谢朏在齐朝是士族首领，和齐高帝萧道成不合作，险些儿送了性命。萧衍做了皇帝，请谢朏出来做官。谢朏轻舟到了建康，萧衍十分欢喜，说：“这个象严子陵一样高洁的人，竟出来和我共事了。”谢朏在梁朝当了大官，却无所建树，有人很失望，梁武帝对他却仍非常礼遇，死了，还亲自去吊丧。这就是萧衍要摆平士族和寒门之间关系的一个例子。

但士族本身的发展，已日薄西山。熟悉当时士族情况的颜之推，对于这个阶层的腐朽，有过生动的描写。他说，江南朝士，至今传了八九代，穿宽大衣服，戴大帽子，着高底鞋，出门坐车坐轿，走路要人扶持。有个建康县令王复，看到马又嘶又跳，吓得脸色都变了，对人说：“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是马呀！”许多士族子弟，不学无术，自己不会作文赋诗，为了装门面，求职位，只得请人代笔。

对于士族，梁武帝照顾备至，但实际政务，他却只能依靠那

些寒人。被称为“三蠹”的朱异、徐驎、陆验，都是寒人出身，当时都炙手可热。侯景造反，便以杀这三个人为名。在梁朝，寒人政治上的势力仍旧占上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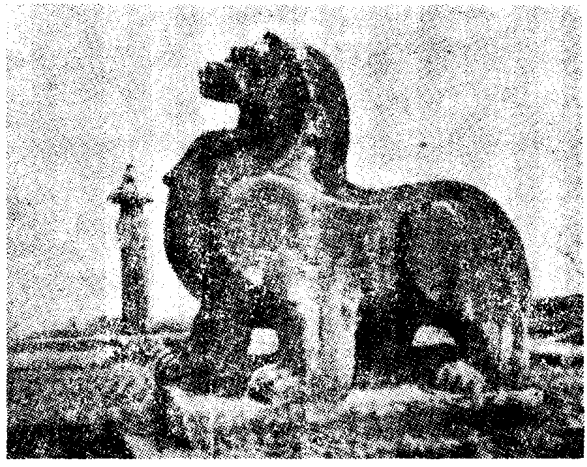
梁武帝对于兄弟子侄，用放任他们对老百姓吸膏吮血的办法，来实行“骨肉恩爱”。他的兄弟临川王萧宏，财物满库满仓。近一百间仓库，三十多间藏钱，一间一千万，共三亿以上；剩下的仓库，装满了布、绢、丝、漆、蜡等杂货。他的儿子萧纪在益州做刺史，有一万枚黄金铸成的金饼，五万枚白银铸成的银饼，每饼各重一斤。

梁武帝还把兄弟子侄派往各重要地区去镇守，让他们掌握实际权力，拱卫皇家。宋、齐两朝，宗室王侯出去做地方官，都要受到被皇帝派去的典签的监视（典签本来是个管理文书的小官，从宋朝后期开始，成为实际掌握地方权力的皇帝耳目）。梁武帝废除了这个办法，给了宗室王侯以实权，希望他们不要走宋、齐两代骨肉相残的老路。

五〇六年，梁朝北伐，萧宏做统帅。大军到达洛口，器械精新，军容之盛，被魏叹为数十年来所未有。但萧宏这个人，却胆小如鼠。一天夜里，洛口暴风雨，吓得他逃回建康，器械全部丢失，军队损失了将近五万。但萧宏并没有因此受到处分，过了几十天，还升官晋级。只要是梁武帝的“骨肉”，临阵脱逃，也是不办罪的。

梁武帝早年无子，过继萧宏的儿子萧正德做嗣子，后来有了太子萧统，萧正德还本，封西丰侯。萧正德失去皇位的继承权，心怀不满，外逃投魏，自称是被废的太子去避祸，魏待他很薄，又逃了回来。梁武帝对这个投敌的侄子，只哭着教训了一番，就恢复了西丰侯爵位。他的儿子萧综，在前线指挥作战，临阵向魏军投降，冒称齐东昏侯萧宝卷的亲生子，和梁武帝萧衍有着杀父之

仇。梁武帝对于这个儿子的反叛，在一阵惊骇之后，绝了他的属籍(在萧氏家谱上除了萧综的名)。但不久，这个逆子还是被饶恕了。死后，有人把他的尸骨偷送至江南，梁武帝还把它埋葬在祖坟旁边。只要是梁武帝的“骨肉”，投敌，同样也是不办罪的。



梁朝墓石辟邪

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八年，就是这样用尽了心思来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结果是：士大夫埋怨他“爱小人而疏士大夫”；小人呢，有了权，有了势，不但在士大夫面前，不甘拜下风，在生活享受上，也穷奢极侈，以至台城被侯景叛兵围困的时候，城内有兵，竟找不到带兵的人。整个统治集团，在糜烂生活中，失掉了御敌的能力。

侯景渡江，不但有心怀不满的野心家萧正德做内应；觊觎帝位的人们，也顿兵台城之下，观望形势。有个叫柳津的人，和梁武帝一同被围困在台城。他的儿子柳仲礼在台城外做统帅，却按兵不战，置酒作乐。有人说柳仲礼接受了侯景的贿赂，有人说柳仲礼想自取富贵。当时，梁武帝的儿子邵陵王萧纶也带了援兵驻

736342

扎在城外。柳津悲哀地对梁武帝说："你有邵陵，我有仲礼，不忠不孝，贼何由平?!"

"骨肉恩爱"，还准备了更丑恶的骨肉相残。

梁武帝死后，一幕勾结西魏，骨肉相残的丑剧，就由他的儿孙来扮演，其中，萧詧就是一个典型。

侯景之乱和梁末诸王的混战，使江南遭受了一次大破坏，经过二十几年，还没有恢复。

陈霸先讨平侯景，立了大功。五五七年，代梁称帝，建立了陈朝，历史上称为陈武帝。

四 从里司到皇帝

——陈朝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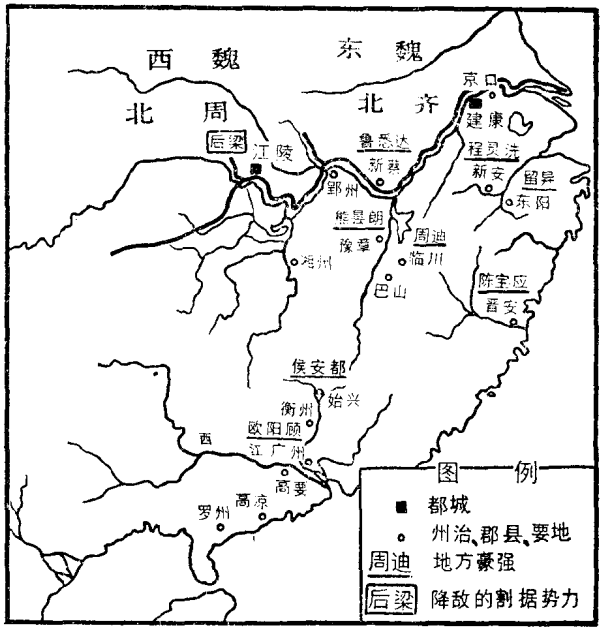
陈霸先家世寒微，早年做过长城县（现在浙江长兴县）下若里的里司（南朝制度：县下有乡，乡下有里。里司管一里的事）。长城县属吴兴郡，是他的故乡。他的祖先在西晋末年从颍川郡迁到长城来，已经二百多年了。继里司之后，他做过油库吏、传令吏，这都是当时士大夫瞧不起的低下的吏职。

五四九年，梁武帝在台城饿死的时候，陈霸先正做始兴郡太守，便在始兴起兵，声讨侯景。五五一年，排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的阻挠之后，他率领军队到达湓城（现在江西九江市），和讨伐侯景的主力军王僧辩会师。第二年，打败了侯景，他奉令镇守建康附近的重镇京口。

陈霸先从五四九年起兵声讨侯景，到五五七年做皇帝，前后不过九年。这九年当中，南朝统治者内部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变化。

侯景之乱，梁朝长江以北的土地，被西魏、北齐占有了；长

江以南，到处都是割据的势力。五五二年，梁元帝萧绎在江陵（现在湖北江陵）称帝的时候，听从他的号令的地方，不过千里；梁朝管辖的民户，不满三万。



梁末地方割据势力图

西魏、北齐时时在等待机会向南扩张，梁朝的割据势力，又都想依靠它们做外援，来消灭对方，不惜对它们卑躬屈膝。五五四年，萧詧勾结西魏，杀了他的叔父梁元帝萧绎，在西魏卵翼之下，成立了一个江陵傀儡政权——后梁。萧詧向西魏、北周称臣，苟延残喘了三十二年。

梁元帝死了，镇守建康的大臣王僧辩和在京口的陈霸先把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接到建康来，立为皇帝，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汉族政权。

西魏的力量扩充到了南方，北齐也不甘示弱，想在江南搞一个同样的傀儡。寒山之败被俘的梁武帝的侄儿萧渊明，这时便被北齐利用，捧出来立为梁朝皇帝。北齐派兵把萧渊明送到长江北岸，要王僧辩接他回建康。

王僧辩这个人反复无常，在北齐的威逼利诱下，萧渊明被迎回建康，做了皇帝。

王僧辩这种行为，是很不得人心的。当他迎立萧渊明的时候，陈霸先从京口屡次派人和他争论，反对他向北齐屈服。陈霸先对他亲近的人说："我和王僧辩都是朝廷大臣，王僧辩要投靠'戎狄'，到底是为了什么？"

北齐军政大权，掌握在鲜卑族的统治者手里。对南方汉族政权来说，向北齐屈膝，就是向鲜卑贵族屈服。在这个问题上，陈霸先和王僧辩的立场是不同的。最后，陈霸先从京口起兵，把王僧辩袭杀了。

王僧辩死后，他的党羽杜龛占据吴兴，王僧智占据吴郡，任约和徐嗣徽兄弟占据建康附近的地方，反对陈霸先。北齐也从长江北岸出兵，在任约、徐嗣徽接应下，从采石渡江，占领了建康的军事要地石头城。

对垒的双方，以兵力来说，陈霸先是弱小的；但在政治上，陈霸先抵抗北齐却得到民众的支持。江北民众，受不了北齐的压迫，当陈霸先从广陵（现在江苏扬州市）撤回京口时，跟着他南渡的便有一万多人。

北齐兵过江之后，先在秦淮水南打了一个败仗，后来又被包围在石头城里。北齐被迫向梁朝求和，朝臣都主张接受和议。那时，建康的防守力量还薄弱，粮食和供应也有困难。陈霸先同意讲和，但对朝臣说："齐人求和是被迫的。他们总认为自己强，我们弱，一定不会守信用。或者，他们不久便要撕毁和约，发动战争。"

和议订结还不到三个月，北齐果然发兵十万，进攻梁朝。

这三个月时间，对北齐并没有什么好处。杜龛在吴兴的叛乱被削平了，王僧智也只剩下一条投奔敌人的可耻道路。强加在梁朝民众身上的战争，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愤怒。北齐的假和平阴谋，被进攻的事实揭穿了。

战争在建康近郊剧烈地进行着。梁朝民众，听说陈霸先军队粮食困难，就用荷叶包饭，夹了鸭肉，去慰劳军队。北齐军十万，被打得七零八落，逃回江北的不过二三万。带兵的将帅，自萧轨以下，几乎全部被俘。徐嗣徽兄弟被打死了。

战争的结果，使南方民众避免了一次鲜卑贵族的蹂躏，汉族政权也得到了保持。

从王僧辩被杀，到第二次大败北齐兵，前后不过十个月。这十个月是南方先进的汉族文明能否保持的关键时刻。在这时刻，陈霸先坚持了汉族国家的利益，反对了投降，反抗了强暴。

陈霸先在五五九年死去，做皇帝的时间，实际上不满三年。他有许多没有完成的事，在他的继承者陈文帝陈蒨、陈宣帝陈顼手上完成了。侯景乱后的地方割据势力，当陈霸先在世的时候还是很跋扈的。首先是盘据在湘州、郢州(现在湖南、湖北境内)的王琳。这个王琳，既勾结北齐，又勾结北周。陈文帝消灭了王琳的割据势力，王琳逃到北齐去了。割据现在江西一部分地方的熊昙朗、周迪，割据现在福建一部分地方的陈宝应，割据现在浙江一部分地方的留异，也先后被陈文帝铲除了。其他一些割据地方的豪强，也次第对陈朝表示了归顺。陈宣帝时，北齐灭亡，陈朝疆域，曾经一度恢复到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但不久失去淮南，始终局促在长江以南、现在宜昌以东的地方。南朝四个王朝，陈的统治区域最小。

陈宣帝的儿子后主陈叔宝，是南朝最后一个皇帝，是一个荒

淫的君主。他在位时，南朝整个统治集团，在豪侈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放纵中，沉溺下去，腐烂下去。

五八九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

五 “风流宰相”

——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一

西晋末年，从北方逃到南方大约有一百家大族，他们是东晋统治阶级的上层。这些大族，就是当时所谓的高门（又叫甲族）。王、谢两姓，是高门的首脑。王导、谢安是第一流的名士，又是东晋著名的宰相，掌握着国家统治实权。

南朝时，高门在政治上不象过去那样吃香了。东晋末年，统治阶级内部风风雨雨，谢安的孙子谢混，便死在寒门出身的刘裕手里。谢玄的孙子谢灵运，是个著名的诗人，在宋朝统治比较平静的日子里，因为不满朝廷，被流放到远方，后来又因为谋反，被宋文帝刘义隆杀掉。王导在钟山，有赐田八十顷，传了将近二百年，梁武帝萧衍在钟山造佛寺，要征购这批土地，王家不同意，还是被强买了去。

两晋以来，官分清、浊。待遇好、事情少的官位被认为是清官，相反的就是浊官。高门子弟，向来只当清官，不当浊官。梁武帝打破了这个老规矩，认为官以人而清，不一定要用甲族。王筠被任为尚书殿中郎，这本是个清官，只是不如秘书省和东宫的官那样清闲，王家人过去是不做的，但王筠也还是做了。

梁武帝在南朝君主当中，对于士族，还算是特别照顾的哩！

王俭在齐朝做宰相，说“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人们说他以谢安自比，实际上，他只有位，没有权，比不上谢安。和

他同时，有个人叫茹法亮，地位比他低得多，不过是个中书舍人，但很得皇帝信任，因而“势倾天下”。王俭对他又妒忌，又羡慕，对人说：“我虽然地位很高，但权力怎及茹公！”另外，还有一个王敬则，和王俭同时拜三公（三公是当时最高的官位），王俭也不禁感慨系之，说：“想不到我这个人竟和王敬则被同等看待！”

王俭出身高门，茹法亮和王敬则却都是寒门出身。以“风流宰相”自况，看来，不过是王俭的牢骚。南朝的国家大权，已经不全在高门的掌握中了。

但高门在社会上仍旧有特殊的地位，保持着特殊的生活方式。高门和寒门的界限，还是很分明的。

魏（曹魏）晋以来，高门子弟，穿宽袍大袖的衣服，手里拿着麈尾（象蝇拂，柄上扎一把麈鹿尾，柄用玉、犀角或其他质料的东西做成），谈今说古，旁若无人。齐朝陈显达，是个开国功臣，因出身寒门，常常担心富贵会给自己带来祸害，告诫子弟不要学富贵人家的样子。他的儿子陈休尚，手里拿着麈尾，俨然象王、谢之家出身的少年，他见了，便说：“这是王家、谢家的派头，你不能这样！”说完，从儿子手里把麈尾取来，烧掉了。

陈显达不敢让子弟学富贵人家的样子，高门的子孙却故意装身分、摆架子，好象他们和别人之间，果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似的。

宋朝有个中书舍人王宏，很得宋文帝刘义隆的欢心和信任，文帝对他说：“你想做士大夫，一定要和王球同坐。你去拜访他，就说是奉了我的命令，和他同席坐吧。”王宏见了王球，遵照文帝的吩咐，就王球的坐席坐下。王球却举起扇子，阻止他，说：“你不能这样没有礼貌呀！”在王球看来，和这个出身寒门的王宏同席而坐，是有失身分的。王宏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告诉宋

文帝，文帝说："既然如此，我有什么办法呢！"

齐朝的纪僧真，向齐武帝萧赜要求做个士大夫。齐武帝说："这件事，我作不得主，你去找江敩和谢瀹。"纪僧真见了江敩，和王宏一样，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对齐武帝说："士大夫不是皇帝命令得了的！"

魏（曹魏）晋以来的高门，到了南朝，一方面象王俭那样，地位高，权力小，自称"风流宰相"来解嘲；一方面象王球、江敩那样，装身分，摆架子，神气活现，俨然不可侵犯。但都不过说明：高门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已经起了变化，不是变高，而是变低了。

六 "寒人掌机要"

——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二

魏（曹魏）晋以来，统治集团定了九个等第来评选人才，列在上等的叫上品，下等的叫下品。评选的标准，主要是门第。上品为高门所独占；寒门出身的人，只能列入下品。等第不同，担任的官职也不同。上品由清官出身，一直当清官；下品由浊官出身，一直当浊官。由浊官出身的寒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转做清官的可能。评定人才等第的官，叫做"中正"；州有大中正，郡有小中正。中正这个官，不是门第显赫的人是当不上的。

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门阀统治的产物，也是门阀统治的护身符。

统治阶级中的寒门，在这个制度下，处于被高门排挤的地位。这种情况，到南朝发生了变化。

唐朝李延寿写过一部南朝的历史书《南史》，其中有《恩幸传》，记述了二十多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

幸”，为皇帝所爱，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所有的“恩幸”都是寒门出身。寒门在南朝的地位，说明了南朝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这个变化，是从宋朝开始的。江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寒门的地位。寒门中，有些人成了地方豪强，有些人成了富户。宋朝皇室的“崛起寒微”，又为这个变化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列在《恩幸传》的第一人叫戴法兴。他出生在会稽郡的山阴县（现在浙江绍兴县）。这个地方的生产力，东晋以来，一百多年中，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戴法兴的父亲以贩纻麻为业，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也在山阴市集上贩卖细麻布。戴法兴有两个哥哥，一个勤奋读书，一个长于书法；他自己呢，历史书上说“颇知古今”，当然也是知书识字的。这三兄弟在山阴县很有点名声。当地有一家富户，家财三千万。人们说戴家三个儿子，抵得上这家富户的三千万钱。一人值一千万，身价的确不小。

戴法兴开始在建康做仓部令史的小官。当然，这是个浊官，高门出身的人，根本瞧不上眼。

可是戴法兴这个人，从小小的仓部令史起家，一直到操纵国家大权。宋文帝时，宰相彭城王刘义康把他从仓部令史中提拔出来。后来在宋朝皇室内部争夺中，得到了宋孝武帝刘骏的信任。等刘骏做了皇帝，他便参与用人行政和赏罚大事了。前废帝刘子业（孝武帝的儿子）时，有人说，宫中有两个皇帝，一真一假，真的指的就是戴法兴。

戴法兴是南朝“恩幸”的一个典型。

宋明帝和阮佃夫，齐武帝和纪僧真、刘系宗、茹法亮、吕文度，梁武帝和朱异，陈后主和沈客卿、施文庆之间的关系，与宋孝武帝和戴法兴的关系，差不多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阮佃夫这些人，籍贯、出身和戴法兴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都做过中书

舍人，权力呢，又一个个都“势倾天下”。

中书舍人这个官，本来是中书省的僚属，地位并不高。宋孝武帝开始把国家的机密要务转到了中书舍人的手里。齐武帝时，四个中书舍人，还各设一个办事机关，称为“四户”。皇帝的诏令，从这四个机关发出来，宰相无权过问。原来由尚书省管理的许多事务，也转到“四户”中来了。

皇帝对于这些中书舍人，是另眼相看的。那个为江敩所瞧不起的纪僧真，在齐武帝看来，仪表、谈吐，都比得上士大夫。齐武帝有一次送纪僧真出门，端详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笑着说：“人生何必计较门户，象纪僧真这样的风采，士大夫哪里比得上！”

对于刘系宗、吕文度，齐武帝也把他们和士大夫相比，说：“担当国家大事，一个刘系宗便够了。沈约、王融这等人，几百个也抵不上刘系宗一个。”又说：“公卿中有象吕文度这样操劳国事的，就不愁天下不太平了。”

寒门和皇权的结合，是南朝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一个特色。齐武帝和寒门的关系，又是其中的典型。

南朝皇帝，不但用寒门控制中央的政权机关，还用寒门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从宋朝开始，南朝皇帝都用宗室诸王镇守地方。宋、齐两朝，皇帝又通过一个叫做“典签”的官，来监视镇守地方诸王的行动。

典签本来是地方上管理文书的小官，仿佛后来的文书管理员。宋朝后半期，这个文书管理员，突然重要起来。戴法兴在刘骏当江州刺史的时候，做的便是这个官。但戴法兴还不是由皇帝直接派到江州去的，也不和皇帝发生直接的关系。这时候，典签还不过是刺史的亲信。宋孝武帝以后，皇帝就用亲信的人做典签，直接派往各个地方，作为皇帝的耳目。通常的情况是：一州派上几个，轮流往返建康，向皇帝报告情况。从此，州刺史以下的地方官吏，

便在典签的掌握当中。皇帝对地方的控制，也就进一步加强了。

齐武帝的弟弟武陵王萧晔做江州刺史，和典签赵渥之合不来。赵渥之说："我离开江州，你的刺史也做不成了。"赵渥之到了建康，在齐武帝面前说了萧晔许多坏话。果然，萧晔的刺史被撤掉了。齐武帝的儿子邵陵王萧子贞做吴郡太守，想吃熊白（熊背上的肥肉，一种美味的食物），问厨子要。厨子说："典签不在，我不能给。"

齐武帝和寒门的结合，在利用典签加强对诸王的控制这方面，是很突出的。

这个原来地位低下的典签，齐以后被称为典签帅、签帅或主帅。当齐明帝萧鸾翦除高帝、武帝子孙的时候，典签的力量，有时胜过甲兵。齐武帝的儿子巴陵王萧子伦，镇守琅琊，齐明帝打算派兵去收捕，典签华伯茂认为派兵去还不如把事情交给他办。后来华伯茂只用一杯毒酒，便逼得萧子伦自杀了。

清朝历史家赵翼，从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这些变化，概括出两条：一条是"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一条是"齐制典签之权太重"。李延寿把这些寒人叫做"恩幸"，贬了一下寒人，也贬了南朝的皇帝。经过了一千多年，清朝这位历史家，和李延寿的看法，还是相差不远。

门阀统治，到南朝至少有了二百年的历史。出身寒门的皇帝，和高门之间，政治上的利害不尽相同，经常和寒门结合，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普遍现象。

七　"土断"和"检籍"

——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三

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复杂得很。士族享有许多特权，

不交租，不纳税，不服役，还可以合法地占有佃客，半合法地招集部曲。庶族要交租服役，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即使在齐朝，政治上所受到的待遇，和高门也不能比，例如：寒门免官，还免不了要挨一百大板。就整个南朝来说，失掉了往日显赫声势的高门，害怕这一颓势急转直下，顽固地想维持长期形成的优越地位；寒门呢，却千方百计，不断地挤到士族的行列中去。皇帝和这两个阶层的愿望，都有些矛盾。南朝统治阶级内部一起一伏的斗争，便是这样引起来的，“土断”和“检籍”是这种斗争的表现。

东晋时，北方流亡者大量南下，朝廷在扬州和荆州设了很多侨郡、侨县安置他们，不向他们征租赋和徭役。流亡者中的士族，成了侨郡、侨县的主人，当守令的是他们，奴役流亡人民的是他们。一个个的侨郡、侨县，仿佛一个个的小独立王国。日子久了，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朝廷的收入，也助长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东晋统治阶级内部，便发生了侨寓和“土断”两派意见严重的斗争。侨寓派主张维持现状；“土断”派主张撤销侨郡、侨县，流民住在哪里，便在哪里落籍，和当地居民一样，向朝廷纳租服役。三六四年，以桓温为首的“土断”派获得胜利，实行“土断”。桓温死后，“土断”半途而废，但斗争并没有停止。

南朝第一个皇帝刘裕，继桓温之后实行“土断”，撤销了许多侨郡、侨县，侨寓的人被编入当地户籍，和土著居民同等看待。原来被士族当作私产的侨寓户口，成了负担国家赋役的编民。这不但增强了朝廷的力量，也大大裁抑了士族的势力。

刘裕对士族的隐藏户口，曾经严厉地加以禁止。士族隐藏户口的现象，东晋时已十分严重，山遐做余姚县（现在浙江余姚县）令，到任不过八十天，便查出“私附”（士族隐藏的户口）一万多。那时，余姚全县人口不过三四万，“私附”竟占到三分之一。在这次清查当中，有个叫虞喜的人隐藏了户口，本来应该办

罪，可是，山遐办不了他；检查隐藏户口本来是地方官的职责，山遐做了这件事，却被朝廷免了官。当刘裕清查隐藏户口时，余姚县还有一个虞亮不遵守法令，隐藏户口。虞亮和虞喜的命运却不相同，被判处了死刑；余姚县的顶头上司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也因督察不严，免去了官职。从山遐免官，到司马休之免官，不到一百年。一百年中，统治阶级内部士族的地位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大约过了三十年，刘裕的孙子宋孝武帝刘骏，又在雍州实行“土断”。这一次，以柳元景为首的侨寓雍州的士族，还是激烈地反对“土断”。他们造谣说，雍州刺史王玄谟要造反；并且积极准备起兵，讨平“叛乱”。宋孝武帝派了亲信吴喜去见王玄谟，向王玄谟表示支持雍州的“土断”，不相信谣言，并且带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上说：“你已经是个七十岁的老头子了，还能有什么不满足，要造反啊！我们君臣的关系，是谁也破坏不了的。我这样说，只不过是想逗你一笑罢了！”这一次雍州“土断”，把雍州管辖的三个郡、十六个县合并成了一个郡。

宋以后，南朝北面的统治区域不断地变动，北方的流民不断地南来，侨郡、侨县不断地设立，“土断”也不断地进行。

南朝统治阶级内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庶族中的富人采取各种手段挤到士族的行列中去。因此，南朝历史中，就有了所谓的“检籍”。

“检籍”是检查户籍的简称。南朝的户口簿，用黄纸书写，叫做“黄籍”。一家一户，人口多少，祖上做过什么官，任过什么职，有过什么军功，和哪些人家结过亲，是僧还是道，如此等等，都被详细记载在“黄籍”上。“黄籍”是政府区别士族和庶族的根据，也是剥削民众的根据。

士族和有军功的人，不负担国家的赋役，和尚、道士也被免除了赋役的负担。庶族中的富人，要逃避赋役，便冒充士族、假

报军功、托名僧道，或者不报户口，或者人活着而在户口簿上注称死亡……，办法很多，但必须花钱买动管户口簿的官吏，在“黄籍”上窜改自己户名下的记录。

宋、齐以来，庶族中的富人，用一万钱左右贿赂窜改户籍，便可以从“卑微”变成“士流”。齐朝初年，虞玩之说，扬州九郡需要重新审查的户籍竟有七万一千多，占扬州户口的一半（宋时扬州领户有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六）。这是威胁到朝廷收入的一个严重现象。

宋朝皇帝已经开始和这种现象作斗争。斗争方式之一便是“检籍”，把假冒的得以免除赋役的人清查出来。宋孝武帝索性来一个士庶不分，士族一律被强迫负担徭役。但这个办法，当时似乎行不通，反对服役的士族，便“相聚为盗”；后来沈攸之在荆州起兵和萧道成作对，据说也因把徭役加在士族身上失掉了“民心”，沈攸之失败，后任刺史到了荆州，一天当中，便遣散了服役的士人三千多。

齐高帝萧道成对“检籍”工作，十分重视，即位的第二年（四八〇年），便指派虞玩之主持这个工作，对“黄籍”进行清查。武帝时，设立“检籍”的专门机构，建立专门的“检籍”工作制度；清查出来的冒牌士族，被罚到边远地方去作戍卒。四八五年，三吴地区（现在江苏南部、浙江东部，当时最富庶的地方）的富人，一时结集了三万多，在唐寓之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反对“检籍”的武装叛乱。乱事很快地被压平了，但“检籍”工作也随着缓和下来。过了五年（四九〇年），齐武帝又下了一道命令，宣布恢复宋朝末年的户籍，被罚到边疆去戍守的人，也得到赦免，回了本乡。显然，皇帝不愿意在“检籍”的风波中淹没自己。但是，这并不是说，朝廷和庶族富人的斗争已经停止。梁、陈两朝皇帝的留心“谱学”，梁武帝整理百家士族和东南士族的

“谱系”，依然是防止庶族富人冒名士族的斗争的继续。

冒牌士族一天一天增加，普通老百姓的负担便一天一天加重，南朝政权的不稳定，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种说明。

八 “耕当问奴，织当访婢”

——南朝被压迫阶级之一

南朝土地集中在少数贵族和大地主手里。宋朝的孔灵符在永兴（现在浙江萧山县）的庄园，周围三十三里，水陆田地二百六十五顷，还有九处果园。沈庆之在娄湖（现在江苏昆山县，一说现在江苏江宁县）也有大庄园，他年老时，把建康的宅第还给了官家，带了家眷和亲戚搬到娄湖去享“清福”，指着一望无际的田园，踌躇满志地说：“我还有什么需要呢，钱都在这里了！”诗人谢灵运写过一篇《山居赋》，描写自己的山居，山环水绕：有纵横的阡陌，有簇簇的果园，有疏疏落落的药圃，稻粱、花果、药物，依山傍水，从春到秋，从冬到夏，给水色山光，添了妩媚。但是，诗人笔下的画卷，不知隐藏了多少奴僮的辛苦。

南朝贵族、大地主霸占土地，利用奴僮在土地上劳动。象沈庆之家里奴僮以“千计”；谢灵运，史书说他“奴僮既众”，当然也是不少。苛政之下，老百姓“卖儿贴（卖）妇”，是奴婢的一个重要来源。

四五〇年，宋文帝要北伐，沈庆之对他说：“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沈庆之是个军人，他认为要打仗必须听听军人的意见，引了这句通行的话，为他的意见作根据。从这里，我们也就知道，南朝的奴婢不但参加生产，还是耕织的行家。

奴婢在南朝是可以买卖的。齐朝的萧景先临死时，嘱咐儿子

经营田业，说劳动力不足，可以买奴婢补充。一个奴婢，当时值钱五千到七千，用大米来折算，大约抵得上六斗。私人占有的奴婢，多数是买来的。破产农民，往往“卖儿贴妇”。宋明帝造湘宫寺，极其壮丽。有人说，这座寺沾满了老百姓“卖儿贴妇”的眼泪。南朝有很多象宋明帝这样的皇帝，也有数不清的湘宫寺。

私人占有的奴婢之外，还有官奴婢。和秦、汉一样，官奴婢是没入的罪犯和战争当中的俘虏。

南朝境内居住的少数族人，也往往被掠为奴婢。南海郡有公开的奴婢市场，买卖“高凉生口”（高凉也是当时的一个郡）。这个地方的官员，从奴婢买卖中猎取厚利。

有的奴隶主人为保证对奴隶的占有，要在奴隶脸上烙印记。那时，犯了罪的被烙印记，叫做“黥”刑。有的奴隶，便不问犯罪不犯罪，被“黥”得象个刑徒。梁朝贵族萧正德，“奴僮数百，皆黥其面”，就是一个例子。

被烙了印记的奴隶，派到远方去经商，无法逃走。齐朝的刘寅叫奴隶当伯到广州去做买卖，过了七八年，还是不得不回来。用奴隶去做买卖，在南朝很普遍。

奴婢在南朝是最受压迫的一个阶层，和牛马田宅一样，是主人的财产。法律规定，奴婢逃跑要受到各种酷刑；如果进行反抗，还可以任意被主人处死。但是在整个社会生产当中，他们不居于主要的地位。

九　佃客和部曲

——南朝被压迫阶级之二

佃客和部曲的占有，在南朝，是作为一个制度而存在的。贵

族、官僚和士族有占领佃客和部曲的权利。曹魏时的客户也就是佃客的别称。

曹操在北方实行屯田，大量的土地、耕牛和劳动力（屯田客和屯田兵）掌握在政府手里。曹魏建立以后，士族力量逐渐抬头，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便因赏赐逐渐从政府手中转移到贵族、官僚的手中，这是转移过程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便是不合法的私占。私占在魏末晋初，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晋武帝司马炎一方面严厉禁止私占佃客，另一方面又按官品高低颁布了一个荫客的规定。和这个规定同时颁布的，还有按照官品高低占有土地的占田制。最高的占田额是五十顷，最低的是一顷；荫客数最高的是五十户，最低的是一户。土地占有和客户占有的规定是相应的。但私占仍不断发展，原来为政府所有的土地和劳动力，大量地转到了私人的手中。还有不少向政府缴纳赋税、担负徭役的自耕农，也不断地沦为士族和豪强的佃客或部曲。

东晋时，颁布了一个按照官品高低占客户的法令，规定最高的一品官、二品官占客不得超过四十户，最低的九品官，不得超过五户；除一二品比西晋少些，三品以下都有较大的增加，最高的增加了十倍（如八品，西晋一户，东晋十户）。占客制度，到了东晋，更进一步发展了。

佃客的数目越多，朝廷的收入便越少。两晋对占客数目的规定，正是朝廷和豪强争夺剥削对象斗争的表现。

佃客不列入国家的编户，不负担国家的租赋和徭役，在占有者的土地上劳动，收获物和占有者“量分”（分成）。这一时期，在国家土地上劳动的人，往往只能取得收获量的三成、四成，还有低到二成的。“量分”大概也是按照这个标准。

西晋的时候，贵族、官僚家里，佃客多的有几百；接近少数族居住地区的贵族、官僚强迫少数族人民做佃客，他们占有的佃

客，有的多到几千人。佃客可以赐，可以给，可以占；在特殊情况下，佃客还可以被免为平民，但不能买卖，和奴隶不同。

豪强对土地的占有越来越多，供他们役使的佃客也有增无已。南朝齐、梁二朝，佃客、部曲竟占当时户口数的一半。

部曲的依附身分和佃客相同。不同的地方，便是既要替主人耕种，又要为主人打仗。南朝接近边境的地方，守边军官和地方豪强，往往拥有大量的部曲。夏侯夔在豫州，竟有部曲万人。鲁悉达兄弟当侯景造反的时候，也是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利用农民流亡的机会，招集了大量部曲，成了梁朝末年一个有势力的军阀。

和佃客、部曲的地位相同，隶属于南朝政府的，便是“兵”和“吏”。

魏（曹魏）晋以来的兵，地位很低。他们有特殊的户籍，和一般编户不同，魏、西晋时叫做“士家”，东晋、南朝叫做营户、军户或兵家。宋朝刘道济在益州镇压农民起义，“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和兵同时被免的还有奴僮。梁武帝有一次下令，把兵驺（兵的一种，也称驺卒）、奴婢中，男年六十以上、女年五十以上的，免作了平民，也是兵驺和奴婢并列。兵的地位，显然不如平民而和奴婢相近。

秦汉时，当兵的是“良家子弟”。更早一些时候，当兵更是贵族的一种专门职业，在军队里服役的役徒小卒，也是被征调来的农民。南朝时候的兵，却和奴僮相似。当兵被认为是当苦役。平时，兵和佃客一样，被束缚在国家土地上，从事耕种，收获物被官府夺去十分之六七或者更多；战时，和部曲一样，被征去打仗。一个人出身军户，便永远只能当贱役。某些特殊情况，军户这个出身也可以得到免除，但这是不多见的。

南朝种公田的，有一种武吏，满了十六岁，便要负担一个全劳动力的劳动，向官府交六十斛（古时容量的单位，十斗为一斛）

的米，十三岁到十五岁的，交三十斛。这个剥削量，相当于曹魏时对屯田兵的剥削。大概屯田废除之后，原来的屯田成了公田，屯田兵便成了隶属于政府的吏，公田便由吏来耕种了。东晋末年，陶渊明做彭泽令，这个大诗人喜欢喝酒，到任以后，便叫吏在公田上多种酿酒的秫稻。耕种公田之外，吏还要服许多杂役。

梁朝安成王萧秀，有一次把管辖区域内的“贫、老、单丁吏”遣散了五百多，有人称赞他，说他做了一件好事。通常的情况，老的、穷的和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的吏户，还是要从事无偿劳动的。

佃客和部曲，兵和吏，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是主要的劳动者阶层。他们的身分、地位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相似。和秦汉相比，这些劳动者的大量存在，是这一时期的特殊现象。

十 自耕农的命运

——南朝被压迫阶级之三

南朝的自耕农，被束缚在赋税和徭役两条锁链上，地位很不稳定，时时有沦为佃客、部曲和奴婢的可能。

自耕农最好的是：耕种一小块土地，搞一点副业生产，做一点小买卖，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梁朝益州地方有个人叫罗研，曾经描摹过“理想”的自耕农的生活：家里养五只母鸡、一头母猪，床上有值一百钱的布被，锅里有几升米的麦饭。他认为生活能够这样，一个农民便心满意足了，既不会去偷盗，更不会和官府作对。做官的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官，做老百姓的可以妥妥贴贴地过日子。但益州的实际情况，从官嘴里说出来的，是老百姓“欢喜造反”；罗研说的是一百家人家的村庄，有饭吃的不过几家，极大部分人家，不但养不起猪、养不起鸡，连人也活不下

去，不“造反”没有出路。益州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其他地方农民的日子也同样过得很艰难、愁惨。有的人被赋役逼得上吊；有的老婆死了，不能再娶，有的娶不了老婆，当一辈子单身汉；有的把婴儿溺死、勒死；有的卖儿卖女卖老婆，最后，连自己也卖了。活着的时候，受折磨、受鞭挞；死了，也很难指望有人来掩埋！对这种悲惨现象，当时有人曾发出哀叹：“杀人的办法一天有几种，活人的办法一年也没有一条。长此以往，这个世界只能剩下草木了！”

南朝农民（摹本）

南朝官府对农民的剥削，花样很多。第一是调。调的意思是征收。调布绢，调米粟，是以户为单位的，因此，又称为户调。东晋以来，户分贫富，征收的标准也有高低。官吏评定户的等第，连一株树、一片瓦也不肯放过，更不用说田多田少了。这个办法，很不得人心，实行了很多年，最后不得不改为按丁收取。南朝四个朝代，改朝换代以后，剥削的办法，总有些改变。按户征收，改为按丁征收，大概是在梁朝。但结果是换汤不换药，租税不是减轻而是加重。调，原来是收实物的，齐朝改为实物和货币兼收。物价有高低，货币有好坏。宋时一匹布规定的价格是五百文，齐

时跌到一百多文，老百姓把布换成货币，一匹布便要吃亏三百多文。政府收的货币要轮廓完整的好钱，一千文能抵民间通行的钱一千七百文，用流行的坏钱去换好钱，每一千文，老百姓又要损失七百。这里不过是举两个例子。布绢米粟之外，还有杂调。调布绢、调米粟和杂调，合起来叫做“三调”。三调是南朝官府主要的剥削制度。

调以外，还有役。役的名目很多，东晋时，丹阳郡一个地方，便有六十种以上。东晋规定十六岁为全丁，十三岁到十五岁为半丁。全丁、半丁都要服役。当时统治阶级中也有人认为把十三岁的孩子征去服役“伤天害理”。宋初，有人建议把十五岁到十六岁的改为半丁，可是没有成为事实，“伤天害理”依然如故。一般的情况是：一户人家，三个男丁要一个服役，五个男丁要两个服役，这算是轻的。重的时候，三个当中就要两个，五个当中要三个。男丁不足，妇女也要去服役。宋朝末年，荆州附近一百个县，路上见不到青壮年男子；耕田的，运租的，不是老弱，便是妇女。东晋时，有人说，古时候老百姓服役，一年不过三天；现在的老百姓，一年当中连三天休息也没有。说这话的人，很有点怀古之情，但他的怀古就是伤今。东晋可伤，宋末荆州的景象就更可伤了。

齐朝初年，山阴县有户口三万，担负国家赋役的户口二万。这二万户里面，家产不满三千文的要占一半，其他便是什么也没有的“露户役民”。家产三千的人家，在大旱灾年时，倾家荡产，也还买不到一斗米（梁朝天监元年，江东大旱，斗米五千），和“露户役民”也相去不远。这些人，正象当时有人所说的：“死且不怕，何况刑罚?!身且不爱，何况妻子？！”被逼得无路可走时，便离乡背井，相继逃亡。从平原往山里逃，从内陆往海岛逃，接近少数族居住地区的就“入蛮”、“入俚”，也有的“依附大

姓”，成了豪强的荫户（佃客或部曲）。

南朝禁止逃亡的法令很严酷。梁朝定了连坐法：一个人逃了，全家要办罪；一家逃了，全村要办罪。结果，常因一个人逃亡，全村都逃空。严酷的刑罚，阻止不了求生的斗争。

梁武帝下过六次诏书，对逃亡的人许了很多愿，诱骗他们返回本乡。皇帝的甜言蜜语，也掩饰不了苛政的狰狞面目。梁朝有过四十多年的“和平”，但户口却一天天减少，人民逃亡的现象一天天严重。

逃亡，是南朝农民反抗暴政斗争最经常、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往往预示着阶级斗争风暴的来临。

十一 “亡命”和“山贼”的暴动

——南朝农民战争的特点

南朝一百七十年，陈朝以前的一百四十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约有四十次。起义的人数，有的几千，有的几万，最多的一次达二十万。

益州和扬州，是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农民起义，在这两个地方，比较频繁，益州有九次，扬州有七次。

益州农民起义，宋朝有：四三二年赵广的攻打成都；四六六年成都的两次被围攻；四七二年李承明在巴西（现在四川阆中西北）的暴动。齐朝有：四九九年到五〇〇年赵续伯的起义。梁朝时，益州农民，从五〇五年开始，四十五年当中，规模较大的起义就有五次。焦僧护占领成都附近的郫县、繁县（现在四川新繁县），起义人数有几万。吕苟儿攻打成都，也有十万人。张文尊领导的一次暴动，人数有一万，还打死了镇压他们的巴西豪强首

领侯弘远。沙门（和尚）孙天英领导僧徒暴动，虽然不过几千人，却也勇敢地攻打了成都。

益州农民起义的矛头大都指向州的统治中心——成都，九次当中，成都被攻打了六次。南朝的时候，被派往益州做刺史的，不是皇帝的兄弟子侄，便是赫赫的显贵。赵广起义时，益州刺史刘道济，是宋武帝的心腹刘粹的弟弟。孙天英攻打成都时，益州刺史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纪。这些人来到益州，和地方封建势力之间有利害冲突。刘道济在益州，历史书上说他“伤政害民”，既为益州人民所痛恨，也招致了地方势力的不满。前面说过，萧纪在益州，把搜括得来的钱，铸成金饼银饼，不但益州农民被他剥削得膏血都尽，益州的地方豪强的利益，也受到损害。这种情况，使得州的统治中心——成都，成为益州农民起义进攻的目标，他们感到，一切大祸害都是从盘踞在那里的统治者加在他们身上的。

扬州起义的农民，被旧历史书称做“亡命”或“山贼”。四五一年，司马顺则起义；司马顺则被称为“亡命”。五一〇年，吴承伯起义；吴承伯被称为“山贼”。“亡命”和“山贼”，都是被赋役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的农民。

农民不断地逃亡，是南朝一个普遍现象。

齐朝的时候，永嘉郡有一个横阳县（现在浙江平阳县），山深谷峻，农民逃亡到那里，垦殖山荒，日子久了，渐渐结成村落。范述曾做永嘉太守，把这些逃到深山里的人骗了出来，强迫他们成为向政府交租服役的编户，据说有二百家之多。过去的太守，对这些住在深山里的流亡农民，只知道派兵去抓，用武力去剿；但毕竟抓不完，剿不尽。范述曾换了个花样，使了另一手，有一些农民便落了圈套，受了欺骗。范述曾被封建历史家写入了《良吏传》，被认作封建官僚的楷模。

梁朝有个臧厥，也采用范述曾的一手。当他做晋安郡太守时，也把逃亡到山里的农民，收作了国家的编户。晋安郡人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臧虎”。封建国家的“良吏”，被认作虎，是更符合历史真实的。

被称为“亡命”或“山贼”的暴动，人数往往只有几千，但坚持斗争的时间，有的却很长久。宋朝末年，“亡命”王元初在六合山（现在江苏六合县境内）领导农民斗争，屡次打退官军的进攻，坚持了十年多。这是南朝农民反对地主斗争坚持得最长的一次。在歌功颂德的旧历史记载中，南朝农民象这样的斗争只有一次。但是，这一次，也足以表现被压迫的农民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了。

扬州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的一次，要算宣城吴承伯的起义。吴承伯领导的农民斗争，从现在安徽南部进入浙江，攻破了几座县城。沿途有许多被压迫的群众参加，从历史记载看来，还有所谓“叛吏”在内。吏在南朝，被国家奴使，和农奴差不多。这一次起义，发展到了二万人，地方官被打得纷纷逃散；最后，在“台军”（朝廷的军队）镇压下失败了。比吴承伯起义早四十年，临海田流在滨海山谷中起义，自号东海王，杀鄞县（今浙江宁波）县令，第二年才被镇压下去。这一次起义，使得宋朝东部的州郡惊慌失措。

扬州地方统治势力，和朝廷的关系较深。镇压农民暴动，朝廷和地方总是协同一致。所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扬州比较困难。各地分散的暴动，也往往很快地被镇压下去。但农民的阶级斗争，却保持着这个阶级固有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本色。

其他地方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有时候，地方势力利用当地农民对朝廷赋役负担的不满，掀起反对朝廷的斗争。五四二年，梁朝安成郡的刘敬躬反对安成内史（相当于郡太守的官）萧侃，

在现在江西西南部揭竿而起，攻破了江西南部和中部许多县城，一直打到江西偏北的豫章郡。跟随着刘敬躬的群众有好几万人。刘敬躬本人，出身于安成望族，属于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但拿起武器参加斗争的群众，无疑地是被压迫的农民，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刘敬躬的部曲和其他望族的部曲。

益州的农民起义，被地方势力和野心家利用，情况更要复杂。

四六六年，益州爆发了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但被地方豪强和宋朝贵族利用了。这一年，宋朝皇室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很激烈。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现在江西九江市）起兵，反对已经夺得帝位的宋明帝。益州刺史萧惠开，以支持刘子勋为名，从益州出兵，打算扩充自己的势力。他派出两支兵，一支在巴东（现在四川奉节县）遭到地方武装任叔儿的袭击；一支在梁州（现在陕西南郑县）为杨僧嗣所截断。

萧惠开和益州地方力量之间，本来有着不同的利害。益州人民，也因为萧惠开的残酷统治，对他十分痛恨。当萧惠开派出去的军队被益州地方武装打得七零八落的时候，成都附近各郡的豪强和被压迫的农民，由晋原郡首先发难，纷纷向成都集中。第一次攻打成都的有十万人，第二次增加到二十万人。这是南朝一次少见的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行动。没有广大农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情绪，这样规模巨大的武装斗争，是不能想象的。

但是，这两次攻打成都的领导权都操在地方豪强和后来为宋明帝派到益州宣慰的大员萧宝首手里。萧宝首在第一次攻打成都失败之后来到益州。这个贵族野心家，也打算利用地方对萧惠开的不满，掀起更大的反对萧惠开的斗争，在皇帝的记功簿记上他“平蜀”的功劳，博取更高的官位和赏赐。

因此，成都始终没有被打下来；围攻成都的农民队伍，也就

在失败之后，纷纷解散了。

比这次暴动早三十四年，赵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情况便不相同。

四三二年，成都附近广汉（现在四川遂宁县）、巴西，爆发了农民起义。赵广领导的一支农民武装，攻破了涪城（现在四川绵阳县）。益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郡太守都弃官逃命。这一年的深秋，赵广攻打成都，四面围城，有十万多人，围攻了三个月，没有攻下，最后被迫退回广汉。

这次起义队伍中，也有不得志的地主阶级分子，不满于苛捐杂税的商人。这些人里面，象帛氏奴、梁显，还窃取了起义军的领导地位。但主要领导权，和四六六年那一次不同，掌握在和农民有密切联系的人手里。

当起义军从成都撤退，最后回到广汉的时候，一部分领袖在战斗中牺牲了，大部分退到了山里，逐渐结集力量，坚持斗争。直到四三七年，重要领袖程道养战死，地主阶级分子帛氏奴、梁显投降，起义才最后被镇压下去。这次起义，从四三二年到四三七年，一直坚持了五年，是南朝益州农民武装斗争时间最长的一次。

南朝的农民起义，没有东汉黄巾起义那样的规模，也没有隋末农民起义那样的规模；和北朝比较，象北魏末年震荡全境的六镇起义那样的大风暴，也不曾有过。南朝农民，被统治阶级中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分裂，被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所隔绝，又没有北魏末年那样，使两个敌对力量的矛盾达到那么尖锐激化的条件，因此，起义始终局限在一个地区；全境规模的起义，一次也没有。

十二 两万斛大船

——南方经济的发展

南朝的都城建康，两汉时不过是丹阳郡一个小县。二一二年，孙权在这里建石头城，过了二三百年，便成为当时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梁朝时，建康人口一百四五十万，城里有四个市，秦淮水北岸，有大市，还有十多个小市。长江从这个大城脚下浩荡东流，秦淮水穿过它的心脏。大船小船，来自数千里外富饶的益州，来自洞庭湖、鄱阳湖，来自“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富春江、浦阳江。东晋末年，一次风灾，建康城下停泊的公私船只，受损失的据说达一万艘。三国东吴时，从这里出海的船舰，长二十多丈，载重一万斛（约一千吨）。到了梁朝，大船的载重量，增加到两万斛。

北魏营建都城洛阳，派了一个使臣蒋少游南来。这个人是当时有名的建筑师，洛阳的宫殿建筑，是模拟建康的。二三百年来建康的发展，是江南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历史上的六朝（包括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繁华，标记着南方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商业的兴盛。

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江南，说这个地方低洼、潮湿，人口很少，种稻子用火耕水耨的原始方法，居民懒散，没有积蓄，吃稻米和鱼虾，受冻挨饿的穷人不多，千金的富家也很少见。这是一幅没有开发、落后的地方的图画。

过了五六百年，沈约笔下的江南，便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沈约说，江南这个地方土地广阔，物产丰盛，老百姓勤于耕织，一个郡丰收，几个郡便不愁衣食。会稽郡滨海傍湖，肥沃的土地

有几十万顷，上等田地亩值一金，西汉时最富足的关中最好的土地，也比不上它。荆州和扬州分别盛产鱼、盐、丝、绵、布、帛和木材，运销到各个地方，满足全国的需要。

东吴在江南建立政权以后，江南农业有了一个发展。南方某些地区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亩收精米二斛多，接近了北方的先进水平。东晋、南朝时，南方的农业发展更加迅速。南方稻米的生产超过了北方。当时人说：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南北的生产，北方以纺织业为代表，江南就以粮食为代表。

东晋在江南建立政权之后，南方所受到的战争的破坏，比北方少。同时，在南方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下，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江南是著名的水乡，水利灌溉事业，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吴国和越国。南朝时候，大大小小的堤堰，陆续修建，最大的堰，可以灌溉万顷以上的土地，一般的在千顷上下。农业上需要的肥料，也由原始的火田发展到利用粪肥了。宋朝到彦之，年轻时便以挑粪为业，直到他的曾孙到溉，还被士族出身的何敬容骂为“尚有余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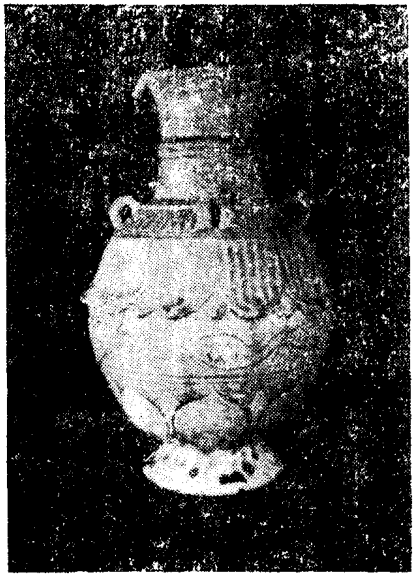
当三国分裂的时候，北方人民流亡到江南，和南方人民一道开发了江南。从西晋末年开始的北方长期的混战，使更多的北方人民，迁徙到了南方。据近代人估计，从西晋末年到宋初的一百三十多年中，从北方来的人，编入了当时政府户籍的，有九十万，占当时编户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那些直接为王公、贵族、士族、豪强所奴役的佃客、部曲，还没有计算在内，也是无法计算的。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被他们带到了南方；他们和当地劳动人民一起，披荆斩棘，垦荒播种。弥望的绿油油的田畴，代替了过去的丛林茂草，湖水被决去变成了沃壤；春天三月，山坡上也出现了一片一片在微风中皱起的青葱。

士族居住地集中的东方（现在浙江绍兴、温州一带），有了新兴的小市，米、布、绢、帛、绵、丝、纸、席等商品在这儿聚散。会稽郡的山阴县，光钱塘、浦阳两条江上的渡口税，一年就可以征收到四五百万钱之多。小市上，有卖针的、卖糖的、卖葱的。穷苦人家的子女，采菱、采蓴，也拿到市上去出卖。

士族靠着对千百万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在庄园里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饮茶是当时享乐的一种。齐武帝临死，告诉他的子孙，要他们在他死后，祭祀时不必用牲，但必须有茶。饮茶要讲究茶具。会稽郡的制瓷术，这时，便在西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最有名的是青瓷，出产在现在浙江的绍兴。青瓷的种类很多，除了茶具之外，罐、坛、碗、灯、唾壶、盥盆等日常生活用具也大量地见于现代出土的遗留物之中。和青瓷同类的缥瓷，则分布在现在的温州一带。到了唐朝，这种青瓷的颜色便“夺得千峰翠色”，成了精美的艺术品。

随着南朝农业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冶铸业也有发展。齐、梁时，冶炼能手流传下来的名字有谢平和黄文庆。制造农具（刀镰），已经知道用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冶炼，利用生铁熔点低，含碳量高，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经过锻打，排除杂质，便成为钢铁。铁的产量也相当高，梁武帝时堵塞浮山堰决口，用铁即达数千万斤。造纸和漆器的制造，也比较突出。从现在的浙江，到湖南、四川，都建立了造纸的工业。纸的名称，在四川的叫蜀牋，在湖南的叫南纸；用藤皮做原料的叫藤角纸，或称藤纸；用破旧麻布做原料的叫麻纸；纸上涂了一层黄色防蠹药物的叫做黄纸；各地出产质量较差的叫做土纸。皇帝的宫廷，也有专门造纸的机构，齐朝有“银纸官署”，最著名的一种出品叫做银光纸。王僧虔写得一手好字，齐高帝便把这种银光纸送给他。纸的制造，东晋已很普遍。范宁认为土纸不可用来作文书，要用藤角纸。桓

玄下令废掉竹简，用黄纸来代替它。藤纸出产在剡溪（现在浙江嵊县）和余杭县的由拳村，到了唐朝，还很有名。纸有不同的品种，也有不同的颜色。南朝的皇帝和贵族把纸作为礼物互相赠送，梁简文帝萧纲做太子的时候，把四色纸三万张送人；萧纲的弟弟萧绎去做荆州刺史，送给萧纲红笺五千张。隋灭陈，得到陈朝大量的藏书，这些书籍大部分是陈宣帝时用纸抄写的。纸的普遍应用，大大便利了文化的传播。但是，也成为贵族、官僚牟利的对象。宋朝时，孔道存在建康做官，请假回家，船舱里装满了货物，有绵，有绢，也有纸。他的哥哥孔觊知道了，认为士大夫做买卖，有失身分；当他去迎接这位弟弟的时候，便装得很高兴的样子，叫孔道存把货物搬到岸上来，一把火烧掉了。



齐青瓷莲花尊

在南朝，漆器比瓷器更为流行。政府对于漆器的制造，作了一些规定。私人制造漆器的，要在器物上用朱砂调漆写明制造的年月和姓名。齐朝时，崔庆绪做梁州刺史。梁州是一个产漆的地方，崔家便在这里制造漆器，器物上都题上“日”字。这种日字器，到了他儿子崔慰祖手里，便“流乎远近”。后来，梁武帝的弟弟萧宏，囤积了许多货物，漆也成为囤积的对象。

南朝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成品在市上流通，长江、赣江、湘

江、沔江（汉水）和三吴地区的大小河流，便利了商品的流转。寻阳是一个不算大的沿江城市，四七二年，宋文帝的儿子刘休范在那里起兵，几天当中，便征发了足够的商船，把他的二万步兵、五百骑兵装载着从湓口驶向建康。梁朝侯景造反时，南方有一种兵舰，叫做鹢舸，船两边有八十棹，鼓棹而行，"捷过风电"。船舶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时代，这又较充分地发挥了江河的作用，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沿江的商业城市，除了建康之外，还有京口和江陵；寿阳和襄阳，是军事重镇，也是南北进行商货交易的据点；成都在三国时是蜀汉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南朝时，依然是一个繁盛的商业都市，全国织锦业的中心在这里，西南各地的货物也在这里聚散。

南朝手工业制成品，除了运销全国各地，还运往海外许多国家，南朝宫廷和贵族士大夫所需要的许多奢侈品，也从海外运来。输出的货物主要是绫锦、绵、绢，输入的有象牙、犀角、珠玑、琉璃、吉贝（木棉布）和香料。和南朝通商的国家有林邑（在现在越南南部）、扶南（现在的柬埔寨）、天竺（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师子（现在的斯里兰卡）等国。梁时，从外国来的商船，最多的时候一年十几批。中国的海船也航行在南海和印度洋上。广州的番禺（现在广州市），是当时和海南诸国通商的口岸、最富裕的城市，也是贪得无厌的官吏大发横财的地方。南朝做交、广两州刺史的人，很快就会因贪污剥削成为富翁，当时有句俗话说："做广州刺史的，只要在城门边转一转便可以赚得三千万钱。"宋时垣阆做交州刺史，任满回家，搜刮得来的资财，便值钱一万万。从官吏贪污的数字来看，当时中外交易的货物，数量是不小的。

南朝的市税、关税占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南朝设有专门管

理市场的官，商品只许在市内买卖。市场里有由官府设造的店铺、房屋，一切设备也由官府供给。进入市场的人，要交纳一定的市税。市税在东晋时已经很繁重，南朝时虽有过一些改革，但管理市场的官，仍是人民憎恨的对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抽百分之四的估税，卖的人出百分之三，买的人出百分之一，由官府发给买卖的契券。不给契券的买卖，叫做散估，也抽百分之四。此外，凡是有商品通过的渡口，都设有关卡；过渡的货物，抽十分之一的关津税。

士人和军人（小军官）经商有免税的特权，二品以上的清官和贵族更不用说了。南朝的王公贵族，很少不经营商业的。有势力的贵族，到处开设邸店，招待各地商客，收买他们的货物，图取厚利。大小官员，利用职务上的方便，转运贩卖，什么东西赚钱，便贩运什么。米、布、竹、木、油、蜜、脯、药固然是贩运的对象；地方上的土产，只要能赚钱，甚至象蒲葵扇、草鞋，也不会被地方官放过。梁朝的王筠做临海郡太守，罢官回家，带了两船草鞋。东晋时，谢安的一个同乡人，从中宿县（现在广东清远县）罢官回建康，带了五万把蒲葵扇。

南朝的商业，是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兴盛起来的。在商业中，小商贩还是占了极大的多数。市税、估税和关税，主要落在他们身上。侯景造反，以杀管理市场的头目徐麟、陆验为号召，目的便在于争取小商贩对他的拥护。小商贩在南朝和自耕农的地位差不多，有许多本身便是自耕农。

在全国统一之后，江南经济，更跃居全国的首位。唐朝时，数全国的财富，便有“扬州第一，益州第二”的说法。南方经济的发展，南朝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第二章　北朝的政治和经济

十三　走向文明

——公元三八六年以前的代国

秦汉时，我国北部大漠，最活跃的是匈奴人。匈奴衰落了，鲜卑人代之而起。

拓跋部是鲜卑族的一支。这个部落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得很久远，但是比较具体的历史记载，只能从一个叫力微的大酋长说起。力微的父亲叫做诘汾，东汉击走匈奴时，他率领拓跋部走出高山深谷，经过“九难八阻”，迁到了匈奴的故地，在云中（现在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游牧。诘汾在部落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他的儿子，就是后来拓跋部公认的始祖神元皇帝力微。

力微做大酋长时，拓跋部游牧的中心，已经从云中东移，到了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面的和林格尔——当时叫作盛乐城的地方。二五八年的春天，力微在盛乐城“祭天”，部落大人（酋长）都来了，表示服从他的号令；只有一个称为白部的酋长不来，这个酋长便被杀死。大酋长的权力，已经超过了氏族社会部落首领固有权力的范围。力微继承父亲做了部落联盟的大酋长，也说明氏族社会中按习惯推选军事首领的制度，已经为世袭制代替了。拓跋部氏族社会的发展走到了尽头。但是，力微做大酋长的时候，拓跋部还没有法律和监狱；统治和奴役，还没有成熟到产生国家。

二六一年，力微的长子沙漠汗被派到曹魏都城洛阳去当“质子”（抵押品）。由曹魏送到拓跋部去的金、帛、缯、絮，年以万计。历史书上说，拓跋部和曹魏“聘问交市，往来不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在和睦相处中，日益发展。晋武帝时，沙漠汗请求回国，得到允许，晋武帝还送给他许多礼物。沙漠汗回国后八年，又到洛阳来“聘问”。二七七年，沙漠汗在洛阳住了两年之后回国，力微派各部酋长到阴馆（现在山西代县西北）去迎接。沙漠汗在宴会上，引弓发弹，打落飞鸟，迎接他的酋长们，惊异地认为他学得了晋人的奇术。沙漠汗在洛阳居住日久，言谈风采，服装打扮，已经和汉族差不多。部落酋长们怕沙漠汗回去继承力微做大酋长，改变旧俗，对他们不利。氏族社会的旧俗和封建制度的新风，第一次在拓跋部内发生了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沙漠汗成了第一个牺牲者。这一回，沙漠汗没有能回本乡，在路上被杀死了。

但是拓跋部从野蛮进入文明的趋势，却没有因沙漠汗的被杀死而停止。力微活了一百零四岁，死后，部落内部的变化，循着历史发展的轨道进行，交换关系在西晋末年有了更明显的发展。洛阳的大商人带了金帛货物在酋长居住的地方进行交易，酋长和这些商人有了往来，雁门郡繁畤县（现在山西繁峙县）大商人莫含还得到大酋长猗卢（沙漠汗的儿子）的信任，成为猗卢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顾问。西晋八王之乱的后期，晋朝靠近边境的居民，有不少逃往拓跋部避难，拓跋部乐意地接纳了他们，并把这些非鲜卑人叫做“乌桓”。他们之中，也有非汉族的其他各族人，但汉族人最多。对于拓跋部社会的发展，汉族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拓跋部的大酋长猗㐌、猗卢和汉族人的关系很深。猗㐌是猗卢的哥哥。晋朝失意士人卫操、卫雄、姬澹很得猗㐌的信任，成了他的政治辅佐。猗㐌死后，三〇八年，猗卢重新统一诸部，

结束了这个部落联盟自力微死后长期分裂的状态。这时，中国北方正是各少数族统治者非常活跃的时候，刘聪、石勒先后在北方建立匈奴和羯族的政权。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联合猗卢，和匈奴族建立的前赵相对抗。猗卢按照汉族皇帝的方式来行使大酋长的权力，和各部酋长的权利大相矛盾。汉族士人得到大酋长的保护，大力支持猗卢，希望他象一个国王那样处理部落内部的事务，更支持他参与刘琨对抗匈奴族统治者的战争。三一〇年，猗卢接受晋朝的封爵，称代公。过了四年，晋朝又晋封他为代王。

猗卢用强力来压服部落酋长的反抗。部落酋长为保持氏族贵族的古老权利，不能容忍大酋长象国王那样破坏氏族社会的传统。斗争最后以猗卢和他的儿子六脩之间的相杀而爆发。在拓跋部的历史中，六脩开了杀死父亲的先例。猗卢死后，这种斗争又在“新旧猜嫌”的情况下继续下去。旧人，指的是拓跋部鲜卑人；新人指的是在猗㐌死后以卫雄为代表的外来势力。旧的（氏族）贵族势力和新的封建势力不能相容，卫雄、姬澹便率领汉人和“乌桓”三万家，赶了马牛羊十万头，离开拓跋部，逃到汉族居住区，归附了刘琨。拓跋部向文明过渡的进程受了一次挫折。拓跋部的部落酋长，相互争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纷纷扰扰，经过了二十二年。

三三八年，沙漠汗的曾孙，猗卢的侄孙什翼犍称代王，做了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这一年，什翼犍十九岁。他身长八尺，状貌奇伟，喜怒不形于色。小时候被送到后赵都城襄国（现在河北邢台县）去作“质子”，在襄国住了十年，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在征服西部铁弗部的战争中，被西部人射中眼睛。后来射者被俘，什翼犍左右的人要把这个人活活割死。什翼犍说：“作战时，各为其主，射者无罪。”这个人得到赦免。

什翼犍做代王后，任用汉族士人燕凤、许谦，模仿汉族封建

政治体制．设官分职，管理政事；又定了简单的法律，规定叛逆、杀人、奸、盗等罪的刑罚。三四〇年，什翼犍在盛乐建都；第二年，又在盛乐城南八里筑盛乐新城，开始定居生活。代国境内，这时已经有了农业。三六七年，前燕兵经过盛乐附近，就损坏过穄田（穄和黍子相似，只是粘性较差）。三九五年，后燕攻打拓跋部，在盛乐西北五原（现在内蒙古五原县）一带，收割穄子一百多万斛。对于这个游牧部落来说，耕种穄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拓跋部有了农业，有了雏形的政权，跨进了文明的门槛。

什翼犍屡次和铁弗部争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对高车部（即敕勒）也发动了掠夺战争，获得大量奴隶和畜产。后赵灭亡，他打算进兵中原，但部落酋长不赞成。不久，前秦统一北方，他遇到了一个空前的劲敌。三七六年，前秦的苻坚发兵三十万攻打代国，什翼犍率领部落逃往漠北，被征服的高车部乘机反叛，拓跋部在漠北找不到草料，不得游牧。这时候又爆发内乱，一幕部落贵族争夺继承权的斗争，重新揭开，什翼犍被儿子寔君杀死。代被分二部，由刘库仁和刘卫辰（刘是冒姓，许多匈奴族酋长，因和汉朝皇帝有甥舅关系，都冒姓刘）分别统领，服从前秦号令。

什翼犍在位三十八年，历史上叫做昭成皇帝。拓跋部从野蛮走向文明，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十四　道武帝拓跋珪

——北魏的建立

三八三年，淝水之战后，前秦土崩瓦解。

三八六年，拓跋部乘机复国，拓跋珪被各部酋长拥戴，称代

王。同年，改称魏，历史上称为北魏。拓跋珪，字涉圭，是什翼犍的嫡孙，历史上叫做魏道武帝。

拓跋部复国之后，拓跋珪团结内部，打败铁弗部的刘卫辰部（后来刘卫辰的儿子赫连勃勃在现在陕西建立了夏），成为塞上强大的政权。

这个充满活力的政权，当后燕（这是淝水之战后，在北方新成立的一个政权，占有现在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一部分地方）向它索取名马、拘留它派往中山（后燕都城，现在河北定县）的使臣的时候，就和后燕断绝了和好。

三九五年，后燕皇帝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统兵八万，进攻北魏。这一年七月，后燕军队到达五原。塞上秋风，飕飕地送来新凉。拓跋珪带着部众、畜产，退到黄河以南现在河套一带。后燕出兵三个多月，找不到北魏的主力。凉秋九月，慕容宝还徘徊在黄河的北岸。当他离开中山的时候，七十岁的皇帝正在卧病；这时，消息断绝已久，忽然传说皇帝死了，军心不安，慕容宝也很忧虑。

十月下旬，慕容宝烧掉渡河的船只，准备退兵。河上还只有薄冰，慕容宝满以为退兵之后，北魏军一时过不了黄河，沿河没有设一个斥候。十一月初，天气陡然寒冷，接连几夜北风，千里冰封了。拓跋珪带了两万人，轻骑渡过了黄河，日夜追赶，到达参合陂（现在山西大同市东）西，后燕军正在东面不远的地方过夜。第二天清晨，初升的阳光照在山头上，一点也没有觉察追兵已在近边的后燕军，正准备继续东行。北魏的兵马闪烁在朝阳灿烂的群山中。一夜之间，拓跋珪所率领的轻骑和原来被派去截断后燕归路的人马，已经把后燕军队紧紧包围了。慕容宝抛弃大军，轻骑逃走。后燕军四五万人，放下武器之后全部被活埋了。

参合陂之战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战争，后燕的有生力量被消

灭，北方的统一，南北朝对立的形势，在这一战之后，基本形成了。

北魏乘战胜之威，在三九六年的秋天，攻占后燕的并州（现在山西太原市西南），同年，从井陉（现在河北井陉县）进入河北，围攻后燕的都城中山。一年后，中山被占领，后燕的残余力量，分别退向龙城（现在辽宁朝阳县）和广固。

三九八年，北魏定都平城（现在山西大同市），在这之前，还没有固定的都城。

从拓跋部迁到匈奴旧地，到拓跋珪时，已经快三百年了。原来只知道逐水草、过游牧生活的鲜卑人，在什翼犍时，开始有了农业。三九四年，拓跋珪派他的堂兄弟东平公拓跋仪带了一部分鲜卑人在现在河套地方“屯田”，农业收成一开始就很好，种地的人分得的粮食，比过去畜牧的利益丰厚，大家都很高兴。灭了后燕，又从汉族居住地区迁来几十万汉族和其他各族人，在平城附近“计口授田”，分给他们土地和耕牛，强迫他们从事农业劳动。平城附近，被划为“王畿”。王畿之外，又有所谓“方”、“维”，由皇帝直接派遣官员管理。四个“方”，四个“维”，合起来称“八国”，管理这些地方的官员叫做“八部大夫”或“八部帅”。原来以游牧为业的鲜卑人，在“方”、“维”内定居下来；原来的“部大人”为皇帝任命的官员所代替了。这些官员不同于原来的部大人，主要任务是监督和劝课农耕。朝廷按照各地收入的多少，来考核官员的政绩。对拓跋部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从力微时开始，到拓跋珪手里，便以行政命令固定下来了。

东起濡源（现在河北丰宁县），西到五原，东西一千多里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广阔的牧场，居民长期停滞在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时，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下，有了

发展。北魏这个年轻的政权，转过来，又从这里得到了物质力量的支持。

拓跋珪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和他的前辈一样，为了统治汉族民众，从汉族士大夫那里寻找支持。汉族士大夫需要依靠拓跋氏政权，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也给予一定的支持。三八六年，张袞和许谦是两个被安置在显赫地位上的汉族士大夫。后燕进攻北魏时，向拓跋珪建议撤退到河南（现在河套一带）去的是张袞；战胜了后燕，向拓跋珪建议攻打并州的是张恂。崔宏归附北魏之后，还把拓跋部的历史和汉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说黄帝最小的儿子昌意“受封北土”，是拓跋部的祖先，拓跋珪对此也表示赞同。有一次，拓跋珪问博士（“五经”的教授）李先：“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可以增长见识和智慧？”李先说：“书籍”。拓跋珪便命令各地搜罗书籍，送到平城去。另一个博士公孙表，把韩非的著作介绍给他，告诉他怎样做一个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国家的皇帝。

但是，北魏在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民族压迫，不能不引起汉族人民的反抗。北魏初年，汉族士大夫出来做官，和北魏统治者虽然有阶级利益一致的一面，但他们多半是由于逼迫，连最有名的崔宏也不能例外。后燕灭亡，汉族居住地区河北一带，士大夫反对拓跋部的武装斗争，三九九年一年中便有三起。汉族人民反对压迫的斗争，前一年也已经在博陵（现在河北安平县）、勃海（现在河北南皮县）、章武（现在河北大城县）这些地方发生了。

随着封建化的发展，统治阶层中鲜卑贵族和皇帝之间，也不断发生冲突。一件新事物的出现，总要遇到许多阻碍，受到旧势力顽固的抵抗。拓跋部的守旧势力，过去不能容忍一个新的国王，现在也不能容忍一个封建主义的皇帝。因此，贵族中一些野心家，遇有机会，便觊觎皇帝这个宝座。三九七年，拓跋珪围攻

中山，国内传言他在柏肆坞（现在河北藁城县北三十里）打了败仗，他的堂兄弟拓跋顺便在云中阴谋起兵，夺取政权；贺兰部留在阴馆的贵族也乘机反叛。拓跋珪在四〇〇年下了两道诏书，一道说："人们认为汉高祖以平民而有天下，是不对的。汉高祖做皇帝，是由于天命；没有天命，谁妄图非分，谁就要遭殃。"另一道诏书反复说明：名爵是末，道义是本，不可本末倒置；诫谕群臣讲道义，不要贪名争位。天命和道义都是神学教条，过去，被汉族地主阶级的头子千百遍地应用，这时，也成为拓跋珪的精神药石。从这一年起，贵族因反对他被处死的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堂兄弟拓跋遵和拓跋仪。这两个人过去都有战功，拓跋仪确实想造反，阴谋暴露之后，因为功大没有办罪，后来私自出走才赐死。历史书上说拓跋珪晚年常常烦闷不安，几天不吃饭，几夜不睡觉，自言自语。朝臣见他时，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或者表情失常，便被认为心怀恶意，当场处死。皇帝和贵族的冲突无法解决，使这个为北魏奠定基业的第一个皇帝精神失常。到四〇九年，他就被儿子拓跋绍杀死了，活了三十九岁。

拓跋绍走了他的前辈杀父的老路，拓跋珪也和他的前辈——拓跋部著名的大酋长猗卢、第一个国王什翼犍一样，死在新旧斗争的血泊里。但这时候，公开支持拓跋绍的人很少了，当拓跋珪的太子拓跋嗣一回到平城，北魏宫廷内的风波便平息了。

十五　"赫赫武功"

——北魏统一北方

四〇九年，拓跋嗣杀死拓跋绍，做了北魏的皇帝，历史上称魏明元帝。四二三年，拓跋嗣死去，年三十二岁。这一年，他的十

六岁的儿子拓跋焘继承了帝位。

拓跋焘，字佛貍（佛，读弼音），是北魏杰出的君主，历史上称魏太武帝。从拓跋嗣做皇帝到拓跋焘统一北方，恰好三十年。

四〇九年，北方还分裂为许多割据政权。和北魏接壤的有北燕、北凉、后秦、南燕和夏等，北魏的北面还有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柔然。

夏和柔然，是北魏的两个劲敌。

四一五年，平城附近连年霜旱，不少人饿死。有人主张迁都邺城(现在河南安阳市北)。当时，谋士崔浩对魏明元帝讲了很多不能迁都的道理，重要的一个理由，便是迁都之后，平城的防守力量弱了，夏和柔然必然乘机进犯。四一七年，刘裕攻打后秦，后秦向北魏求救。北魏讨论了这件事，崔浩又以为要防备柔然进犯，不可出兵。刘裕打进了长安，拓跋嗣打算派一支精锐骑兵，直捣彭城（现在江苏徐州市）和寿春(现在安徽寿县)，又向崔浩问计。崔浩对他分析了当时形势，以为“西有屈丐（即夏，屈丐的意思是卑下，北魏称赫连氏为屈丐以示侮辱)，北有柔然”，出师对北魏不利。崔浩当时谋略无双，担心的就是夏和柔然，可见他们对北魏的威胁是很大的。

柔然是鲜卑的一支，又叫蠕蠕或叫芮芮，长期游牧在拓跋部的北边，冬天从漠北迁向漠南，夏天又回到漠北，每年向拓跋部贡献“马畜貂豽皮”。拓跋珪攻打过柔然，把这个部落迁到了云中。三九四年，柔然首领社崙逃走。四〇二年，社崙征服高车诸部，雄踞漠北，自称豆伐可汗，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游牧政权，东到朝鲜故地之西，西到焉耆（现在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北到贝加尔湖，南面和北魏隔着一片广大的牧地，时常攻掠北魏的边境。但这时，柔然还很落后，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行政的

联合体。

拓跋嗣即位不久，柔然侵犯北魏边境。四一〇年，北魏大将长孙嵩被柔然围在牛川（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拓跋嗣亲自出征，社崙才率众退走。四二三年，南朝的刘宋和北魏交战，正在争夺河南，柔然又进犯北魏边境。拓跋嗣从赤城（现在河北赤城县）到五原筑了一道长城，设了一些镇戍，防止柔然南下，拱卫平城。这时，北魏对柔然还是处于防御的地位。

魏太武帝拓跋焘主动出击柔然，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四二九年。这一年，柔然被打败，原来臣服于它的一些高车部落乘机摆脱了羁绊，被北魏降服的柔然有三十多万家，掳获的马牛羊达到几百万头，敕勒（高车部）也有几十万人向北魏投降。这些降附的部落被魏太武帝迁到漠南几千里的边境上，在军事镇压下，从事农耕和畜牧。另一部分柔然人，往漠北退走，遇有机会，便象一阵风暴，袭击北魏的北方边境。

四二九年这一战，对北魏的影响很大。历史书上说，北魏自从降服这些柔然、高车部落之后，畜产和毡皮的价钱都跌落了。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的战争，也是在打退柔然之后，达到一个高潮。四二九年这一战之后两年，便消灭了夏的残余势力。

夏是匈奴族铁弗部建立的政权。夏的皇帝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是拓跋部的仇人。当拓跋珪打败了铁弗部，刘卫辰死后，勃勃就逃到后秦依靠姚兴。勃勃弃去原来的姓——铁弗，改姓赫连。四〇七年，勃勃脱离后秦独立，称大夏天王；四一八年，赶走刘裕留驻在长安的军队，占有关中（现在陕甘地区），自称皇帝。魏太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四二五年），赫连勃勃死去，夏发生内乱。四二六年，魏太武帝分两路攻夏，一路攻长安，一路攻统万（夏的都城，现在陕西榆林县西南）。这一年，攻下长安，第二年，攻下统万。

统万城高六丈多，城上宽十步，城基宽三十步，城里宫城三丈多高。城是特制过的土筑的，坚硬得和石头一般。宫城内建筑壮丽，有高大的殿阁和楼台，雕镂得穷极工巧。筑这座城，征发了十多万民工。魏军进入统万，魏太武帝对左右说："小小国家，滥用民力到这种地步，怎能不灭亡啊！"

攻下统万以后四年多，夏的残余势力才最后被消灭。

灭夏不久，割据辽东、辽西（现在辽宁）的北燕和割据河西（现在甘肃）的北凉也先后被北魏打败，灭亡了。

西晋之末，中原不少学者到凉州避难，从此以后，凉州成为汉族文化在西北的一个中心。北魏灭北凉，居住在凉州的汉族士人，不少到北魏都城平城去做官，或者当教授。索敞、常爽是当时最有名的两位教授。常爽有学生七百人。索敞的学生，有几十人担任了北魏的重要官职。凉州士人，对于北魏的"文治"，作出了贡献。

魏太武帝是结束中国北方长期分裂局面的重要人物。这个人的特点是果断、镇定，善于用兵。四二四年，和柔然交战，他在云中被围，围骑多至五十重，还神色自若。进攻统万，值大风雨，飞沙扑面，有人劝他暂时退兵，他却乘风雨飞沙，转到敌军侧面，奋勇进击，取得胜利。他又很得军心，作战时，亲犯矢石，将士为他出死力。

十六 盖吴起义

——北魏前期各族人民的起义

四五一年，宋魏交战，魏太武帝围攻盱眙（现在江苏盱眙县北），写信给守将臧质说："攻城的兵士，都不是我们鲜卑人，东北

面是丁零人和胡人，南面是氐人和羌人。你打死丁零人，可以减少我常山(现在河北正定县南)、赵郡(现在河北元氏县东)的叛贼；打死胡人，可以减少我并州的叛贼；打死氐人、羌人，可以减少我关中的叛贼。你打死这些人，对我没有坏处。”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鲜卑拓跋部对非鲜卑的各族人民的压迫和歧视，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北魏的反抗。

常山、赵郡是丁零族聚居的地方。十六国时期，丁零族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后燕的建立，丁零族起过重要的作用。关中是氐族、羌族聚居的地方。这两个族先后在北方建立过前秦、后秦和后凉。

胡人在并州最为集中，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甘肃也有。他们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山胡、稽胡、羯胡、屠各、吐京胡、卢水胡……，照当时惯例，一律叫做杂胡。这些胡人，曾被匈奴征服，他们随匈奴从西域迁来已经三四百年了。

北魏统一北方，实行严峻的军事统治，对待这些少数族人，更加残暴。各族人民，被迁徙到平城附近，强迫从事农耕和畜牧，或者被迫为营户，在军队里服劳役，被当作牛马一般看待。

北魏前期，从魏道武帝攻占中山到魏孝文帝拓跋（元）宏改制，九十年来，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被旧历史书记载下来的，超过七十次。其中，少数族人的反抗斗争，丁零有五次，胡有十八次；氐、羌在关中的起义，魏太武帝时就有两次。

在这些反抗斗争中，四四五年关中盖吴的起义，是北魏前期各族人民起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次。

西晋以来，关中是少数族和汉族杂居的地方。西晋政治家江统说，关中人口一百多万，“戎”“狄”要占一半。少数族中，有氐，有羌，有山胡、卢水胡，还有屠各等。北魏征服关中，在氐族聚居的地方，设仇池镇(现在甘肃成县西)；在羌族聚居的地

方，设李润镇(现在陕西大荔县东)；在卢水胡聚居的地方，设杏城镇(现在陕西黄陵县西南)，实行军事镇压。关中历代的名都——长安，这时也成了军事镇慑的中心，叫做长安镇。各镇镇将全由鲜卑贵族担任，掌握军事大权。杏城镇将曾由卢水胡酋帅郝温充当过，但这不过是“以夷制夷”的个别情况。

所以，关中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表现得最复杂，最尖锐。人民对北魏的残酷统治不满，北魏境内，流传着“灭魏者吴”的谶语。

四四五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起义群众十余万人。它严重威胁着北魏的统治，使得北魏皇帝竟然害怕听到盖吴这个名字。

盖吴以杏城为根据地，这年十月，打败了北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的进攻，自称天台王。接着，他派了一支部队由白广平率领，向西进军，泾河两岸的少数族居民纷纷响应。白广平渡过泾河，在汧城(现在陕西陇县南)打了一个大胜仗，杀死了北魏的守将。盖吴亲自率领主力军东进，攻打李润；后来又回师西攻长安。

北魏的历史书上说，盖吴向李润进军，在黄河边上被魏军打败，有三万多人淹死在黄河里；后来在渭河北岸和魏军大战，又有三万多人被杀。这都是北魏统治阶级的伪造。实际上，盖吴起兵之后，“关内大震”，北魏调兵遣将，从各地调集的骑兵，总数达八万人，连高车部骑兵也从遥远的北方调来了。魏太武帝本人，也不得不在这一年的年底，亲自出马，来挽回颓势。

关中各族人民起义，在四四五年冬末，达到一个高潮。东起潼关，西到汧陇(现在陕西、甘肃交界的地方)，到处燃烧着起义的火炬。盖吴还派了一个使者赵绾到江南去，呼吁宋朝皇帝出兵。

盖吴起兵之前，数百年来居住在河东(现在山西西南部)地区的蜀族领袖薛永宗已经举起了反魏的旗帜，薛安都也已经占领了

黄河南岸的弘农(现在河南灵宝县南)。蜀族是从四川迁到北方的一个少数族，多数居住在河东，有一部分在现在陕西居住。蜀族的起义，和盖吴一东一西，遥相呼应。

四四六年初，魏太武帝带了大兵围攻薛永宗。由于北魏兵力占优势和薛永宗事前准备不够，薛永宗被打败，带领全家老小，投入汾水，壮烈地牺牲了。薛安都被迫放弃弘农，到南方投奔宋朝。

蜀族起义被镇压后，魏太武帝渡过黄河。北魏军距离盖吴主力军不过六十里，但是魏太武帝不敢决战，沿着渭水南岸直奔长安。魏太武帝企图用屠杀来稳定渭河以南的秩序，在周至（现在陕西周至县）血洗了以耿青、孙温为首的两个武装居民点。长安有一座佛寺，里面存放了一批武器，魏太武帝认为和尚不该有武器，一定是和盖吴通谋，把全寺的和尚都杀光了。

后来，盖吴的主力在杏城被北魏将军乙弗拔打败，魏太武帝从长安回到平城，又特地派兵去李润，屠杀羌族的居民。

但是，屠杀熄灭不了反抗的火焰。在盖吴主力军被打败之后，由边冏、梁会领导的氐、羌、屠各等族人民起义的火光，又在金城(现在甘肃榆中县西北)、天水(现在甘肃天水市西南)照亮着被压迫者的希望。盖吴也重新结集了力量，回到杏城。关中人民起义，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北魏从河北增调两万兵力，在长安以南布防。

顽强的战斗，从五月到八月，差不多继续了一百天。起义军的领袖白广平在战斗中牺牲了，有些领袖被俘。盖吴也牺牲了，死时只有二十九岁。有人说他是为屠各叛军所害，也有人说他是被亲属出卖了。

盖吴死后的第二年(四四七年)，吐京胡和山胡起义。山胡领袖曹仆浑被杀害，起义群众，誓死不降，“赴险死者以万数”。

二十年后，杏城这个地方，盖平定、成赤李和曹平原又先后举起盖吴的旗帜。

再过二十年，杏城镇改置了北华州，李润镇改置了华州，仇池镇改置了渠州。关中这个地区，严峻的军事统治机构便被官僚行政机构代替了。

十七 崔浩之死

——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的矛盾

四五〇年盛夏的一天，一辆囚车载来一个白发苍苍的囚犯，停在北魏都城南面的刑场上。人声嘈杂，几十名卫士，轮流地对着囚车撒尿，尿水朝囚犯身上淋去……。这个备受凌辱的囚犯名叫崔浩。他足智多谋，在北魏做过五十多年官，身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三朝。

和崔浩一同处死的，还有他的全家和同宗的亲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几家当时著名的大族也被牵连，死了不少人。

谁都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为几代皇帝所信任的大官僚，会遭到那样的惨祸！

北魏的历史书说，崔浩晚年奉命修史，对北魏历史，主张据实直书；史书修好了，刻石立在大路边，让人们观看。一些“直书”暴露了北魏的丑事，触怒了鲜卑贵族，太武帝也很气愤，因此，兴了这一场大狱。

事情的真相，可没有这样简单。崔浩对文字工作，一向谨慎。一生中为人写过几百份《急就章》，其中“冯汉彊（彊即强字）三字，不敢照样写，“汉”字一律改为“代”，写作“冯代彊”，免得鲜

卑贵族多心。再说，和他一同修史的高允，写得比他多，也没有因此遇祸。说是修史遇祸，不过是想隐瞒真相。

崔浩是汉族士族的代表人物。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害。鲜卑贵族对汉族士族，既要拉拢，又要防范。

四三一年，魏太武帝下诏，征聘卢玄、崔绰、李灵、高允等数百名士族的代表去平城当官，明白规定要礼请，不要“逼遣”。这是北魏对士族的拉拢。

长时期以来，这些士族、豪强的代表，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保持汉魏（曹魏）以来的特殊身分和地位，传播为士族统治服务的文化。在一定时期里，这是和鲜卑贵族格格不入的。

太原王氏是西晋以来的显贵。东晋末，王慧龙从江南出走，来到北方。崔浩的弟弟羡慕王家的门第，把女儿嫁给他。有人说，王慧龙并不是王家人。崔浩见了王慧龙，看到他的鼻子生得很大，不禁赞叹道：“这是真正的王家人，是个贵种。”原来王家人在生理上有个特征，世代都出酒糟鼻（当时叫做齇，音渣），南方管这一家姓王的叫“齇王”。崔浩对于士族的家史很熟悉（当时，这也是一种学问，称做“谱学”），王慧龙一经崔浩“鉴定”，便证实是“贵种”了。

崔浩对王慧龙的赞美，曾激怒过鲜卑贵族，认为他贬抑鲜卑，被迫在太武帝面前承认了错误。以鲜卑贵族为首的北魏统治者，怎能容忍除了他们之外，还别有“贵种”呢。

“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是魏晋以来士族统治的传统，其目的无非是区别士、庶，保持士族在社会上的特殊身分和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当魏太武帝提倡“文治”的时候，崔浩也跃跃欲试，和卢玄商量，打算再搞这一套。

作为汉族士族的一个政治上的代表，崔浩始终忠心耿耿于这

个阶层的利益。他推荐了许多士族出身的人在朝廷当官。有一次，要任命几十名士族当郡守，太子拓跋晃不同意，他就和太子力争，结果还是照他的意见办了。对此，鲜卑贵族是不甘心的。崔浩还宣传西周的封建五等制，说秦始皇、汉武帝废封建、立郡县是错误的，他希望北方的世家大族能够对鲜卑统治者保持独立的统治地位。这就使鲜卑贵族更难容忍。

这样，他就在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的斗争中，遭到了杀身之祸。有人说崔浩被杀，是因为四五〇年拓跋焘南侵，他“密有异图”，而且在北魏统治区域内还有人响应，这很可能是实情。否则如上所说，作史的不只他一人，而他向来又谨慎小心，不至于兴这么样的大狱。

崔浩被杀，卢玄的儿子卢度世躲在郑羲家里。追捕的人来到郑家，拷问郑羲的长子。事先，郑羲对儿子说：“君子杀身成仁，你死也不能吐露真情。”郑羲的长子直到全身被火烙得焦烂死去，也没有说一句实话。汉族士大夫和崔浩，毕竟因利益相同，而生死同心。

北魏统一北方之后，汉族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剧烈，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的结合也就日趋紧密。崔浩死后不久，魏太武帝就说他“死得可惜”。不到一年，卢度世得到赦免。四十年后，崔浩所梦寐以求的区别士、庶这件事，由魏孝文帝来执行，“国姓”（鲜卑贵族）和“郡姓”（汉族士族），同样被安置在北魏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可能，这是崔浩所没有想到的。

十八　“新　民”

——北魏前期统治中心地区的矛盾

三九八年，北魏在平城建都。平城周围，叫做“畿内”；环绕

着畿内一千多里的地方，叫做“近畿”。这些地方，过去是拓跋部游牧的故乡；北魏建立，成了它的根据地，也是它统治的中心。

北魏前期，这个地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被征服的各族人民，陆续被迁往这里。有从东面来的，有从西面来的，有的来自朔漠，有的来自中原。其中，有沮渠氏和赫连氏的余部（北凉和夏的余众），有人数众多的汉族和高车族，有历史悠久的蛮，有开始出现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奚（库莫奚，东胡种）。

十六国时期，各族统治者都纷纷迁徙民户，集中在都城的附近，但没有一个有北魏这样的规模。

三九八年，魏道武帝打败后燕，从后燕境内（现在河北和山东的一部分）迁来汉族、徒河（即鲜卑慕容部）、高丽和杂夷三十六万人，加上“百工伎巧”（手工业工匠），共达四十六万人。四二九年，魏太武帝降服高车，把几十万高车人，迁到近畿的北边和西边。四五一年，南朝“降民”被迁到这个地区来的有五万家，一家以五口计算，总数当在二十五万。

这是几次规模较大的迁徙。在魏孝文帝迁都之前，一百年中，北魏把被征服和降服于它的各族人迁到畿内和近畿，大约在二十次以上。

大量的劳动人手，把原来的一些牧场，变成了平畴沃壤。这个地区的农业，有了空前的发展。

大量的劳动人手，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牛牧马，“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个地区的畜牧业，也远比往日繁荣。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和这一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蕴藏在被征服者心中的怒火和鲜卑平民的嗟怨。

被迁徙到这个地区来的各族人民，叫做“新民”。有的“计口授田”，在国有土地上，用官府的牛力耕种土地；有的被保留原有的部落组织，在指定的牧场上，放牛牧马；有的沦为“营户”，被

规定世世代代在军队里服劳役；在皇帝的“恩命”下，有的被作为赏赐给了百官，叫做“隶户”；有的拨给了佛寺，成了“僧祇户”和“佛图户”。所有这些人，象奴隶和农奴一样地劳动，来养活北魏的贵族、官僚和僧侣。

更悲惨的是沦为奴隶的人，他们大多是战争中的俘虏。每一次征服战争结束，皇帝把俘虏当作“生口”，和马、牛、羊、缯、帛一样，赐给文武百官。鲜卑贵族可以合法地占有二百名奴隶，实际上，大贵族占有的奴隶，有的多到几千。贵族家里，还有一个专门管理奴隶的“典师”。北魏前期，宫廷里用奴婢从事各种生产劳动，有织绫、织锦的，有造酒的，有养猪、养羊的，有种菜的。贵族家里的奴婢，想来也是这样。

北魏在河西有一个广大的牧场。这个牧场就象一座火药库，时常爆发牧奴反抗北魏统治者的斗争。北魏的军事重镇薄骨律镇（现在宁夏灵武县）、高平镇（现在宁夏固原县）、统万镇（现在陕西榆林县西南），怀朔镇（现在内蒙古包头市东北）、沃野镇（现在内蒙古五原县西北）在牧场四周形成一个包围圈，北魏统治者把重兵驻在这些地方，对于在这里放牧的牧奴来说，简直是个大牢狱。四三〇年，高车三万多家被迁到这里来。高车人说：“把我们圈在这个地方，岂不是有意要加以谋害！”于是，一千多骑往西奔向凉州。路上没有粮食，北魏兵又在后追捕，但是这些高车人宁愿饿死，也不肯回头，最后悲壮地“相枕而死”了！

鲜卑拓跋部的成员，自从“分土定居”以后，有的耕种土地，有的从事畜牧。他们是自由农民和牧民，但主要的职业还是从军。在征服战争中，有些人发了财，有些人战死，有些人从战场上回到家乡，在凄凉的茅屋下等待着新的出征。小农的贫富分化，本来是不可避免的，征服战争加速了这一过程。四四四年，北魏皇帝命令有牛力的人家借牛给无牛力的人家耕种，借牛耕地七亩，以

耘锄两亩地来报偿。四七三年，又重申前令，而且规定，不服从命令的有牛力的人家，一辈子不许当官。统治者企图以行政命令来延缓这种贫富的分化，但分化并不因此而停止，不少鲜卑人终于失掉了生计，在外游荡，三分之二成了“游手”。

征服战争的胜利，富了北魏统治者，肥了鲜卑贵族。贵族的奢侈和平民的饥寒，形成了尖锐的对照。魏太武帝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便提倡节俭。他夸奖一个叫长孙道生的贵族，说这个贵族的熊皮障泥（马具上的一种饰物，是用来遮挡泥污的）用了几十年，还舍不得调换。但贵族的奢侈如故，和所有封建统治者一样，魏太武帝的这种提倡，只能是停留在嘴上的教条。

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在这个地区，沦为农奴和牧奴。他们无时不在努力摆脱鲜卑统治者的羁绊，企图打碎身上的枷锁。这些人和鲜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地激化着。这是三九八年以来，这个地区的一个新的、基本的矛盾。鲜卑平民和贵族的斗争，久已存在，随着征服战争的胜利、结束，更不断地尖锐起来。魏孝文帝迁都之后，不到三十年，被压迫的农奴、牧奴和鲜卑平民便形成一个伟大的力量，在这个地区，掀起一场大风暴，震撼着整个北魏的统治。

十九　坞壁和坞壁主

——北魏改革前汉族居住地区的矛盾

六世纪初，清河郡（现在河北临清县）东南，有个地方叫曲堤，一家姓成公的大姓在这里聚族而居。曲堤水道纵横，到了秋天，芦苇的瑟瑟声，随着风来，又随风飘逝。人们说，“宁度（经过）东晋会稽，不历（经过）成公曲堤。”原来，正象会稽是江南

大族聚居的地方一样，这里是成公一姓盘踞的地方。他们谋财害命，为非作歹，比会稽的大族还要来得凶狠。

曲堤这一事例，典型地说明了坞壁的独立地位和坞壁主的横暴。

西晋末年，北方混战，大地主结聚宗族乡亲，筑坞立壁，保护自己的封建权利。这些大地主，便当上坞主、壁帅，或者叫做垒主、堡帅。堡、垒和坞、壁一样，都是武装割据性质的据点，简称为坞壁。

佃客、部曲画像砖之一

在这一二百年中，坞壁不断发展。有的依山傍水，有的平地筑城；一个坞壁，往往包括几百家、几千家，甚至一万家。小坞壁依附大坞壁，大小坞壁有时结成一个坞壁群，连州连郡，听命于一个高门大族出身的主、帅。北魏初年，武装反抗拓跋部的卢溥，便是这样一个人物。

坞壁内部，有田园、陂池、山林、牧场，有农艺和畜牧，还有小小的作坊。它们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的武装。五世纪末，广平(现在河北曲周县北)人李波，率领宗族和北魏官军对抗，官军被打得大败。李氏这一姓，不但男子弄

刀使枪，女子也学习武艺。李波的妹妹走马射箭，箭不虚发。人们为她编了一个歌，夸奖了她的武艺，也揭发了这个坞壁主的横暴。歌词是："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走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武装力量，是保持坞壁独立地位的一个重要条件。

坞壁主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族观念和地方观念，保持封建

佃客、部曲画像砖之二

割据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同姓的人，聚族而居，叔叔伯伯，哥哥弟弟，叫得怪亲热的。但这不过是一层掩盖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在某一些坞壁联合的中心地区，还有教育和文化事业，传播着有利于这种统治势力的封建文化思想。

坞壁的居民，最多的是佃客、部曲和奴婢。部曲是坞壁主、帅的私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佃客、部曲的身分，和农奴相似。北魏初期，有一些坞壁主、帅率了"乡部"向鲜卑统治者表示归顺，有一些和鲜卑统治者武装对抗。"乡部"中，包括了属于坞壁主、帅私产的佃客、部曲和奴婢，也包括了为他们所控制的地主和农民。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和主、帅之间，存在着某种封建的义务；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农民，往往是由于战乱，或者是担负

不了封建国家的赋役，投到这些坞壁主的门下，把收获物的一部分交给他们，替他们服役、当兵，成了他们的“荫户”的。这些人，在政府户口簿上没有名字，登上了坞壁主的家籍，为坞壁主提供财源和兵源。

当西晋的统一国家瓦解之后，各族统治者在北方建立政权，几乎没有例外地和这些坞壁主、帅发生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十六国时期，著名的君主后赵石勒、前秦苻坚，都曾致力于寻求一个解决和坞壁势力矛盾的方案，把希望寄托在笼络汉族大地主的身上。苻坚攻灭前燕，任用王猛治理东方（前燕的统治区域，现在河北、山东地方）。东方是坞壁势力最强大的地区。王猛受命之后，便任用坞壁主做当地的郡守和县令，给了他们合法的统治地位。

北魏进入中原，在处理和坞壁主的关系方面，有过一些曲折。开始的时候，魏道武帝打算调虎离山，把这些人迁到平城去。但多数人不愿意离开本乡，放弃当土皇帝的权利；卢溥、傅世、仇儒便首先发难，对北魏进行武装抵抗。魏明元帝统治的初年，强迫地方豪强北迁，各地纷纷起兵，反对迁徙。事情闹得很大，武装镇压看来不顶事了，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议，准备用大赦来缓和一下紧张的局面。鲜卑大贵族拓跋屈主张诛杀首恶，赦免从犯；汉族士大夫出身的崔宏，建议全部赦免，他说：“赦了，还继续反抗，再杀不迟。”明元帝接受了崔宏的建议，颁布了大赦令，同时出动大军，镇压继续反抗的坞壁主。

明元帝以后，迁徙这些豪强的政策停止执行了。汉族居住地区坞壁主的权利，得到了北魏的承认。坞壁主叫作宗主，承认了他们对本乡的统治权力。最著名的一些宗主，过去和鲜卑统治者为仇的，现在变成了朋友。卢溥的从弟卢玄，便以“州郡冠冕”的身分被征聘去平城当官，成为北魏“文治”上的助手。

魏文成帝拓跋濬（魏太武帝的孙子，太武帝死后继位）时，陆馥（原来姓步六孤，是鲜卑贵族）做相州刺史，十分注意与当地士大夫和豪强合作。他象对待朋友那样对待相州地方势力的代表，和他们商量一州的大政，请他们出谋献策。这样的人，一共有十个，号称“十善”。又在各县豪强中认了一百多个“假子”（干儿子），做他的耳目和爪牙。

坞壁主和鲜卑统治者穿上了连裆裤，取得了一时的相安。但汉族人民的反抗，随着这种相安一天一天地剧烈。人民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连篇累牍地见于当日的官方文书。后来，魏孝文帝在位的头十二年（四七一到四八二年），北魏各地人民的起义超过了二十次。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四七三年，北魏下了一道命令：能禁止一县“劫盗”的县令，兼治两县，食两县的俸；能禁止两县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任郡太守；郡太守能禁止两郡“劫盗”的，兼治三郡，过了三年，升任州刺史。

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此伏彼起，摇撼着北魏的统治。

有钱有势的人家占有土地，连山连水，望不到边际；贫苦无势的，希望有一块自耕自种的土地，但这种希望却永远不能实现。阶级的对立，在汉族居住地区象黑白那样分明。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基本矛盾，依然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矛盾。

当北魏改革方案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便有着这样一种呼声：“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不能尽让有势力的人家，独占肥美的土地；势单力薄的人，也得给他们一块可耕可种的土地。）

二十 “班　禄”

——北魏改革之一

北魏在孝文帝时，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了几项重要的改革，“班禄”（给百官俸禄）是其中的一项。这是拓跋部封建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北魏建立以来，对文武百官，不给俸禄，四八四年，开始“班禄”。俸禄中，有米，有田，有布帛，有力役。“班禄”之后，这些东西，按照官品大小，定出差等，分给了百官。北魏的力役，有的叫“吏”，有的叫“幹”。“吏”和“幹”，身分与农奴相似，替官员当差，或在“公田”上劳动，把收获物的大部分交给官员。

这个制度的实行，在北魏，是经过一番曲折的。

鲜卑拓跋部本来是个野蛮的好战集团，一走上历史舞台，便以战争掳掠为业。鲜卑将士，在战争中大肆掳掠，牛羊、珍宝、人口都成了掳掠的对象。北魏皇帝也常把战争中的俘虏赏赐给群臣。

对于进入文明不久的鲜卑人来说，掳掠是完全正当的，也是合法的。

征服战争结束了，鲜卑拓跋部统治了广大的经济文化较先进地区。北魏皇帝用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即坞壁主、帅）做州刺史和郡太守。一州三个刺史，两个鲜卑贵族，一个汉族地主。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狼狈为奸，战时的掳掠方式，便以平时贪污的形式继续下去。汉族封建的俸禄制，当时对于鲜卑人说来，还是格格不入的。

有一个叫崔宽的人，在陕城（现在河南陕县）当镇将，和地方豪强打得火热，从他们手里接受“礼物”（即贿赂），又利用这个地方和南边贸易往来的便利，大做买卖，几年中，发了大财。当他任满回平城时，豪强上书皇帝，对他表示依恋，皇帝也称赞他善于“抚纳”。和崔宽打得火热的人们，就是这个地方的坞壁主、帅，或者说是汉族大姓。

这是孝文帝改革以前不久的事。在北魏统治者看来，崔宽是不能算作贪污的。第一，他所接受的“礼物”，是由于送礼者的自愿；第二，崔宽在陕城并没短欠政府的收入。用当时的话来说，至多只能说是“义赃”，义的意思就是自愿。文武百官，“盗没军资，所在掳掠”，损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串通富商大贾，乘老百姓交纳租赋，放高利贷，买贱卖贵，损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自己发了财，政府的赋税却收不足，损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才算是“赃”，算是枉法，算是贪污。

战时的掳掠，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平时的贪污，加深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北魏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困难。

远在魏太武帝时，便开始了对贪污的惩罚。四二六年，太武帝去东方视察，这个地区的守宰，因贪污免去官职的有十多名。四四七年，鲜卑贵族拓跋处真等八人在镇压盖吴起义时，“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计”，也判了死刑。

但是，贪污的地方官免不尽，掳掠的将领杀不完，人民反抗的浪潮，却一个连着一个。四五四年，鄯县（现在河北任丘县北）人民起义，文成帝亲自去镇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被惨杀，十五岁以下的男子被罚作“生口”。过了六年，邻近鄯县的深泽（现在河北深泽县东南）、束州（现在河北河间县东北）两县的人民，又愤怒地把县令杀死。

四六一年，文成帝被迫下令禁止贪污，规定犯赃绢十匹以上的处死刑。文成帝的儿子献文帝拓跋弘在位，更进一步规定：受羊一头，酒一斛的处死。有一个叫张白泽的人对献文帝说："你这样不行啊！接受一头羊，一斛酒，便办死罪，谁还能和你共治天下呢？最好的办法是模仿过去的制度，实行'班禄'，给了俸禄，还贪污，再办罪不迟。"献文帝认为张白泽的话有道理，停止了羊酒之罚，但"班禄"的事还不能实行。

四七八年献文帝的儿子孝文帝在诏书中说："各州刺史，只图私利，不顾国家，为非作歹，闹得'盗贼并兴'。"对这些刺史责骂了一番之后，又用转趋和缓的语气向他们呼吁，要他们出主意，使他既对得起祖宗，又使百姓"感恩"，平息人民群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浪潮，保持鲜卑贵族的统治。

六年之后，四八四年，"班禄"便成为北魏改革的前奏。

鲜卑贵族内部，象对待其他各项改革一样，因为"班禄"，形成了一个反对派。这是一个反动的保守派。

这一派的领袖，是鲜卑大贵族淮南王拓跋它。他请求皇帝依旧"断禄"（停止给百官俸禄）。这一派人，坚持鲜卑贵族的利益，要求保持拓跋部野蛮掠夺的遗风。北魏皇帝让大臣们公开辩论。高闾说："不给俸禄，贪财好利之徒，可以为非作歹；清白自守的人，连生活也不能维持！"高闾是"班禄"派的代表。

辩论的结果，高闾得到了胜利。形势毕竟比人强。

北魏皇帝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对贪污不得不实行禁止、惩罚；又是因为这样，才被迫"班禄"，实行汉化。

俸禄制实行后，规定犯赃绢一匹以上的处死刑，"枉法"的不论多少，一律处死。

四八四年六月，正式"班禄"后，这一年九月，刺史以下官吏，因犯赃被发觉，有四十多个人办了死罪。其中，有一个叫李

洪之的，因贪污从任上押到平城，孝文帝亲自审问了以后赐死。这个人的来头不小，人们都知道他是献文帝的舅舅，孝文帝的舅公，是显宦，又是贵戚；虽然在他死了以后，孝文帝向一些大臣泄露，说这个舅公是冒牌的。

但是地主阶级贪婪、卑鄙、残酷的本性，并不因俸禄制的实行和孝文帝对贪污的严厉惩办而有所改变。一时显得有点清明气象的吏治，在孝文帝统治期间，只不过昙花一现。

二十一 “三长法”

——北魏改革之二

“三长法”是北魏一项重要的改革，正式实行，可能是在四八五年，比“均田制”早一些。

“三长法”实行之前，北魏地方基层政权，掌握在宗主手里。宗主的前身，就是坞壁主。北魏和坞壁主合作，已经很多年了。坞壁主的代表，有的担任朝廷官职，有的当了地方的守、令。一般坞壁主，得到“宗主督护”这一官职做护身符，用“宗主”的名义，“督护”地方，替朝廷征收租赋，和朝廷分享剥削人民的权利。

在“宗主督护”的情况下，一户往往包括三五十家，户主（即宗主）向朝廷交纳租调，计租粟二十石，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调外帛一匹零二丈，这叫做“常赋”。常赋之外，还有“杂调”。杂调大概包括了各种劳役。北魏在“班禄”之后，每户又增加粟二石，帛三匹多。如果三五十家平均负担这些租调，并不算重。但实际上这些负担却沉重地落在劳动人民的身上。有钱有势的人家“兼并有余”，一般老百姓“糊口不足”。一些依

附于豪强的荫户，境遇更为悲惨。

“宗主督护”使汉族豪强和鲜卑贵族得到了政治上的相安，但是朝廷收入却因此受到影响，阶级矛盾也不断激化。“人困于下，官损于上”，正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当北魏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靠对汉族居住地区的剥削时，一场和豪强争夺民户的斗争，便不可避免了。

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部统治者内部争夺民户，十分剧烈。前燕快要灭亡，把贵族占有的户口二十多万收为朝廷的编户，闹得满城风雨。后来，后燕和南燕也这样做了。南燕清查荫户，还调兵遣将，如临大敌。

北魏皇帝和贵族豪强争夺民户，没有走他的前辈采用武力的老路。他是以古为法来改编户口的，用汉族传统的什伍组织，代替了“宗主督护”这一鲜卑旧俗。

“三长法”规定：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大户分成了小家，“三长”也直属于州郡。过去半属于朝廷和不属于朝廷的户，现在都成了朝廷的编户。宗主的权力被削弱了。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发徭役和兵役。对整个地主阶级来说，三长制是一种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更有效的机器。

但是宗主仍然保持特殊的地位。他们被选任当了“三长”，免去了征戍的负担，家属中也有一至三人受到了同样的优待。

过去以户为单位的赋役制，改成了以“家”为单位。一夫一妇算作一家，每年向国家交粟二石，布或帛一匹。没有成亲的男子，四个人相当于一夫一妇的负担。占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家，奴婢八人或耕牛二十头，交一夫一妇的粟和布。在这里，豪强也受到了照顾与优待。

在实行“三长法”的时候，北魏朝廷有过不同的意见。坚持宗

主利益的郑羲，认为这个办法看来很好，却不一定行得通。他对皇帝说："你不相信，试行一下，失败了，才知道我的看法不错。"郑羲是中原有数的高门，做西兖州刺史时，天天有人送贿赂上门，"礼物"从西门进来，便在东门卖去。送"礼"来的人，连一口酒肉也捞不到。朝臣中，大部分人都赞同郑羲的意见。这是反对派。

鲜卑大贵族拓跋丕，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实行起来对公私都有利。不少人认为这个办法好是好，但农忙时节，派人下去清查户口，恐怕老百姓要骚动，影响农事，不如等到冬天，农闲了再说。向皇帝建议颁行"三长法"的李冲，认为要改，趁农忙时最好，老百姓知道改革对他们有利，改起来容易得多。李冲家在陇西(现在甘肃)，陇西自西晋以来，是中原士族避难的地方，保持了汉族的文化传统。李冲一家，世代相传的是汉魏（曹魏）以来的旧学，汉族封建的旧制，在他脑子里扎了根。这样，"三长法"便成为他主张以古为法，革去"宗主督护"的蓝图。

孝文帝的祖母文明太后主持这场辩论。她作结论说："实行这个办法，有两大好处：一是征收租赋有根据、有准则；二是隐匿的户口可以查出来，企图侥幸的人侥幸不了！有什么不可以实行的呢！"

北魏朝廷从财政收入着眼，从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着眼，坚决地实行了这一项改革。实行之后，政府的收入果然增加了。

在北魏广阔的土地上，出现了一批新的独立的农户。比起过去的荫户来，这些人有了多一些的自由，多一些的独立经济。社会生产也因而有了一些恢复和发展。但北魏的坞壁势力依然存在，"三长"在政治上也依然是宗主的代理人。这一切污秽，还要等农民战争来扫荡。

二十二 “均田制”

——北魏改革之三

北魏实行“三长法”，清查了荫户，改编了户籍，规定了新的赋役制。接着，便行“均田”。“均田令”的公布，可能是在四八五年的冬天，“三长法”实行之后。

“均田”实行之前，北魏土地占有的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是朝廷所有的土地。这种土地，集中在畿内和近畿之地。这些地方，是拓跋部游牧的故乡，后来扩大了，成为北魏的根本。这些土地上，有牧场，有农田；从事畜牧和耕种的，是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称作“新民”的牧奴和农奴。在中原，由于战乱，留下了大量的无主荒地。这些荒地，在名义上，也是为朝廷所有的。

第二，是贵族、僧侣和地主占有的土地。汉魏（曹魏）以来的大土地占有制，经过十六国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贵族、大地主的土地上耕种的，有佃客、部曲和奴婢。在寺院土地上劳动的，有类似农奴的“僧祇户”，相当于奴隶的“佛图户”，还有比这两种人的身分高一些的“沙弥”。

第三，是自耕农的私有土地。自耕农一般是独立的劳动者，但由于赋役的沉重负担，经常失去土地，成为“望绝一廛”（得不到一块耕地）的流浪者，或者依附于坞壁和寺院，沦为依附农民。

十六国时期，中原的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北魏统一之后，生产有了恢复。但鲜卑贵族和汉族坞壁主残酷的掠夺和压迫，生产继续受到阻碍和破坏，“良畴（田）委（被抛弃）而不开（耕

种），柔桑枯而不采”，正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北魏结束了征服战争，经济上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中原地区自耕农的破产、流散，日益紧张的阶级斗争，加深了北魏的政治危机。坞壁主继续扩大对荫户的占有，使朝廷收入受到影响。由争夺民户而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紧张状态，也使得北魏的统治者不能不去寻求医国的药方。

强大的政权力量和中原大量存在的荒地，为北魏皇帝提供了改革的主观力量与客观条件。政府和豪强争夺民户，构成了改革的中心内容。

“三长法”的实行，不少荫户从豪强控制下转入了政府之手；政府便分给他们荒地，让他们在土地上固定下来，以保证赋役的收入。

“均田令”规定：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开始向政府“受田”（领种土地），到了不能劳动或者身死时，把土地还给政府。奴婢和一般老百姓同样“受田”，耕牛也“受田”。一户之内，奴婢“受田”不限人数，有多少奴婢，按规定受多少田，耕牛却不能超过四头。

田有两种：一种叫露田，一种叫桑田。

露田本来是无主的荒地，规定不能种桑、榆、枣等果木，按规定领种，按规定还给政府，不能买卖。男子一人领种四十亩，妇女二十亩，奴婢同样。耕牛一头则为三十亩，占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家，因为出卖或者死亡失去了对奴婢和耕牛占有的权力，领种的土地要交还。

桑田是已经种了或者允许种桑、榆、枣等果木的土地。对于桑田，令文中规定得很细致。一则说，桑田“不在还受之限”，只领种，不必还给政府。再则说，所有桑田都是“世业”，可以世代传下去。一户之内，按规定应有一定数目的桑田，自有的土地达

到了这个数目，政府便不再给；不足的，由政府补足。一户之内，桑田有余，可以出卖；不足，可以买进。

男子一人，领种桑田二十亩，奴隶同样。桑田不论是人们原有的，或是新从政府领种的，都是私产，在一定限度内，可以买卖。奴隶领种的桑田，当然也就成为奴隶占有者的私产了。

此外，还有一些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倍田”的规定。所谓倍田，即加倍或三倍给予土地，领种露田四十亩，给八十亩或一百二十亩，理由是因为土地要休耕，两年轮种或三年轮种一次。而这，恰恰方便了地主保持原有土地。所有桑田，按照规定都算到倍田中去，不足倍田之数，才用露田来补足。适宜于种麻的地方，男子还可领种麻田十亩，妇女五亩。奴婢也可以照样领种。麻田是要交还的，不能成为“世业”。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被保存下来了，占有奴婢的人，不但合法地占有了原有的土地，还可以合法地以桑田的名义占有政府的荒地，以露田的名义使用荒地。但豪强兼并有了限制。对于那些荫户和流浪者，“均田制”的实行，为他们提供了自立门户的条件。

在中世纪，封建剥削主要是通过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虽然保存自己的土地，但他是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为土地占有者劳动或缴纳产品。“均田”实行之后，“望绝一廛”的农民，便以和过去不同的一种形式被束缚在土地上，向政府缴纳产品了。

在这一点上，北魏皇帝做到了在他以前将近三百年来所有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

五二〇年，北魏户口，比西晋全盛时期的太康（晋武帝年号。太康元年，西晋统一全国）年间，增加了一倍，超过五百万户。这时，北魏南边的边境，还不过淮南。这不仅说明了百余年

来北方经济因统一而逐渐有了恢复和发展，人口增加了；也标志着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重新获得了力量，皇帝对地方割据的势力，采取了有效的裁抑措施。“均田制”是这些措施重要的组成部分。

北魏末年长期战乱，地方豪强又乘机鱼肉人民，称王称霸。“均田”名义上仍为北魏的继承者——东魏和北齐、西魏和北周——所遵行。但是在东部，“富者连畛亘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均田制”已名存实亡；西部的情况不同，北周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恢复了中断的北方统一。

“均田制”直到唐朝由全盛走向没落才失却它的作用，成为历史的陈物。

二十三 魏孝文帝

——北魏迁都和汉化的高潮

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杰出的君主。他五岁做了皇帝，国家大事，决定于他的祖母文明太后。文明太后是一个有才略的政治家，在献文帝时，便掌握大权，前后当政二十五年。五世纪八十年代，她排除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的阻挠，进行了巨大的改革。孝文帝在她影响下，深受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从经史百家中学习了汉族封建统治的经验。

人们说，文明太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孝文帝早熟、机灵。太后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不利，有一次，把他关在空屋里，天气很冷，只让穿单衣，三天不给饭吃，打算把他废掉；又有一次，因为宦官说他的坏话，还“杖”了他几十下。

四九〇年，太后死了，孝文帝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

丧，开始不进饮食，后来勉强吃一点，但也吃得很少。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哀。孝文帝却以为祖宗时，南征北战，“重武略，不重文教”；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要在“文治”上下功夫。他对祖母的“哀慕缠绵”，也许并不是由于悼念，而是激励生者继续进行汉化，为进一步搞好“文治”做个样子。

在政治上，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的肖孙。这两个人的事业，都是在用汉化巩固北魏的统治，而孝文帝更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四九五年，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标志着这一新阶段的开始。

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平城和所谓近畿之地是北魏政权的根本所在，夏和柔然时时威胁着它的西境和北境，而中原地区也还因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之间的隔阂尚深，迁往中原，不能不使鲜卑统治者有所顾虑。

北方统一之后，实行“文治”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合作，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强。北魏政权，也愈来愈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原来出战士，输战马，征伐四方的中心——平城，担当不了“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当日形势的要求了。

一百年来，北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魏的对外关系，转而以和它敌对的南朝为中心。从政治上和南朝争取汉族士大夫，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四二九年，北魏讨论“行次”（五行的次序。照汉代学者的意见，其顺序为木火土金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讨论。孝文帝采纳了李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为水，魏是正统所在。要和南

朝争正统，理所当然的不能再僻处平城，就要把都城迁到汉魏（曹魏）的故都洛阳去。

四九三年，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孝文帝在邺城接见他。王肃出身江南高门，是南方士族的领袖，孝文帝对他十分器重，恨相见之晚。历史记载上说那时孝文帝“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孝文帝继文明太后之后，力图改变鲜卑旧俗，不仅对象王肃那样的人物，恨相得之晚，和南方交战，也屡次释放俘虏，说“在君为君，其民何罪！”还禁止掠夺，宣布犯禁的处极刑。这是在和南朝打政治仗。这样，也就要把都城迁到洛阳去。

迁都洛阳，是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但鲜卑贵族，大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不赞成迁都。

四九三年，孝文帝不得不以南伐为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这一年秋天，他率领步骑三十万，到了洛阳。在洛阳，他参观西晋宫殿的遗址，象古代东周贵族经过镐京（西周故都，现在陕西西安市西南）宫阙那样伤心。但是，孝文帝并不是为西晋的灭亡而伤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中的诗句），一出由孝文帝扮演主角的迁都的戏，便以这样的独白开了头。

洛阳秋雨连绵。文武百官，对着惨淡的秋天，心情十分沉重。皇帝真的要南伐吗？他们当中，有知情的，也有不知情的。雨越下越大了。九月丙子这一天，孝文帝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往南进发。大臣都跪在马前，叩头谏止进军。孝文帝满面怒容，对着这些人说：“我要统一天下，你们这帮人却屡次阻挠大计。谁再说，就要办谁的罪！”说完，整一整马韁，仿佛就要出发了。一个叫拓跋休的鲜卑贵族，仍然跪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嗫嚅嚅地仍在请求皇帝不要南进。孝文帝

富于表情的脸，忽然换了另一种颜色，用另一种口气对群臣道："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不南进，便迁都。你们赞成吗？赞成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

这一出戏演得很出色，大军在洛阳停下来了，迁都成了定局。在南伐和迁都这两件大事上，这些文武百官，暂时选择了迁都。因为南北双方，多次在战场上较量过，南伐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愿担风险。

任城王拓跋澄被派回平城去做说服工作。他原来也弄不清南伐的目的，和孝文帝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孝文帝私下告诉他："平城只能用武，不适宜于文治。"他这才转过来支持迁都。拓跋澄动身回平城时，孝文帝郑重地嘱咐他："要好好干啊，革去旧俗的日子，已经到了！"

另一位大贵族于烈，被派回平城担任留守的重任。孝文帝曾经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说："你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内心，是一半乐迁（赞成），一半恋旧（不赞成）。"孝文帝认为这个人忠直，说："你不唱反调就行啦！"

平城贵族知道要迁都，一时很是震动。拓跋澄回去后，百般晓喻，不安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四九四年，孝文帝又亲自回到平城去，召集文武百官，晓以迁都的利害。

北魏汉化，经过的时间很长久，道路很曲折，在鲜卑贵族中，始终存在一个反对派；落后保守的势力，始终阻碍汉化的进程。

孝文帝对反对派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很认真；但反对派顽固到底，四九六年，终于掀起一场叛乱。鲜卑大贵族穆泰、陆叡，阴谋在平城建立一个和洛阳对抗的政权；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在反对派的怂恿下，密图从洛阳逃回平城去。武装叛乱被压平了，拓跋恂被废后终于赐死。

西晋灭亡以来，荒废了一百七十多年的魏（曹魏）晋故都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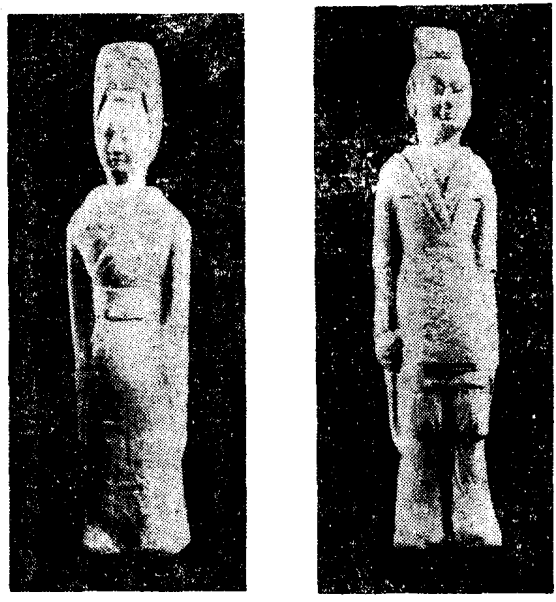
阳，成了北魏的新都。四九三年，孝文帝开始重建新都，到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手上才建设完成。

迁都之后，从平城迁到洛阳的人，叫做“代迁户”，总数约有一百万人；其中，勇士十五万被编成禁卫军（羽林、虎贲）。洛阳附近的河阳(现在河南孟县西)，设了一个新牧场，养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选马到并州牧场，让马习惯内地水土，再迁到河阳来。一部分拓跋部人民以及北边其他各族人民，便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迁都后，摆脱贵族传统保守势力的影响，北魏汉化的改革更广泛，更迅速了。四九五年，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服装，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话，改说河南洛阳话；“代迁户”都在洛阳落了籍，死后葬在北邙山（在洛阳的北面）。有一次，孝文帝在洛阳街上，看见一个鲜卑妇女，坐在车中，作鲜卑打扮。后来，在朝见群臣时，便责备任城王拓跋澄，说他督察不严，奉行命令不力。拓跋澄为自己辩解，说只有少数人这样打扮；孝文帝尖锐地问道：“难道要全部这样打扮才算督察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又转向史官说：“应该把这件事记载下来。”

四九六年，又命令改去鲜卑姓，他自己改姓元，其他改姓长孙、穆、奚、陆、贺、刘……；把鲜卑族的穆、陆等八姓定为国姓，和汉族大姓崔、卢、郑、王同等待遇，享受同样的政治特权。汉族大姓，叫做郡姓；郡姓之中，又分四等，最高的叫做甲姓。从此完全承袭了魏（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以贵袭贵，贱袭贱”，按门第高低来分配官职。但门第高低，皇帝可以左右，和南朝不同。这正如“三长法”和“均田制”的实行，代表中央集权力量的皇帝，在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中占了上风。

孝文帝又通过婚姻方式，来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的联系。他自己取四姓（崔、卢、郑、王）的女子入宫，又为他的五个弟

弟娶汉族大姓的女子做正妻。范阳卢氏，一家娶了三位公主。政治利益进一步把鲜卑统治者和汉族高门结在一起了。



北魏陶俑（左汉服，右鲜卑服）

“文治”构成了汉化的核心。北魏的国家机器，随着封建化的逐渐完成，也更为完备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为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孝文帝和他的前辈什翼犍、道武帝、太武帝、文明太后一样，在鲜卑族汉化过程中，顺应了这一规律，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西晋以来，我国北方各族经历了一场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变动，他们通过和平交往，也通过战争，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文化，形成了这一时期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那些“代迁户”渐渐失去了旧有的联系，在新

的地方取得了新的联系，学得了新的风俗和新的嗜好。残存至今的六世纪中叶的敦煌户籍，说明已成为均田户的匈奴、高车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已经同当地汉人完全没有差别。可以想见，在其他地方，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情况也相差不远。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提倡鲜卑人学习汉族的文化知识。鲜卑贵族自认天资笨，学不来；他却强调重要的是学习与否。他自己学习很努力，亲自动手写诏令，作诗赋，和汉族文人学士相比，并无逊色。

四九九年，孝文帝在南伐的归途中病死，才三十三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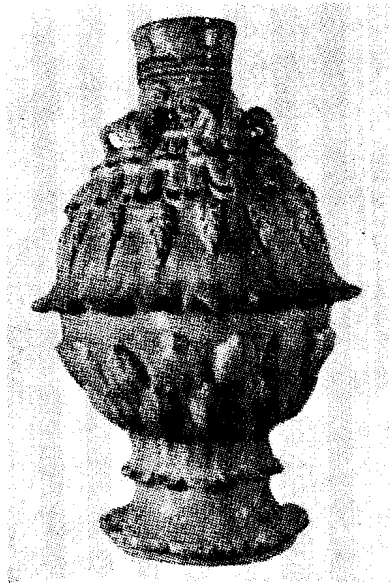
二十四　“争富”和“佞佛”

——北魏统治者的腐化

四九三年，魏孝文帝开始营建新都。新的洛阳城，在汉魏（曹魏）故城的基础上重建，前后经过了十年。城东西长约六里，南北九里，大小和故城一样。城外东西南三面，有市场和街坊，伊、洛二水，为这些市场提供了交通运输的便利。如果把这些包括在内，新都的规模，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比汉魏（曹魏）故都大得多。

城南四里的洛水上，有一座浮桥叫永桥。桥南有整齐优美的建筑群；大街小巷，槐柳成阴，掩映着高门绣户。靠东是北魏招待各方来人的地方，靠西是这些人的居留地。从南方来的人住在“金陵馆”，三年以后赐宅“归正里”；从东方来的人住在“扶桑馆”，三年以后赐宅“慕化里”；从北方来的人住在“燕然馆”，三年以后赐宅“归德里”；从西方来的人住在“崦嵫馆”，三年以后赐宅“慕义里”。

居留在这里的所谓“附化之民”，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家。其中，从南朝来的三千多家，老百姓管他们居住的“归正里”叫“吴人坊”；人们在那里贩卖水产，因此又叫“鱼鳖市”。



北魏仰复莲花青瓷尊

城西四里有个大市，周围八里。大市东面，有许多商人的住宅。有一个叫刘宝的富商，住宅建筑得富丽堂皇，进进出出的排场，仿佛王公贵族。他不但在洛阳有商号，各地通都大邑，也都设有商号。每个商号养马十匹，供贩卖时运输。历史书盛夸他的买卖无所不至，说是舟车可以到达的地方，都有他的买卖。这些大商人，把全国各地，远至外国的物产运到洛阳来，供贵族、官僚享用。他们和贵族、官僚一样，受劳动人民供养，吸吮劳动人民的膏血。

大市西面的延酤、治觞二里，居民多以酿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酿酒，最为有名。据说，酒味香美，喝醉了，很久醒不过来。王公贵族，去外州做官，都要带上这一佳酿登程。有个叫毛鸿宾的官僚，去南青州当刺史，带了这种酒上任，路上被“劫”；“劫盗”喝了，沉醉不醒，一一被擒。官僚们便把这种酒叫作“擒奸酒”。

荒废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洛阳，成了北魏的新都，也成了北魏

统治者享乐纵欲的中心。象高阳王元雍的住宅、园囿，和皇宫、禁苑一样豪华，吃一顿饭，花费数万钱。河间王元琛，和元雍比富，家里养骏马十余匹，有远从波斯国来的，名为“追风赤骥”，日行千里；马槽是银制的，环锁是黄金制的。他邀集王公饮宴，金银用器几百种，来自西域各国的水晶、玛瑙、赤玉雕琢成的酒杯、饭碗、菜盘，都十分精巧。府库中，藏满了钱绢和各种织物，有毛织的锦罽（音计，地毯），麻织的越葛，丝织的绸缪，罗的颜色洁白如雪，縠（音胡，罗的一种）轻得象雾。他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石崇是西晋有名的富人，曾和大贵族王恺斗富，晋武帝帮着王恺，也斗不过他）元融见了这般豪侈，又叹羡，又懊恼，躺在床上三天起不来。江阳王元继来看他，说：“何必这样呢，你的财产，不见得比他少呀！”元融说：“我过去总以为只有高阳王的财产比我多，现在才知道河间王又胜过高阳王！”

贪婪充满了这些王公贵族的心。

统治阶级在精神上同样堕落。五一六年，胡太后（宣武帝元恪的妻子）在洛阳城内造了一座佛寺，叫做永宁寺，僧房楼观，大小一千余间。寺内有九级浮图（塔）一座，高一千尺，上面有闪闪发光的金顶。塔上有金铎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高风永（长）夜”，铃铎声韵铿锵，远远传到十多里外。浮图北面有座佛殿，供奉一尊丈八的金像，十尊普通高度的金像，三尊绣珠像，五尊金织像，两尊玉像，制作十分奇巧。自从佛教传入中国，这样的佛寺、宝塔，还是第一次出现。

五一八年，洛阳佛寺已有五百所；五三四年，激增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佛寺，这时，有三万多所，僧尼多到二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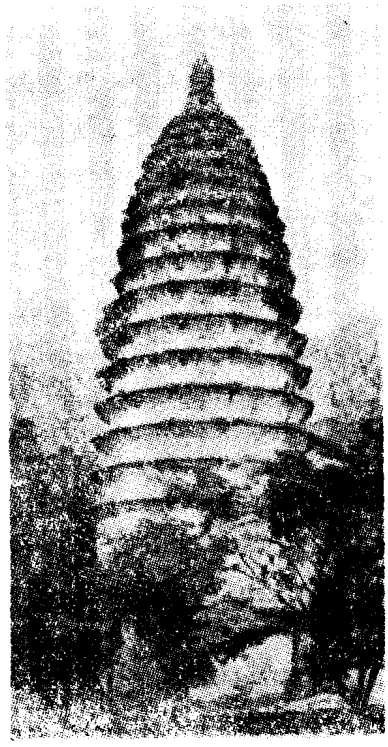
洛阳南面的伊阙，山崖峭拔，北魏皇帝在这里为他们的父母凿石造像，营建石窟。三个巨大的石窟，从五〇〇年开凿，到五

二三年，用了八十多万人工，继续了二十四年。统治者造像立寺，一时成风，贵戚冯熙一人，在各州郡造的佛寺，多到七十二所。

斗富和佞佛，说明了北魏统治者的生活腐化和精神空虚。

兴建佛寺，耗费了无数的人力和物力。在北魏政府残酷剥削之下，忍受不了“调役”（租税和力役）的人们，以出家为名，逃往寺院。一小撮僧侣地主，便广占田园和劳动人手。政府直接剥削的对象，因之减少，其财政收入也减少了。

在魏孝文帝死后不到二十年，北魏便面临着崩溃的命运。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在位时，吏部这个衙门，已经成了卖官的市场，被当时人叫作“市曹”。五〇六年，吏部尚书元晖定价卖官，大郡二千匹绢，次郡一千匹绢，下郡五百匹绢，其他官职，也按不同等级，定出不同售价。孝明帝（宣武帝的儿子）初年，元修义做吏部尚书，上党郡太守出缺，有个中散大夫高居，皇帝已经允许他优先补官，他便求补上党郡守。但是元修义接受了别人的贿赂，不肯给高居这个位子；高居便在公堂上，大呼有贼。有人问他：“光天化日，哪来的贼？”高居指着元修义说：“坐在这里的人，因为别人出了重价，违背皇上命令，



北魏嵩岳寺正光塔（现存）

不让我去当官，岂不是白日行劫吗？”

五一九年，崔亮做吏部尚书，实行“停年格”，当官的人，一律按年资顺序补官。当时，有人认为这个办法不好，不论人才高下，也不管人品好坏，不合任官唯才唯贤的标准。崔亮承认这些意见有理，但认为不合“权宜”。“停年格”的实行，正反映了当时官位竞逐的剧烈，也说明了北魏统治者处理这个问题时的束手无策。

贪污之风一时泛滥成灾。河间王元琛做定州刺史，任满回洛阳。胡太后（孝明帝的母亲，孝明帝在位，由她当政）说：“这个人在定州，什么都要，只差没有把中山宫搬来！”（中山是后燕的都城，北魏皇帝在这里有行宫）

有一次，胡太后带了一班王公大臣去看库藏，让他们自己从绢库里背绢帛，说能背多少，便给多少。大贵族章武王元融，大官僚李崇，都给绢压得跌倒了，一个跌伤了脚，一个跌损了腰。

统治者贪财逐利，丑态百出，这不过是几个例子。

北方经济，在北魏统一之后，经过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有了较大幅度的恢复和发展。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在孝文帝死后三四十年中，被消耗得精光。改革时，规定户调绢一匹长四丈，不准滥收。这时，官吏征收绢帛，每匹却长到七八丈。田租粟米，也因采用大斗、重秤，增加不少。“均田制”下农民的负担，骤然增长了一倍到两倍以上。高利贷者趁火打劫，利息高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五。

“委斗筲（小人）以共治之重，托硕鼠（贪官）以百里之命”，统治阶级中有一些人，对这一现状，也不禁感到悲愤，发出了这样的责难。

二十五 六镇风暴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之一

北魏初年，为了防御柔然，在平城以北筑了一道二千余里的长城；后来，又在沿边要害之处设立了一些军事据点，镇压被征服的高车和其他少数族，拱卫平城这座都城。

这些军事据点，当时叫做镇，最著名的六个，称为六镇。从西往东，顺序数过来，最西的是沃野镇，其次是怀朔镇、武川镇（现在内蒙古武川县北）、抚冥镇（现在内蒙古武川县东北）、柔玄镇（现在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最东的是怀荒镇（现在内蒙古集宁市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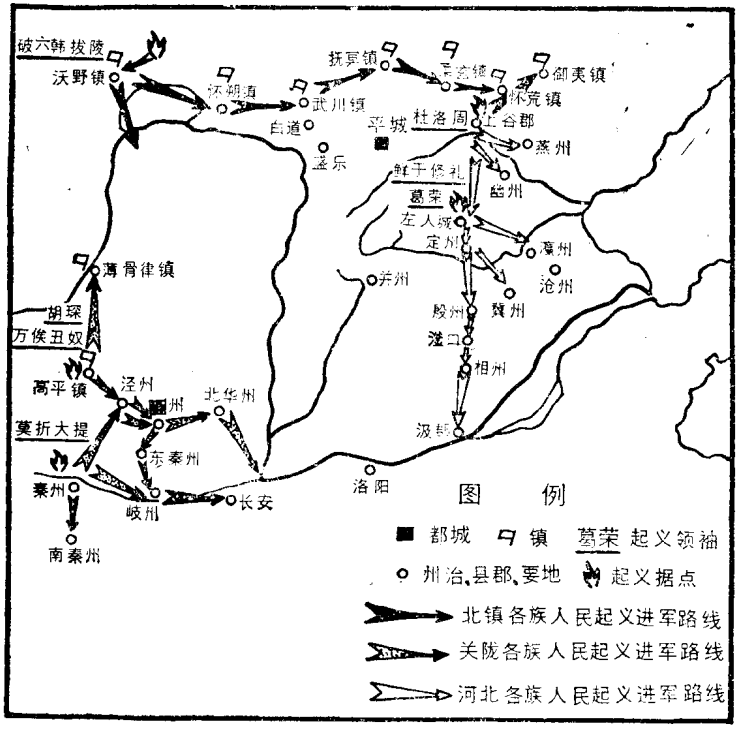
六镇统兵的将领，全由鲜卑贵族担任。戍防军人主要是鲜卑人，也有来自中原的“强宗子弟”。他们受到政府的优待，被认作“国之肺腑”，“寄以爪牙”（把重要任务交给他们）。

在迁都之前，北魏统治者对这些军镇很重视；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还在四九四年作了最后一次的巡视。

南方边境的防守，太武帝以后，逐渐占了重要的地位。北镇精兵，不断地南戍。洛阳成为新都后，南迁的贵族和留在北边的军人，又有了不同的遭遇。南迁贵族和汉族士大夫霸占着各种高级的官位；留边的军人，一生的希望，只不过当个小“军主”。

鲜卑统治者，原来分为改革派和改革的反对派，现在分为南迁和留边两个利害不同的集团了。

戍守北边的鲜卑兵士的地位，更一天一天地沦落。北魏末年，北镇戍兵中，有被驱迫为兵的各少数族人，也有被流配到边镇担任戍守的罪犯。这时候，鲜卑兵士，称为“府户”，被人们当作奴隶一样来看待。戍兵和镇将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图

平城和它的邻近地区，过去是北魏的根据地。鲜卑平民和贵族之间，本来有个老矛盾。四八七年，平城发生灾荒，饿死了很多人，当时有人便说是由于贫富悬殊的缘故。大约过了十五年，又闹起旱灾来，北魏皇帝派大臣源怀去巡抚，源怀报告皇帝说："这一带地方，只有水田可以耕种。肥美的土地，都被大小军官（即贵族）占去了，留给细民（即鲜卑平民）的，只是些薄地和荒地！"他请求皇帝在这里实行均田令，让细民也得到一点好处。贫富分化日益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使老于世故的源怀，深深感到忧虑。

被迁徙到这个地区来的各族人民，和北魏统治者的关系，也没有因岁月的消逝，而有所不同。改革之后十多年，在北魏历史上，人民反抗的记载少了，但在四九九年年初，六镇的高车部落在酋帅树者领导下，掀起过一场反抗的斗争。

这样，北方边镇地区，成为北魏社会矛盾的焦点。贯穿在一切矛盾之中的根本矛盾是阶级矛盾，一方面是北魏统治者，一方面是边镇士兵和各族人民。北魏末年，在这儿的统治，又恰恰是最薄弱的。当五二三年柔然统治者阿那瓌入塞，六镇的“戎马甲兵”，“十分缺八”；阿那瓌长驱直入，北魏在这里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元孚束手被擒，马牛羊数十万头和居民二千被驱掠北去。

阿那瓌的侵扰，暴露了北魏统治的弱点。这一年，怀荒镇镇兵向镇将于景请求发给粮食，遭到拒绝。愤怒的人民，便把于景杀死，揭开了六镇起义的序幕。

大风暴从东到西迅速地席卷了北魏的北部边境。破六韩(姓)拔陵（名）在最西的沃野镇把镇将杀死，占领这个地方，改年号为真王，发出反魏的号召。

被压迫的鲜卑人、高车人、匈奴人、汉人、氐人、羌人、胡人纷纷举起反抗的火炬。熊熊的火光，燃烧着愤怒，燃烧着希望，红遍了整个北部、西部几千里的地方。

五二四年，高平镇（现在甘肃固原县）镇兵赫连恩推高车酋长胡琛做高平王，攻打高平镇。赫连氏是拓跋部原来的敌人铁弗氏的后裔，当他们建立的夏被征服之后，这些匈奴和鲜卑的混血儿，便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高平镇是一个镇压高车人的中心。北魏征服高车，认为他们“粗犷不任使役”，保存了他们原有部落，一部分被迁到六镇附近，一部分被迁到河西牧场，在军事监视下，放牛牧马。从四二九年起，高车人不断地集体逃亡，不断地被北魏屠杀。在被压迫

的各少数族中，高车是深受苦难的一个。高平镇是他们眼中的牢狱。

继高平镇胡琛之后，东、西部高车也接着挣脱锁链，响应反抗北魏的号召。

居住在现在山西崇山峻岭中的胡人，一百多年来，反抗北魏的压迫，前仆后继，这时也纷纷起兵。他们甩掉身上的镣铐，在反抗斗争中，锻炼出一个著名的领袖刘蠡升。他在群众的拥护下，在云阳谷（现在山西左云县）占据了一块地方，坚持斗争十年之久。当他最后失败时，统治者在那里清查出来的逃亡户，便有两万。其中，有不少是逃避苛政的汉族人民。

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压迫的斗争。受压迫最深重的人们，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破六韩拔陵占领沃野镇之后，派卫可孤攻打怀朔镇。这个镇的镇将顽抗经年，邻近的武川镇，先被攻破。接着，拔陵大败北魏军于五原，后来又在白道（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打了一个大胜仗，北魏军被打得全军覆没。六镇全部为起义军占领了。

北魏统治者，这时一方面下令释免各镇原来不是罪犯而被迫世代当兵的兵户（即所谓镇户、府户）为平民，改镇为州，并派大官北上进行“抚慰”，企图用笼络的办法来瓦解起义军；一方面以仇为友，和柔然统治者勾结，请求阿那瓌出兵，来消灭起义军。

五二五年的春天，阿那瓌率兵十万，由武川镇西犯。破六韩拔陵正在五原包围了北魏主帅广阳王元渊，元渊派了一个懂得几种民族语言的于谨，去高车营中做间谍，通过一个高车酋长，使用挑拨民族关系的卑劣手段，使起义的西部高车重新归附，放下武器，破坏了起义军的团结。拔陵被迫南下，在阿那瓌和元渊的夹击下，六镇军民二十万为元渊所截击，起义军遭到了失败。

破六韩拔陵是匈奴的后裔。东汉以来，匈奴余部散处鲜卑部落之间。在沃野镇附近，这些匈奴余部，也很可能和高车一样，在北魏军事监视下，为北魏统治者放牛牧马，被当作奴隶。

六镇起义，从五二三年二月怀荒镇镇兵首先发难，到五二五年六月破六韩拔陵失败，共两年零四个月。起义失败后，拔陵的下落不明，可能是战死，也可能为柔然所杀害。

二十万起义的军民，分别被迁到冀（现在河北冀县）、定（现在河北定县）、瀛（现在河北献县）三州。北魏企图用过去对待被征服各族的老办法，把这些人放在它控制力量较强的地方。但这时候，河北也不是统治阶级的乐土，被压迫的汉族农民，正在酝酿着一场斗争；一个革命的大好形势，又重新把这些“降人”卷入了反抗北魏斗争的风暴。

二十六 河北起义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之二

六镇起义之前，河北地区已经不平静，五一四年和五一五年有过“沙门”（和尚）反对压迫的斗争。

五二五年，六镇起义失败，二十万“降户”被迁到这里来。河北人民和这些“降户”结成一体，形成了一个翻江倒海的革命力量，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五二五年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在上谷郡（现在河北怀来县）揭起义旗，仍用真王这个年号，距破六韩拔陵失败，不过几十天。接着，“五原降户”鲜于修礼、葛荣又在定州的左人城（现在河北唐县）重新举起反魏斗争的旗帜。三年中，北魏的幽州、冀州、定州、瀛州、沧州（现在河北沧县东南）、殷州（现在河

北隆尧县）全被占领。河北人民纷纷卷入斗争的队伍，起义军最后发展到了一百万人。北魏这些地区的军事头目、地方官员，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有的投降了。

河北的豪强、大族，纷纷修堡筑坞，和起义军对抗，有一些带了宗族、乡亲往南逃，乘机和北魏朝廷争夺地盘。

河北地区，正在进行一场自东汉以来所未有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大搏斗。但在起义军领导人中间，由于出身不同，思想意识不同，造成了分歧，使起义遭到了失败。

河北人民起义最重要的领袖是杜洛周、鲜于修礼和葛荣。

鲜于修礼是丁零人。在北魏，丁零是最受压迫的少数族中的一个，魏太武帝管他们叫“常山赵郡贼”。鲜于修礼攻打博陵郡，这个地方的大族头目崔孝演率了宗族、家兵协助北魏官员守城，战败被俘，鲜于修礼说：“这是个有声名的大地主，不能免死，把他杀了。”鲜于修礼恩怨分明，对敌人采取了正确的态度。

杜洛周，有的历史书上称为吐斤洛周，可能是独孤浑氏的后代，出身镇兵，属于被压迫的阶层。他和鲜于修礼一样，对于那些被统治者看作下等人的“市令”、“驿帅”，特别重视，“咸以为王（都封为王），呼曰市王、驿王”。

葛荣曾经当过怀朔镇的镇将，从民族来说，无疑是鲜卑人，当时不是鲜卑人不能当镇将；从阶级来说，虽因所处地位和北魏朝廷有矛盾，但毕竟是个留边的贵族（相当大的军官）。在河北人民和北魏统治者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对于鲜卑贵族、汉族士族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一个被俘的鲜卑贵族娄宝，被他称为“娄公”，见了面，叹恨“相见之晚”，希望帮助他成就大事，把娄宝留在军中。后来娄宝便借机刺探起义军情况，作了北魏朝廷镇压起义军的奸细。定州刺史杨津镇压起义军非常凶狠，定州

被起义军占领，他的儿子杨愔，也被葛荣请出来当官，还把女儿嫁给他。

葛荣这样优待鲜卑贵族和汉族士大夫，但这些人对起义军却嫉之如仇。殷州刺史崔楷的侄儿崔巨伦被俘后，装疯卖傻。五月五日起义军大会，葛荣请他赋诗，他写道："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喘吐舌。"公开对起义军表示侮辱。后来他终于找了个机会逃走，还说："宁可南死一寸，不愿北生一尺！"表明他刻骨仇视起义人民的阶级本质。

人们抱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带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参加了反魏的斗争。葛荣和鲜于修礼、杜洛周实质上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阶级的利益。这种不同的阶级利益的斗争，在河北起义军内部，便以剥削阶级的暗害行为开了头。

五二六年，鲜于修礼被暗杀，有的记载说是被北魏收买的起义军将领元洪业干的，有的说葛荣是主凶。元洪业出身北魏皇族，和葛荣气味相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鲜于修礼被害，激起广大起义群众的愤怒。葛荣在群众的压力下，宣布了元洪业投降敌人的罪状，把他杀死。这一年九月，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

五二八年，和葛荣在河北并肩作战的杜洛周，在攻下定州、瀛州以后，声势正盛。葛荣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却掉转矛头，袭击杜洛周。杜洛周被杀，河北人民起义的领导权，完全落到葛荣手里。

这一年春天，洛阳发生政变，尔朱荣掌握了北魏的实权，统治者内部进一步分崩离析。形势对起义军是有利的。秋天，尔朱荣和起义军在滏口（现在河北磁县西北）大战。葛荣麻痹轻敌，叫部下多准备些绳索，骄傲地说："来一个，缚一个！"他自邺城以北，列阵数十里，齐头并进，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尔朱荣抓

住起义军这个弱点，把精锐部队集中起来作为突击力量；又在山谷里分布少数骑兵，“扬尘鼓噪”，以为疑兵；还派遣部队绕到起义军后面，前后合击。起义军失败了，葛荣被俘身死。

但河北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韩楼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五二九年的九月；被尔朱荣胁迫到并州、肆州的起义军民，“大小二十六反”，被屠杀了一半，也终不屈膝。

二十七 关陇起义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之三

北魏西部群山中，居住着氐、羌、胡这些少数族。北魏在这里设了许多镇、戍，筑了城，城内住着驻防的军人。少数族人民被迫迁到镇、戍附近，在军事监视下生产劳动。有的少数族人民，沦为兵户，不少驻防军人是从兵户中来的。有一些被流配到边境来的罪犯，也在镇、戍服苦役，和兵户的境遇相差不远。

北魏统治者任命鲜卑贵族当镇将，少数族酋豪也有一些担任低级的军官。孝文帝以后，这些地方的镇，极大部分改成了州。大镇成了州城，州刺史执行着镇将的任务。担任防守的军人（包括军官在内）和在镇、戍服役的兵户、罪犯，被笼统地称为州民和城民。一般说来，州民和城民是这个地区最受压迫的阶层，在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下，戴着沉重的镣铐。

六镇起义的风暴激荡着关陇的人心。

五二四年，胡琛占领了高平镇，接着，宿勤明达（匈奴族）和万俟（姓，读墨其的音）丑奴（名，鲜卑族）南下，相当于现在陕北和陇东的地方，处处燃烧着烽火。这是关陇起义军的一股洪流。起义军以河西各镇（高平、薄骨律、统万）的镇兵和牧场

的牧奴为主体，就民族来说，主要是鲜卑、匈奴和高车。

另一支起义军，以氐、羌族为主体。五二四年，北魏秦州（现在甘肃天水县）刺史被城民杀死，羌族人莫折大提被拥戴为秦王；南秦州（现在甘肃成县）城民杀死刺史响应莫折大提，氐族人张长命、韩祖香成了他们的领袖。这一股洪流，从秦岭的西头，冲过陇山，顺着渭水奔流澎湃。

不久，莫折大提病死。他的儿子莫折念生继承他的遗志，自称天子，改元天建；五二四年，攻下岐州，活捉都督元志和刺史裴芬之，办了这两个人的死罪。

第二年，莫折念生攻打泾州，受挫后退去。泾州在高平镇东南、秦州东北，是个军事要地。北魏在这里结集了重兵，泾州刺史崔延伯被统治者吹嘘有“关（羽）、张（飞）之勇”。万俟丑奴继莫折念生之后，在泾州和北魏军激战，杀死崔延伯。这时，正是五二五年初夏，不久，六镇起义失败了。

形势的迅速变化，使怯懦者叛卖变节，氐人吕伯度投降了北魏。同时，起义军内部也需要调整。关陇人民反魏的斗争，在一度沉寂之后，五二七年初又出现高潮。

北魏军在泾州的据点被拔去，镇压起义军的头子象乌龟一样缩进了长安。莫折念生进攻岐州，岐州城民监禁了刺史魏兰根，开门迎接起义军。豳州刺史被打死。叱干麒麟（鲜卑族）和胡弘祖（高车族）分别占领了豳州和北华州，响应莫折念生。接着，起义军攻下潼关，声势大振，人们指望着直捣北魏的巢穴——洛阳了。

北魏派兵夺回潼关，又分化起义军，收买叛徒。五二七年秋，莫折念生和他的全家在秦州被叛徒杜粲杀害。杜粲窃据了秦州，向北魏投降。南秦州也发生叛乱，叛徒辛琛自立为刺史。在岐州被监禁的魏兰根乘机复辟，杀死起义军刺史侯莫陈（姓）仲和（鲜

卑族)。

关陇地区，少数族中有一般民众和酋豪的分别，城民中也有少数的城豪。酋豪和城豪在根本利益上，和北魏统治者是一致的。杜粲、辛琛的叛变，反映了这一情况。

莫折念生死后，万俟丑奴成了关陇起义军的领袖。五二八年，万俟丑奴称天子，年号神兽。第二年，东秦州重新被起义军占领。蜀族在五二四年起义失败之后，也重整旗鼓，起来和压迫者搏斗。

五二八年河北起义失败。不久，尔朱荣派贺拔岳入关，加强对关陇起义的镇压。

五三〇年春，起义军和贺拔岳大战于岐州。战事失利，万俟丑奴在退往高平镇的途中被俘。万俟丑奴的部将万俟道洛辗转西上，率领起义军六千人和莫折念生的部将王庆云（氐族）到达水洛城（现在甘肃庄浪县东南）。水洛城在这一年的初秋陷落，起义群众一万七千人被活埋，他们的家属被当作奴婢分了。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转入低潮。但是秦州和南秦州的城民，旧恨加上新仇，同时起来和叛徒清算血债，叛徒辛琛和骆超（这个人，和杜粲火并，杀死杜粲，依然投靠了北魏）仓皇逃走。这两座州城，最后也终于落入了敌手。

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关陇各族人民，进一步缩小了民族的隔阂，加强了团结，严重地打击了北魏的民族统治和阶级压迫。

二十八　高欢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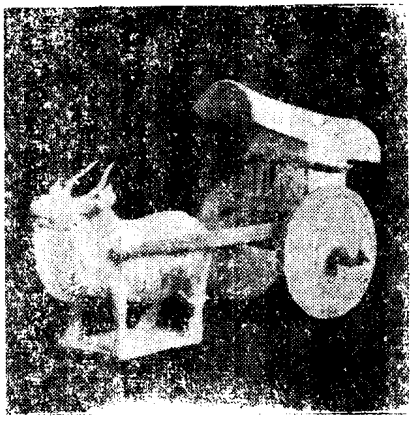
——北齐政权的建立

五二八年，北魏孝明帝和他的母亲胡太后争权，密令在并州

的尔朱荣出兵，胁迫太后交出权力。尔朱荣乘机进兵洛阳，胡太后毒杀孝明帝。尔朱荣打进洛阳，胡太后和文武百官二千多人被他一网打尽，新立的孝庄帝元子攸，成了他手中的傀儡。

尔朱荣是契胡部落的酋长，原住秀容川(现在山西忻县)，世受北魏封号。五二四年六镇起义，秀容川的牧奴也起来暴动，尔朱荣出兵镇压，几年中，收编了北镇被起义军打散的军官和“豪杰”(部落小帅之类)，扩张了势力，成为北魏末一个有实力的军阀。洛阳的统治势力，对尔朱荣恨之入骨。

河北起义失败，被尔朱荣俘虏的起义军战士（主要是六镇流民）经常遭到屠杀，二十万人几乎死了一半。河北的豪强大族，纷纷割据地方，明的别树旗帜，和尔朱荣作对，暗的观望形势，待时而动。



北魏陶牛车俑

尔朱荣在洛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显得不可一世，但政治上却十分孤立。他手下的一员大将高欢，就这样因缘时会，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

高欢，字贺六浑，祖先因为犯罪，徙居怀朔镇。他开始在怀朔镇当队主(小军官)，后来当函使(送公文到洛阳去的小官)。六镇起义后，他投到尔朱荣的部下，为尔朱荣所赏识，说他能担当大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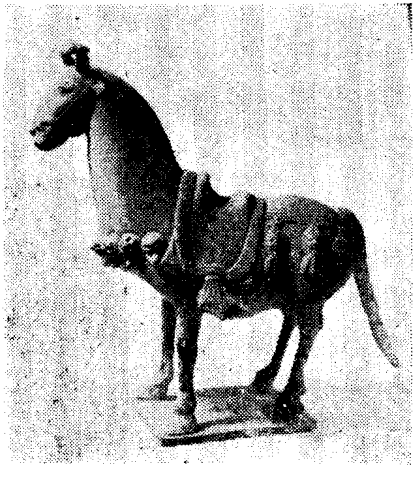
五三〇年，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杀死，他的侄子尔朱兆打到洛阳，吊死孝庄帝，掌握了大权。高欢诱说尔朱兆把统率六镇流民

的权力交给了他。

六镇流民和契胡统治者之间，几年来，仇怨结得很深。高欢利用他和六镇的关系，对这些流民设意笼络。他的妻子娄氏，是鲜卑人；妻姊嫁给段荣，段家是“以豪族徙北边”的；妻妹嫁给窦泰，窦家是个鲜卑留边的贵族；他的姊夫尉景，和他一样也在怀朔镇当过小军官。这些人，和六镇的关系都很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当高欢和尔朱兆狗咬狗的时候，高欢在六镇流民中耍了一点手法，说尔朱兆要把他们配给契胡当部曲，要调他们去打稽胡（住在并州山里的一个少数族）。这样，激起了流民的旧恨，进一步归向高欢，表示愿意服从他的号令，跟着他一道打天下。

对六镇流民，高欢自认是鲜卑人，尽量满足鲜卑贵族的利益，不仅维护他们的特权，还极力排除汉族文化，鲜卑语重新流行起来了。一些汉族士大夫为了求得一官半职，教他们的子女学鲜卑语。这样，高欢得到了鲜卑贵族的支持。对河北大族，高欢自称是渤海高氏的后代。他一到河北，便和这里的大族联络，认大族首领高乾、高昂做本家，称高乾为叔父，叫儿子高澄以孙子礼拜见。他争取这些大族作为支持自己的另一种力量。



北齐陶马俑

鲜卑贵族和河北大族结成了一股力量，高欢依靠这个力量和尔朱兆争夺统治权力。几年后尔朱家

在北方的势力烟消云散，北魏皇帝转成高欢手中的傀儡。

五三四年，为高欢拥立的魏孝武帝元脩对高欢忿忿不平，逃往长安。这时，长安为宇文泰所据。孝武帝出走，增强了长安的声势。高欢感到在政治上吃了亏，屡次请求孝武帝回来；孝武帝不愿意，也不敢回来。这时，北魏在北方统治阶级中，还没有完全失掉号召的力量，元氏的子孙也还能起一些傀儡的作用。高欢不得已，另立了一个元善见做皇帝，称东魏孝静帝，把都城迁往邺城。第二年（五三五年）宇文泰在长安立南阳王元宝矩为西魏文帝，北魏就正式分为东魏和西魏了。

高欢一生戎马，在政治上吸取了尔朱氏失败的教训，也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汉族士大夫留心接纳，对孝静帝表面上很恭谨。但是他最注意的还是军事，他自己住在晋阳（现在山西太原市西南），晋阳成为东魏军事和政治的中心。

高欢以六镇流民为主，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后来，还不断从过去六镇所在的十州之地补充兵员。这些军人依靠汉族农民来养活，骑在汉族民众头上，不断地激化着汉族人民和鲜卑军人之间的矛盾。高欢对鲜卑军人说："汉民是你们的奴婢，男子为你们种地，女子为你们纺织，使你们得到温饱，你们为什么去欺压他们？"他又对汉族民众说："鲜卑是你们的雇客，受你们的粟帛，替你们打仗，你们为什么要仇恨他们？"他企图用这样的两面手法来缓和鲜卑军人和汉族民众之间的矛盾，但矛盾却不能这样解决。表面上，他仿佛是要鲜卑人打仗，汉人生产，实际上，他是用损害汉族民众利益的办法来满足鲜卑贵族的贪欲。

这些鲜卑军人中的头目，贪赃枉法。有一个汉族士大夫杜弼，在高欢面前指斥他们为"内贼"。对待这些内贼，高欢开始是不闻不问，后来不能不问了，但也问得象是蜻蜓点水。他的姊夫尉景贪污，高欢想警告他，叫了一个演员当着自己的面，象做戏

一样，一边剥尉景的衣服，一边说："公剥百姓，我来剥公。"然后高欢对尉景说："以后不要贪污啊！"尉景却指着高欢问道："我比你，谁的家当大？我剥百姓，你却剥到皇帝头上去了！"说高欢剥到皇帝头上去了，这不过是奇谈。鲜卑贵族的贪赃枉法，实际上，是在高欢放任下造成的。高欢曾经自供：既怕鲜卑军人投奔西魏，又怕汉族士大夫归向南朝，因此，只好让他们贪污聚敛，为非作歹。

广大汉族人民和鲜卑统治者的矛盾，在高欢统治的时候，没有得到缓和。北齐建立以后，统治者内部的争夺，更一发不可收拾。

东魏和西魏比较，东魏地方大，人口多，经济也较发达。高欢屡次进攻西魏，却只打成平手。五四六年，高欢率领大军围攻西魏重镇玉壁(现在山西稷山县西南)，苦攻五十天，打不下来，智力交困，气得生病，被迫退兵。五四七年初，高欢病死在晋阳。

二十九　另一个短命王朝

——北齐统治者内部的斗争

高欢死后，他的儿子高澄掌握东魏的大权，想做皇帝没有做成，被奴隶（得自南朝的俘虏，被迫为奴的）刺死。高澄的弟弟高洋（即北齐文宣帝），五五〇年，废掉东魏孝静帝，建立齐朝，史称北齐。北齐存在了二十七年，皇位换了六次，五五七年为北周所灭，是南北朝时期另一个短命的王朝。

北齐统治期间，北魏的"均田制"被破坏；武成帝高湛时，颁布过均田令，但不过一纸空文。原来掌握在北魏政府手里的公田，

这时以赏赐的名义分给了贵族官僚，有的多到一百顷。除了赏赐，兼并也很严重。富豪之家，占有的土地望不到边；编户平民，却连一小块自耕地也没有。农民失去生业，流离迁徙，有的依托豪家，有的为寺院所占，有的迁到远方，在荒僻的土地上，暂时逃避如虎的苛政。“户口租调，十亡六七”。北齐皇帝，残暴荒淫。高洋在邺城曹魏所建的三台宫殿基础上，大兴土木，征发的丁匠达三十多万人。后主高纬营建晋阳宫殿、佛寺，日夜施工，“运石填泉”，无数工匠和畜力在劳役中死去。围绕着晋阳西山大佛像，有一万盏油灯，燃尽了人民的膏血；宫中饲养狗马鸡鹰，不仅吃肉和细粮，还封官给俸，简直是“率兽食人”了！阶级矛盾在北齐十分尖锐，农民起义连绵不断。

北齐统治者内部，也一直是狗咬狗。

北齐政权由鲜卑贵族作主体。过去有人统计，北齐一百十几个将相大臣，鲜卑和鲜卑化的各族人，占了八九十。汉族文官，在这个政权中，处于附从的地位。高洋曾问汉族士大夫杜弼：“治国当用什么人？”杜弼说：“鲜卑人只会骑马坐车，治国当用汉人。”高洋听了，怀恨在心，不久，把杜弼杀了。另一个士大夫高德政，也是因为说了“宜用汉人，除鲜卑”的话而死的。对于自己的儿子，高洋也嫌他得了“汉家性质”，在立为太子之后，还想把他废掉。鲜卑贵族和汉族士大夫，在北魏末期，已经融洽无间，高欢推行鲜卑化政策，这两种人又互相排斥。北齐统治阶级中这两部分人的对立，实际上是北魏末期留边贵族（没有接受汉化的鲜卑军将）和洛阳朝廷（接受了汉化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对立的继续，所不同的，只是留边贵族过去没有权，现在却处在支配地位了。

但实际情况还要复杂一些。出身高门的崔悛把妹妹嫁给高洋的弟弟高济，结婚那天，高洋举杯祝酒，说：“新妇宜男，孝顺富贵。”崔悛说：‘孝顺出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富贵恩由陛下”，

使这对立的两部分人围绕着皇位继承展开剧烈的争夺。北齐皇位的不稳定，又使这种争夺显得特别丑恶。

高洋临死，在妻子面前可怜嗣子年幼，念念不忘有人要夺取他的皇位；并且对弟弟高演（即孝昭帝）说："你要夺皇位就夺，可万万不要杀我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终不免于一死。高演做了皇帝，临终不敢让儿子高百年继位，还嘱咐他的弟弟高湛（武成帝），说孩子无罪，请高湛善为安置，不要走前人的老路（实际上就是走他的老路）。但高百年也终不免于一死。高湛做皇帝，年纪还很轻，却忙着让儿子高纬（后主）做皇帝，自己当太上皇。高氏一门，叔侄相残，兄弟相残，凡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人，都想爬上皇帝的宝座；在宝座上，一方面疑虑重重，一方面却又表现得十分残忍，十分丑恶。

汉族士大夫，得到皇帝欢心，为皇帝尽了犬马之劳，飞黄腾达，但一旦皇帝咽了气，或者变了心，就没有好下场。

北魏末年，有一家姓杨的，一门之内，出了十二个州刺史，七个郡守。其中一个叫杨津的人，官至三公，镇压北魏末年农民起义，双手沾满了农民的鲜血。杨津的儿子杨愔，投到高欢麾下，后来还娶了高欢的女儿。既是士族，又是皇亲的杨愔，受到高洋重用，高洋死了，一意保护高洋的儿子高殷（废帝）。可是高演、高湛却对他恨得要死，在高欢的妻子娄氏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杨愔在一次宴席上被活活打死。高欢遗命可以信托的斛律金和他的儿子斛律光，对杨愔之死，也出了力。娄氏在杨愔死后，流了几滴眼泪，说这个女婿死得可惜；却又狠狠指着高殷的母亲破口大骂，说："我母子怎么能受你这个汉老婆子的摆布！"

高演在搞这场政变之前，经常和王晞密谋，政变成功，要重用这位谋士。王晞却苦苦求退，对人说："谁都想当高官，但高官不好当，皇帝的恩情也难得持久，一旦有变，大祸临头，要抽身

求退，就来不及了。”王晞似乎知道了当时政局的一些消息。

鲜卑贵族，在失去皇帝欢心时，权势越大，也就越不得好死。前面说到过的斛律金，活到八十岁，看到北齐政局无常，告诫儿子要小心谨慎，抱着为子孙担忧的心情死去。斛律氏一家，在北齐非常显赫，有一个女儿当了皇后，两个女儿做了太子妃，三个儿子娶了公主，一门子弟，封侯拜将。这家两个台柱，斛律光和斛律羡，据说一个“声震关西”，一个“威行突厥”。但在后主高纬统治的末年，斛律光和高纬的宠臣穆提婆、祖珽结了怨。后主在位，皇位并不稳固，他的兄弟高俨和叔叔高济都曾觊觎过皇帝的大权，斛律光不能置身于这一漩涡之外。穆提婆和祖珽便打算以造反的罪名加到斛律光身上去。这时，北周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北齐，在军事上，斛律光还是北周的劲敌。北周抓住了这个机会，编造了一个谣言，说：“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暗中派遣间谍，到邺城去传播。祖珽对高纬说：“百升是斛，明月是斛律光的小字。斛律家累世大将，谣言很可注意。”五七二年，高纬便以赐骏马为名，骗斛律光入宫，把他杀了。随后，斛律羡和斛律氏一家，也以谋反的罪名被杀。

北齐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这个政权，既得不到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支持，也使鲜卑贵族犹疑观望，人民更恨之入骨。

北周听到斛律光被杀，曾为之大赦。北齐灭亡，北周还下了褒扬斛律光的命令。

三十 宇文泰父子

——西魏、北周汉化的继续

东魏和西魏对立，东魏强大而西魏弱小；北齐取代东魏，北

周取代西魏以后，北周转弱为强。最后，北周灭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

西魏的实权一直掌握在宇文泰手里。宇文泰，字黑獭，世居武川镇，是个鲜卑化了的匈奴人。六镇起义后，他参加起义军，后来投降尔朱荣；五三〇年跟贺拔岳入关镇压关陇起义，当个部将。五三四年贺拔岳死，他被推为北镇军人的领袖，掌握关中军政大权。这些北镇军人，都是鲜卑人或鲜卑化了的各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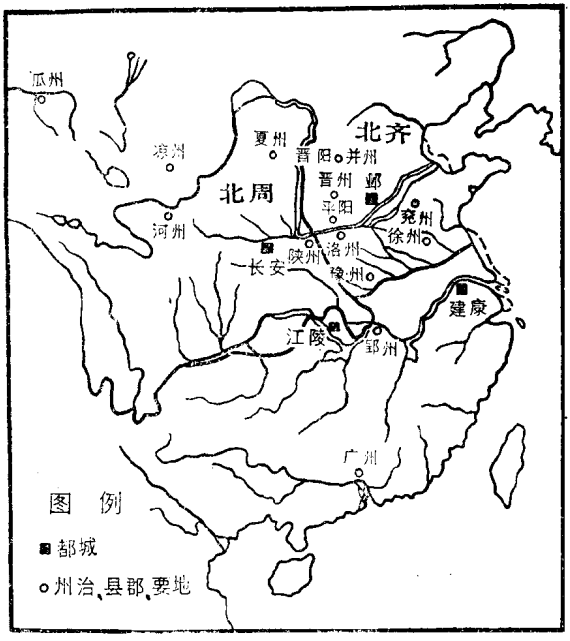
关陇地区经过十多年的战争，满目萧条，岐州是个大州，直到五三九年，户口还不过三千。十六国以来，这里的大族屡次受到摧残，关陇各族人民起义更给了他们严重的打击。他们渴望建立封建秩序，重整家园。和高欢比较，宇文泰的力量比较薄弱。关陇地方势力和宇文泰互相寻找支持，在西魏和北周的史书上，便充满了这些地方势力代表人物以“乡兵”从征的记载，也充满了对这些人在文、武两个方面贡献了才能和力量的颂扬。

宇文泰在关中，以北镇军人为核心，不断吸收汉族大地主参加，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西魏建立，便颁布二十四条新制，后来增加到三十六条，称为“中兴永式”（式就是法）。它的主要内容大略是：严禁贪污、裁减官员、设立正长（正指闾正、族正，长指保长。保、闾、族是地方基层组织的名称）、实行屯田、规定计帐法（预计次年徭役的概数）和户籍法等。

五四一年，关中大族出身的苏绰把汉族统治阶级的经验总结为六条：一清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称为“六条诏书”。宇文泰对这个总结很重视，命令百官熟悉它的内容，还专门设了学校，挑选中下级官吏在夜间到校学习，规定不通晓这个诏书的人，不许当官。

魏孝文帝改革，完全接受魏（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选择官吏只问门第，不论才德。“六条诏书”提出擢贤良一条，认为

门第高不一定能保证有才有德，把才德提到了第一位。这是打破门阀传统的一种新精神，反映了北方士族的没落，也说明了鲜卑族汉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许多通晓“六条诏书”的“贤才”被派作地方官，扩大了宇文泰统治的基础。



北齐、北周对立图

苏绰出身名门，但是他被宇文泰赏识，却并不只是由于门第。他熟悉历史，有一次随宇文泰出游，走过汉代的仓池，宇文泰问仓池的历史，左右都不知道，问到他，他对答如流，从仓池谈到历代的治乱兴亡，谈到现状。宇文泰被苏绰的谈话吸引住了，打消了出游的计划，和他一直谈下去，直到第二天天亮。宇文泰夸奖他，称他为“奇士”。五四六年，苏绰病死，宇文泰非常悼念，问朝廷大臣怎么纪念最好，有个官员说，俭约最可表彰

苏绰的美德。宇文泰接受了这个意见，用一辆布车把苏绰的灵柩载回本乡，亲自步送出郊外。

“六条诏书”始终是西魏和北周施政的纲领。

宇文泰从五三五年杀魏孝武帝，一直到五五六年病死，二十多年中，立过几个傀儡皇帝。五五七年，他的儿子宇文觉夺取西魏皇位，自称天王，建立北周，历史上称为孝闵帝。北周大权掌握在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手里，宇文护立了几个皇帝，杀了几个皇帝。五六〇年宇文邕被立为皇帝。过了十二年，宇文邕一点不动声色，也没有兴师动众，把宇文护杀死。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历史上叫做周武帝。在接受汉族先进文明这一点上，宇文邕胜过了他的父亲。

落后的鲜卑旧俗在宇文泰身上还有着深深的烙痕。比如，五五四年，宇文泰攻破江陵，把俘虏和劫掠来的江南居民一律驱迫为奴，总数有几万；西魏出征的将士，也时常得到奴婢作为赏赐，有的多到一千口。这是鲜卑部落野蛮的遗风，是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时打算改革而没有改彻底的。

周武帝和他父亲不同，从五六五年便开始释放奴婢和杂户为平民，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在消灭北齐之后，把北齐境内的杂户一律放免了。

五七六年，周武帝进军晋阳，经过多次苦战，围困了这座坚城。守城的北齐将领和士兵顽强抵抗，连儿童妇女也参加了战斗。晋阳是高欢和北齐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一个要塞，军将和士兵是六镇的流民以及他们的后裔，和北齐政权有着共同的命运。经过激烈的战斗，晋阳被攻下，北周军东进，势如破竹，邺城不战而降，高纬被俘，北齐灭亡。这是发生在五七七年正月的事。

五七七年八月，周武帝下令释放北齐境内的杂户。这些杂户，自从他们的祖先被北魏征服，为官家当牛马已经一百三四十

年了。接着，周武帝又宣布赦免自五三四年以来，在东西战争和南北战争中被掠为奴婢的人。

这一举动，远远超出了“六条诏书”的范围，被束缚已久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在南北朝历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接着释放杂户和奴婢而来的是“刑书要制”的颁行。“刑书要制”本质上是镇压人民的，也有专门镇压人民的条文。其中规定劫盗财物、隐没户口和土地的人，要办重罪，却主要是针对大族的。当时，大族豪强劫掠财物、隐没户口和土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北齐统治区域内，更为严重。东魏和北齐“富者连畛亘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均田令成为一纸空文。“要制”便规定正、长隐没户口五户和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顷以上的处死刑。

“刑书要制”是“六条诏书”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对整个地主阶级来说，是有利的。周武帝乘战胜之威，用重典来裁抑东方骄恣的地方豪强，这和三国时诸葛亮治蜀有些相同。

统一北方之后，不到两年，周武帝攻打突厥，在途中得病，回到长安就死了，这年才三十六岁。

三十一 府兵制

——中央集权的重建

从西魏大统（西魏文帝年号，五三五到五五一年）到唐朝天宝（唐玄宗年号，七四二到七五五年），府兵制存在了二百年。这是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兵制，西魏和北周是它发展的前期。

府兵制有一套完整的征召人伍的办法、训练管理的办法和指挥作战的办法。统一的指挥和训练，生产和战斗的合一（“兵农合一”），是它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但西魏和北周时并不完全是

这个样子，这一时期只做到了统一的指挥和训练，“兵农合一”是在隋唐时才完成的。

东汉末年以来，地主阶级的武装是分散而不统一的。地方大族豪强拥有部曲私兵，往往和朝廷对抗。每次战乱之后，部曲私兵更如雨后春笋。西魏时，这种武装叫做乡兵。宇文泰占有关西，便碰到了一个和乡兵的关系问题。

宇文泰凭借的武力是由北镇军人组成的，这是一支比高欢力量薄弱、以鲜卑族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当时东面有高欢，南面有梁朝，在三方鼎峙的局面下，宇文泰要在关西立足，便不得不和这些乡兵的首领妥协，实行合作。而这些首领的力量，比起关东和江南来，也相形见绌。这就为他们的妥协、合作提供了便利。在关西，宇文泰实行“均田”、整顿户籍，都比较顺利；成立一支统一的地主阶级的军队，也就比较顺利了。

五四三年以前，不少乡兵首领追随着宇文泰建功立业，李贤、王罴因此确立了他们在本乡的统治地位，担任了本州的地方长官。这一年，邙山大战，宇文泰被高欢打得大败，军事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便进一步号召地方豪强从军，对邙山战役中有功的汉族将领耿令贵、王胡仁、王文达加以表扬，一个赐名豪，一个赐名勇，一个赐名杰，并任命这三个人做雍州、岐州、北雍州三个大州的刺史。

“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在府兵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从此，分散的乡兵逐步纳入了朝廷的军事系统，成了皇家统一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地方豪强武装力量的首领，成了朝廷的军官，“都督”、“帅都督”、“大都督”便是这些人的官号。

宇文泰对于统领乡兵的人选是非常重视的。苏绰的兄弟苏椿本来在别处当官，“广募”之后，特地被调回本乡武功郡担任乡兵的首领。当时要求以所谓“首望”，就是地方上最有势力和声

名的人来统率乡兵，充分说明了这时府兵的性质。

少数族的豪酋，也大量被吸收到军队中来当军官。少数族人民，这时也和汉族人民一样，成了府兵系统中的战士。有个叫韩褒的人，还在少数族中招募穷人当兵，免除他们家里对政府的负担。

北朝陶穿甲骑士俑

五五〇年，西魏更规定从“六户中等以上”多丁的户中挑选身强力壮的人当兵，免除他们的租调和徭役负担。“六户中等以上”的户，是当时的富户。西魏继承北魏实行“均田”，男丁一人受田一百亩，成家的一百四十亩；每年向国家交粟，叫作租；交绢、绵或麻、布，叫作调；根据年成好坏，分别替国家服徭役十天、二十天或三十天。受田户口，按资财多寡分为九等（上三等、中三等、下三等），下三等的叫做贫下户。

从“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到征发富户的壮丁当兵，表明西魏统一的基础扩大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这是宇文泰在武力薄弱和地方贫困的情况下，团结关陇豪强大族的结果，是他在建立府兵中的成功。

但是这个深受落后部族旧习影响的宇文泰，在建立一支统一的地主阶级武装力量时，还不能不沿袭鲜卑古老习俗的传统。

府兵初建，宇文泰仿照鲜卑八个部落的旧传统，设立了八个柱国大将军，来比拟过去的“八部大夫”或“八部帅”。他自己也当了一个柱国大将军，却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名义总领全军，凌驾在其他柱国大将军之上。另外一个由西魏宗室元欣担任的柱国大将军，只有空名，没有实权。

宇文泰还以“魏氏之初，统国（部落）三十六，大姓（氏族）九十九，后多灭绝。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来一个改姓、复姓运动。他模仿过去一个部落即一个生产单位和战斗单位的古制，企图把他所统率的军队用古老氏族的血缘关系团结起来。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是个汉人将领，当到柱国大将军，在这个运动中，改姓了大野氏，照理，他所统率的将领也都改姓大野了。另一个柱国大将军于谨，是魏孝文帝时改姓于的，这时，便恢复鲜卑姓“勿忸于”了。

这种企图恢复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措施，只不过是统一封建地主武装的一件外衣。这时，士兵地位，有了改善，历史书上说府兵在这些有如家长的军将“抚养训导”之下，“有如子弟”。这固然是封建历史学家的美化，但士兵地位比起魏末的“役同厮养（奴隶）”来，确是有了一些变化。

这一支武装力量，起初约有五万。除了宇文泰和元欣，分别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统领。每个柱国大将军各统两个大将军，一个大将军各统两个开府将军，一个开府称为一军，约二千人。开府以下的军官还有仪同、都督等。从柱国大将军到都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指挥、训练系统。

东汉末年以来，封建割据势力，长期占主导地位。宇文泰完成了地主阶级武装力量的统一，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统一还不完全。六个柱国大将军对他们的部属还有特殊的封建权

利，可以“自相督率”，战士的武器和粮饷也由六柱国供给。“自相督率”说的是六个柱国大将军对朝廷还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武器、粮饷由六柱国供给，实际上是说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屯田劳动者的血汗，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用来养兵。

当宇文氏在关陇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宇文泰和他旧日的同僚先后死去或退出政治舞台，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暂趋缓和，人民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从事生产的时候，府兵制也就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变化。

北周取代西魏以后，五七三年，周武帝宇文邕下令改“军士为侍官”，所有士兵都直属于皇帝，府兵成了皇帝的禁卫军，“自相督率”的现象不再存在；又规定凡是设置军府的州郡，府兵就从均田户中加以征发，还定出了优待贫下户的办法。除了当兵的本人得到租调、徭役的免除外，他们的家庭在三年内也可以不交纳租调和服徭役。原来为地方大族所控制的农民，现在直接为朝廷掌握了。这是我国自东汉末年以来的一个大变化。这一点，曹操没有办到，刘裕没有办到，元宏没有办到，宇文邕办到了。时势不同，周武帝成就了他的前人所没有成就的事业。但是周武帝时，兵农还没有合一。这要等到全国统一，在隋文帝杨坚的手上才告完成。

第三章　南朝和北朝的关系

三十二　盱眙之围

——南北的战争

四二〇年，当刘裕在南方建立宋朝的时候，北魏正在兴盛起来。四二三年，北魏乘刘裕死去，占领了宋朝司州的全部，青州、兖州和豫州的大部（这些地方，在现在河南和山东的黄河以南地区），宋朝的边境，退到了淮北。

四三九年，魏太武帝统一北方，是北魏力量最为雄厚的时候。南朝正是宋文帝在位，也还比较富强，南北对峙中，双方在边境上的战争，时断时续。这两个处于全盛时期的王朝，四二三年以后，兵连祸结，近三十年。四五〇年，刘宋、北魏发生大战，打了一年多，打得双方精疲力尽。

这一年春天，魏太武帝率领步骑十万，攻打宋朝的悬瓠城（现在河南上蔡县东），宋将陈宪坚守抵抗，魏军攻城四十二天，伤亡了一万多人，被迫退兵。

这一年夏天，宋军分兵几路，对北魏发动总攻。东路是主力，由王玄谟率领，围攻滑台（现在河南滑县东）。这时，北方民众，苦于北魏的压迫，心向宋朝。宋军北进，老百姓送粮、从军，络绎于路，“日以千数”。

但是王玄谟却以战争为名，图谋私利，从军的人被他配给亲

信的部将，还强迫当地民众一家出一匹布、八百个大梨。宋军攻打滑台，打了几个月打不下来，拖眼到了冬天。

西路军由柳元景率领，经由河南卢氏县北进，一连打下了弘农、陕城和潼关。北魏的守将有的被俘，有的被打死。北进途中，老百姓当向导，民众武装和宋军配合，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四四五年关中盖吴起义失败，关中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也纷纷起兵响应宋军，有的还和柳元景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当宋军发动全线总攻的时候，北魏军却避免决战，滑台久围不下，使北魏军赢得了时间。冬天一到，魏太武帝率领了优势的兵力，号称百万，蜂拥南下。

北魏军过了黄河，王玄谟便一溜烟似地逃跑了。彭城、寿阳这两个前线的重镇同时告警。柳元景的西路军，也奉命撤退，回到了襄阳。

北魏军攻彭城不下，就绕过彭城，长驱南进，一直打到长江的北岸。魏太武帝驻扎在江北的瓜步（现在江苏六合县东南），声言要渡过长江。

从采石（现在安徽当涂县西北）到暨阳（现在江苏江阴县东）六七百里长的江岸，处处望得到烽火。宋军的战船在江上巡逻，建康内外，宣布戒严。

宋文帝在石头城上北望江上的烽烟，又忧虑，又惭愧，对谋士江湛说："假如檀道济还在，就不会有这样的一天！"檀道济原是宋朝的一员大将，四三六年，被宋文帝杀死。消息传到北魏，北魏的统治者很高兴，说："南方无人了。"檀道济临死，也恨恨地骂宋文帝说："乃坏汝万里长城！"现当敌骑压境，宋文帝才想起了这个富有作战经验、通晓军事的将军。的确，从军事方面来说，王玄谟远不及檀道济。但王玄谟是宋文帝的心腹，而

宋文帝在当皇帝的三十年中，无时无地不在担心着皇帝这个宝座被更有力的人夺去！在这一次战争中，连交战的日期和时刻，都要由他下命令决定。宋朝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宋文帝在军事的指挥上，也反映了这个特点。这样，即使檀道济还活着，也不能改变这一次战争中南方的颓势。

北魏军南下时，走到哪里，屠杀到哪里，被掳去作奴婢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各族人民被驱迫当兵，作战时打前阵，鲜卑骑兵在后面驰逐，前进得稍慢，便被踏死。长江以北，广阔的土地被践踏，生命被残害，房屋被焚烧。春天来了，呢喃的燕子也找不到旧窠，只好在树上作巢。北魏军的残暴，更激起人们的抵抗，使长江真成了渡不过的天堑。

四五一年春天来到的时候，魏太武帝不得不撤退了。退兵途中，围攻一个小城盱眙。激战了三十天，盱眙屹然不动。

盱眙在淮河的南岸。当战争还在黄河南岸进行的时候，盱眙太守沈璞因为这里地当冲要，就开始作守城的准备。当时，人们笑他多事，朝廷也认为这样的举动太过分了。战火迅速地往南延烧，驰援彭城的宋军被阻截在盱眙境内，领兵的将军臧质带了七百人退到盱眙城下，请求入城。

城里有人认为让臧质入城，对盱眙不利，说："魏军来攻，城内容纳不了这许多人，不来，用不着这许多人；如果城池得到保全，他们来了，要分去我们的功劳，万一失守，我们要从水路撤退，人多了，船只不够，更要造成混乱，最好是闭门不纳。"对于这种鼠目寸光、极端错误的意见，沈璞作了反驳。他对部下反复揭露了北魏军的残暴，说明了同舟共济的必要，让臧质和人马进了城，一心一意和臧质合作。

当北魏军长驱直入的时候，听说盱眙城内储存了很多粮食，曾经攻过城，没有得逞。魏太武帝从瓜步退兵，再经过这个地

方，又亲自率兵来攻打。他写信向臧质求酒，臧质送了他一坛尿。北魏军疯狂地围攻，盱眙的军民却越战越勇。魏太武帝写信给臧质说，我派去攻城的，都不是我们鲜卑人，你尽量杀吧，杀得越多越好，省得他们将来捣乱。臧质把这封信向北魏军宣布，号召他们掉转矛头，指向北魏军的统帅，宣布能把魏太武帝的头斩下来的，封万户侯，赏布、绢各万匹。

北魏军攻城，被打死的士兵的尸体堆得和城墙一般高，军中疾疫流行，当然，军心也很浮动。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事业、身经百战的魏太武帝，不得不从这座用血肉筑成的坚城之下，狼狈地退去。

盱眙的坚守，说明了南方人民对鲜卑贵族残暴行为的强烈憎恨。

从四五〇年开始的这次南北战争结束了。北魏在太武帝死后，还不时向南朝发动攻势，但它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巩固境内的统治。当魏孝文帝奋发有为的时候，南朝刘宋已为萧齐所代。萧道成父子还不失为他的敌手。魏末，北方各族人民起义，北魏的腐朽统治被打得四分五裂，但继承齐朝的梁朝也没有力量进取中原。

五一四年，梁武帝筑浮山堰，企图阻遏淮水倒灌北魏南边的寿阳城。他征调了二十万人筑堰，土筑不成，改用铁，沉了几千万斤铁器到水底里去；又不成，改用木石，沿淮河一百里内的木料、石块被搜索光了，用木料垒成方框，中填巨石，上面加土，一个方框一个方框沉下去，浮山堰筑成了，死了许多人，耗费了大量物资。五一六年，淮水暴涨，浮山堰天崩地坍似地垮了，淮河两岸的城镇、村庄被冲毁，十多万军民漂流入海，被大水吞没。

南北统治者互相吞并，给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梁武帝筑浮山堰，是最大的灾难之一。

南北统治区域，因战争的胜负，时时在变动。总的情况是，北方强而南方弱，四五一年之后，南朝的力量逐渐由淮北退到淮南，然后到了江北，最后和北朝以长江为界。有一个时期，西魏的势力还扩展到了江南。在西边，南朝也逐渐由现在陕西的南部后退，直到西魏占有全蜀，扼住了长江的咽喉。

三十三　“交聘”和“互市”

——南北的和平往来

南北对立时期，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相互交替。

在和平的日子里，南北“交聘”（互相派遣使臣，进行访问），彼此夸耀政治的清明、文化的昌盛，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斗争。

四八三年，齐朝使臣刘缵到平城去聘问，北魏故意把宫廷藏的金玉珠宝，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价格降得很低。刘缵在北魏“主客令”（负责接待工作的官员）李安世的陪同下逛市场，看到金玉价贱，很想多买些回去，说：“贵朝的金玉这样便宜，想来是本地的出产。”李安世说：“我朝不重金玉，所以贱得和瓦片石块一般。”刘缵听了很惭愧，知道自己失了言。

南北双方都很重视使臣的人选，也很重视接待使臣的官员人选。被选派担任这两方面职务的人，要出身高门，仪表好，善于辞令。象李安世，就是出身于北方第一名门赵郡的李家，他父亲李孝伯，四五〇年宋魏大战，随军南下，被魏太武帝派到彭城和宋军打交道，便以说话得体为南方所重视。李安世本人也是北魏有名的政治家。

北魏末年和梁朝通好，著名文士崔悛当“使主”（使团团

长)。崔悛向朝廷推荐李谐做副使,说李谐善于辞令,比他自己强。李谐生理上本来有些缺陷,稍微有点跛,走路却因而从容不迫;有点口吃,说话却因而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十分清楚。崔悛率领的使团到了建康,受到隆重的接待。梁武帝事先派亲信大臣朱异去了解情况,朱异回来报告说,使团中的人选都是"美才"。梁武帝亲自接见了这个使团,使团告辞,又目送着他们出去。随后,还对大臣们说:"我今天算是碰到了劲敌,你们常说北方没有人才,这些人不是从北方来的么!"他还特别提醒朱异,说北方人才之美,超过了朱异的估计。

战争时期,南北统治者在战场上决胜负;和平时期,则在辩论上斗雌雄。

四九〇年,北魏文明太后死了,齐朝派裴昭明去吊丧。裴昭明想穿朝服去见北魏皇帝,北魏接待使臣的官员不同意,说从来没有穿朝服吊丧的。双方争执了许久,还引经据典,反复进行辩论。后来,裴昭明换掉朝服,见了北魏皇帝。北魏统治者认为这是一次胜利。代表北魏和裴昭明辩论的成淹,因此升了官,受到一百匹绢的赏赐。

四九一年,在裴昭明去北方吊丧之后,李彪到建康回访。齐朝摆酒席、奏乐招待他,李彪辞谢了奏乐,说:"我朝太后死后,皇帝非常哀伤,不敢听乐。"齐朝接待使臣的官员刘绘问他道:"贵朝皇帝这样孝顺,为什么不遵古礼,行三年之丧?"李彪说:"服丧三年,谁来处理国家的大事呢?"刘绘说:"国家大事,不可以交给宰相去办吗?"这一来,倒引起了李彪一番大议论。李彪说:"五帝的时候,臣不如君;三王的时候,君和臣的本领同样高强;三王以后,便君不如臣,国家大事都可由臣下去办。我朝皇帝,和五帝一样的圣明,宰相怎么能代替他啊!"

南北互派使臣,进行着这样一种斗争,在南北士大夫中,产

生了影响。北齐的实际创立者高欢，初建政权时，便很担心梁武帝在北方士大夫当中的影响，说："萧衍这个老头子很讲究礼乐，中原士大夫把他看作是正统所在。"

东魏时，梁朝使臣到达邺城，全城贵族、官员为之轰动。使臣住的地方，人来人往，象市场一样热闹。东魏的使者到了建康，情况也差不多。

南北朝对立，人为地阻碍着南北商业的往来、经济的交流。一些军事上的冲要之处，禁令森严，不准商旅来往、做买卖。

这时候的交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朝廷主持的"互市"，一种是走私。

和平时期，南北互派使臣，有时候便是为了要求"互市"。"互市"的商品，北方需要的是羽毛齿革，南方需要的是供贵族、官僚和皇帝享用的奢侈品，或者是彼此缺乏的物资，例如马，便是南方所缺的。双方使臣往返，也往往买些贵重的东西回去，北方来的使臣，有时还买佛经，这是当时剥削者需要的精神粮食。

但是，"互市"常常因双方关系的破裂而告终。

"互市"之外，比较频繁的交易方式是走私。双方在边境的文武官员，常常利用权力，进行走私，发横财。北魏崔宽在弘农做官，把当地出产的漆、蜡、竹、木运到边境上去换取南货，因而发了财。北齐时，苏琼在徐州当刺史，碰到淮南发生灾害，请求皇帝让人们到淮北去买粮，得到允许。后来淮北缺粮，又允许北人南渡去买粮。南北商货，一时得到流通，水陆运输，一直到了河北。不过这样的事，在南北朝对立的时候，是很少见的。

西晋以来，南北分裂，双方统治者都在打算消灭对方，军事上的攻守提到了第一位，南北交通因而阻塞。这种情况，直到隋朝统一，才得改变。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不仅陆路交通的阻碍

被扫除，大运河的开凿更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十四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南北对立局面的结束

三国时，魏、蜀、吴鼎立。二八〇年，西晋灭吴，统一中国。四百多年以后，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了一首《西塞山怀古》的诗，发出了对东吴灭亡的感叹。“金陵王气黯然收”，是这首诗中的名句。西晋统一，不过五十年，又陷于长时期的分裂。五八九年，隋文帝灭陈，结束了分裂的局面。这句诗也可以借来说明陈朝的灭亡。

东吴末代皇帝孙皓荒淫无耻，是个暴君。陈朝末代皇帝后主陈叔宝和孙皓是一丘之貉。

南朝政权延续了一百多年，到了陈朝，已经气息奄奄了。士族出身的官僚，来自寒门的“佞幸”，个个都腐朽不堪，寻欢作乐、饮酒赋诗，成了他们的专业。

北方的情形好得多。五八一年，隋文帝废掉北周皇帝，建立隋朝。他在北周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把官吏任免的权力集中到吏部；裁并了州郡，废除了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减轻民众负担，兴修了若干水利工程，采取了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杨坚的父亲杨忠，西魏时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后来被封为隋国公。杨家在北周统治集团中，既和鲜卑贵族有很深的关系，又得到汉族地主的拥护。杨坚在杨忠死后继承了爵位，他的女儿是周宣帝宇文赟的皇后。宇文赟是个荒淫狂乱的君主，在位时不得人心，死后，杨坚便以外戚的地位辅佐周宣帝的儿子周静帝宇

文阐，执掌了政权。当杨坚代周称帝的时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挠，这就是由于北周统治集团中汉族地主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而又都归心于他的缘故。

北魏统一北方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汉族和北方各少数族的差别日渐缩小。北方各少数族，在汉族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到了北周末年，在经济生活方面，已经和汉族差不多，语言、风俗、习惯的差异也越来越小。各族人民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命运，渴望着国家的统一。这样，就为隋文帝的统一事业，准备了自西晋末年以来所未有的条件。

在南方，五八三年，陈后主一登上皇帝的宝座，便大兴土木，造了三座楼阁：一座叫“临春”，一座叫“结绮”，一座叫“望仙”。每一座都有几十丈高，拥有大小几十间房屋。门窗栏槛是用名贵的沉香和檀香木做的。装饰着楼阁的有金、玉，有珠、翠。楼阁四周，积石成山，引水为池，种了奇花异草。皇帝自己住临春阁，其他两座，张贵妃占了一座，孔贵嫔和龚贵嫔占了一座。张贵妃名叫张丽华，本来是个兵家女，进了宫，得到皇帝宠爱，常常和皇帝一同决定国家大事。

宫廷的奢侈、享乐，给人民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市税和关税增加了。原来被免除这种负担的军人和士人，这时，也“不问士庶”，一律要交纳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天一天地加剧。

在北方，隋文帝却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提倡节俭。当隋朝的政权还没有稳定，它的北边还时时遭受突厥侵扰的时候，隋文帝向陈朝派遣使臣，重视对南方的和好；有时候，捕获南方的间谍，还给放回。陈宣帝时，南北发生战争；陈宣帝死了，隋朝主动撤兵，还派人到陈朝去吊丧。等到隋朝的政权已经稳定，对突厥用兵屡次获胜，隋文帝便积极策划着灭陈的战争了。

五八七年，隋朝完成了灭陈的准备。一些被朝廷认为有谋略的人，被派到沿边的州郡当官。南方素以水师见长，这时，隋朝的杨素便在长江上游督造战船，木屑头顺着江水东流。但南朝皇帝不见棺材不下泪，依然寻欢作乐。有一个叫章华的人上书陈后主，说："你当了五年皇帝，不知道先人创业的艰难，一味玩女人、喝酒，宗庙祭祀，你不参加，三次册封贵妃，却没有一次缺席；老臣宿将，被你抛得远远的，一些专门奉承你的人，却充斥着朝廷。假如你不改悔，我看马上就要亡国了。"陈后主读了这封上书，章华被办了死罪。

五八八年，隋文帝下令南伐，列举了陈后主二十条罪状。最大的罪状是说他无限制地搜括，搞得民穷财尽，天怒人怨。隋文帝把这二十条大罪状，抄写了三十万份，在江南到处散发。政治上的优势，是属于隋朝的。

在军事上，隋朝也占优势。由杨广（后来的隋炀帝）统率的南下大军，有五十多万；西起巴蜀，东连沧海，同时向南方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陈朝沿长江的守军，纷纷告警。陈后主这个和人民隔绝、和文武百官隔绝的昏君，仍在醉生梦死。他对侍臣说："王气在此，北兵来，没有不失败的。隋军来干什么呢！"有个自称和后主贵嫔孔氏是兄妹的孔范附和他说："对呀，长江是天堑，隋军哪能飞渡？我常恨官位低，隋军要渡江，正是我立功升官的好机会。"有人传言隋军的战马死了，孔范叹息道："这将来是我的马呀，死得可惜！"这真是一幅绝妙的昏君和佞幸的对答图。

但历史是无情的。在隋军的攻势面前，陈朝沿长江的守军纷纷溃散。隋将韩擒虎从采石、贺若弼从京口过了长江。

隋军进到建康城下，城内还有兵十万。但陈后主吓得手足无措，日夜啼泣。建康攻破了，这个昏君带了张贵妃和孔贵嫔躲进

一口枯井里去。隋军在井口喊他，他不敢出声。隋军扬言要把石块扔下去，他才吓得叫喊。最后，他们被隋军用绳子吊了上来。

陈后主，集了地主阶级贪生怕死的大成。他的统治，也集中地表现了这一时期统治者的腐朽，真是一个丑恶的典型。

五八九年，陈朝灭亡。这一年三月，陈后主被迁去长安。

第四章　南北朝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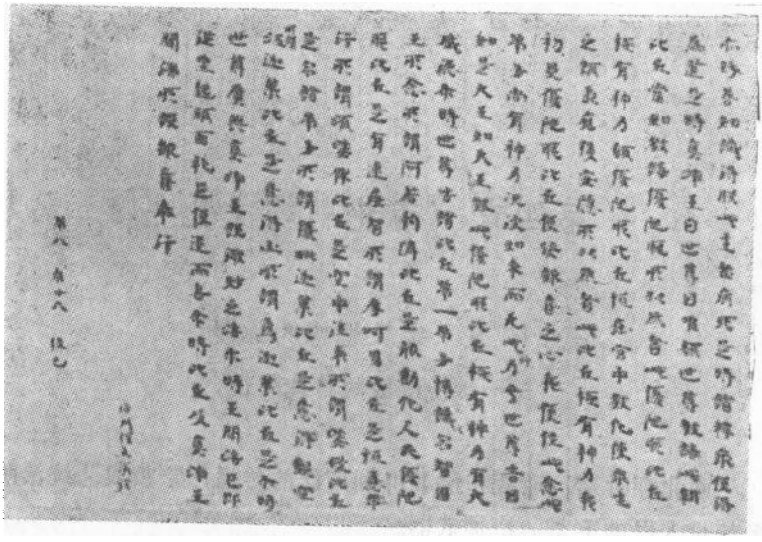
三十五　宗教思想的弥漫

——统治阶级的精神奴役

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宗教成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重要的精神武器。

东汉末年，道教开始成为宗教，老子被当作教主。道教和秦汉以来的神仙家一脉相传。神仙家认为世界上有一种长生不死的仙人，炼丹服食可以成仙。“服食求神仙”，便是这些神仙家的幻想。他们又自称有一种法术可以和“鬼神”交通，为人治病求福。所谓法术，无非符咒之类，这是古老巫师的货色。道教继承了这些衣钵，造作经典，确立礼拜仪式，开始成为宗教。最早的道教经典叫做《太平清领书》，据说，是一个叫于吉的人从“神”那里接受来的。

道教发展的经过十分曲折。东汉张角创立太平道，成为黄巾起义的旗号；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成为张鲁占领汉中的政治理想；东晋孙恩起义，也有很多天师道徒参加。宗教本来是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但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也披上了这件外衣。尽管推动农民走向斗争的是尘世的苦难和压迫，现实的斗争却使宗教分为“邪”、“正”。“邪教”一词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对于农民反抗思想的诅咒。



北朝手写经卷

“邪”“正”的对立，使道教在南北朝被重新改造，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御用宗教。北朝的寇谦之，是改造道教的一个著名人物。他除去“三张（张道陵、张衡、张鲁）伪法”，使道教成为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指北魏太武帝）的武器。

寇谦之是关中的豪族，他的哥哥寇赞之曾经率领关中的民户依附于北魏。他起初隐居嵩山，编了许多道经，扬言是太上老君（老子）授给的；还说，太上老君亲自封他为天师，叫他去辅佐“北方泰平真君”。

四二三年，寇谦之到了平城，向魏太武帝奉献道经。恰好太武帝的宠臣崔浩是个天师道徒，在太武帝面前极力为他吹嘘。两个人一搭一档，一个讲治乱兴亡，一个讲圣王受命，助成了太武帝的“文治”。

寇谦之创立了一个以礼拜的方法为主，吃药、修炼为辅的新道教。魏太武帝把寇谦之的学生也从嵩山接到平城，在平城为他

立了个天师道场，还亲自到道坛受符箓，表示受了天命。以后，北魏皇帝即位，便照例要扮演一次受符箓的仪式。道教在北朝受到了帝王的尊崇。

东晋以来，天师道已经成为士族的宗教。最显赫的高门琅邪王氏，祖祖孙孙都是信奉天师道的。南朝时，道教依然是士族的精神药石。陶弘景作《真诰》，进一步把道教的经典系统化了。陶弘景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后来做了隐士。陶家是个天师道的世家，祖孙父子都是著名的医生，陶弘景在药学和医学方面都有贡献。这些道教徒因为讲究吃药，有些人就成了当时的名医；因为书符写经，有些人就成了著名的书法家。

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非常剧烈，有些士大夫“洁身远祸”，成了隐士。水光山色，使他们流连忘返；炼丹采药，书符写经，也算是一种“闲情”。那些浮沉宦海的人们，精神放荡空虚，醇酒、妇人，加上一种“五石散”，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五石散又名寒食散，是五种药物配成的药方，由魏（曹魏）晋名士吃开头的，据说，吃久了可以转弱为强，可以长生。吃这种药物很麻烦，药性发了（“散发”）要走路（“行散”），走得全身发热之后又发冷；冷时，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有些人，不会服用，被毒死或成为残废。有些人，吃不起这种药，往往路边一躺，假装是“散发”了。妖妄的宗教和腐朽的生活，就这样结合起来。

佛教在汉朝传入我国，创始人瞿昙，相传是净饭王的太子，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号。汉魏（曹魏）的统治者把它当作一种方术来看待，东汉皇帝在宫廷里供奉佛像，叫做“祠祀”，祠祀的目的是求福和长生。长生是秦汉神仙家的幻想，佛教是承认人要死的。佛在汉魏（曹魏）人的心目中变化无端，能大能小，

能圆能方，水不能溺，火不能热，简直象《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这也是由神仙家的幻想而来的比拟。

十六国时期，佛教开始广泛传播。政治上的无边黑暗，人民的深重苦难，为佛教的滋长、蔓延提供了土壤。少数族统治者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极力加以提倡，在佛教传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东晋时，佛学采用玄学的语言，加速了它的发展，广泛地为士大夫所信奉。到了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形成一个高峰。

佛教虚构出一个“未来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立，极力渲染“未来世界”的快乐。任何一个人要进入“未来世界”，便须修功德，立寺、造像、布施财物，并忍受一切尘世的苦难。对于脑满肠肥的人来说，享尽了人世荣华，做尽了人间坏事，只要出些钱，立些寺，造些像，积些功德，便可往生乐土。对于一生贫困的人来说，佛教给了他们渺茫的希望，麻醉他们的精神，使他们顺从剥削者的意志，忍受一切痛苦与凄凉。这些都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所需要的，也是他们极力鼓吹佛教的原因。

这一时期，立寺成风，造像成风，宗教迷信的空气弥漫着人间。佛教成了最大的宗教，南方的建康和北方的洛阳是当时我国佛教两大中心。唐朝诗人描写南方佛教中心佛寺之盛，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际上，梁朝时，建康佛寺多到七百所。同一时期的洛阳，佛寺比建康又几乎多了一倍，大大小小加起来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永宁寺的雄伟壮丽是当时世界上少见的。

佛像和佛寺一样，遍地成林。北朝最大的一尊释迦佛铜像，高达四十三尺，铸造时，用了十万斤铜，六百斤黄金。巍峨的石像，南方有剡溪，北方有云岗。剡溪的石佛，立像高十丈，坐像高五丈。云岗的石佛，高的七丈，次一点的六丈。铜像、石像之

外，还有数不清的泥塑像、玉雕像、金像和银像。北齐邺城一地，佛寺便有四千，造像之多，更可想见了。

佛寺和佛像，在庄严的艺术光彩中，隐藏着富人的贪婪，穷人的酸辛。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无耻与荒淫，一方面是被套上精神枷锁的被压迫者的眼泪。

统治者经常做法会。最大的法会叫做“无遮大会”。法会之外，还做斋。最大的斋，叫做“八关斋”。这些人借法会讲经，宣扬佛理，参加的人有时多到几万。做斋时劝人行善，假惺惺地“不歌不舞”、“过中（午）不食”，连美好的睡眠也被认为是不虔诚的。

梁武帝屡次舍身给同泰寺，表示要当和尚。他不吃肉，不穿绸缎，不接近女人。但他始终高踞着皇帝的宝座，贪恋着人间的权力和尊荣。

佛学在这时也有发展，出现了不少名僧。南朝最有名的佛教学者是竺道生，北朝最有名的是菩提达摩。

竺道生认为“善不受报”，只要充分体会了佛教的道理(“顿悟”),“一阐提”人都可成佛。“一阐提”人，按照佛经的解释，是善性灭尽、不可救药的人，“杀一阐提，无有罪报”。“一阐提”人都能成佛，是个大胆的见解。佛经讲“轮回”，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善的人可以转生为人或入极乐世界，作恶的要堕入地狱或为畜生。“善不受报”是对“轮回”的否定。

竺道生这些论点受到当时卫道者的攻击和毁谤。实际上，“一阐提”人都可成佛，正助长了人们的幻想，为统治阶级消灭人民斗争意志开了方便之门。虚幻的佛国的平等，诱骗人们忘记现实世界等级的森严。当卫道者认识了这一点时，竺道生便受到欢迎了。

竺道生，本姓魏，彭城人，家庭世代当官，幼年出家做和尚，

十五岁便当众讲经。他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在晋末宋初。

菩提达摩在魏末到达洛阳，后来住在嵩山寺，是我国佛学禅宗的始祖。魏末弥漫着贪婪求福的思想，佛教重在做功德，求福佑。菩提达摩提倡断绝一切想念，对这种思想，是一种否定。这种否定，实际上是对佛学的革新。

菩提达摩来自南天竺，也有人说是从波斯来的。南北朝时期，我国和西方（主要指现在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有广泛的文化交流。五世纪时，在西方求法的留学生有六十一人，比隋唐全盛时代还要多五人。佛经的翻译，这时有了一千多部，三千四百三十多卷。南朝最大的一个翻译家是名僧真谛。他是佛教经典的著名译手，和后秦的鸠摩罗什、唐朝的玄奘并称为佛经三大翻译家。

三十六　一个不卖论求官的志士

——范缜和他的《神灭论》

南朝佛教思想流行，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迷信“来生”。佛教宣扬今生信佛，来世便可以托生于富贵人家，最虔诚的还能升登天国“乐土”，永远摆脱人世的烦恼；不信佛，死后就打入地狱，或者变猪、变狗。

皇帝和贵族大力扶植这种思想，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萧衍便是这样的代表。和他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神灭论者范缜。

范缜，字子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齐朝时被萧子良邀请到王府里作宾客，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萧衍、沈约和范云等人。后来萧衍当了梁朝皇帝，沈约、范云成为开国的功臣。范缜在这些人

中间，鹤立鸡群，对流行的宗教谬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有一次，萧子良对范缜说："你不信鬼神，不信因果报应，请问，世界上为什么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有的人享福，有的人受苦？"范缜指着庭前盛开的花树，说："人生就好比这棵树上的花，有些花瓣随风吹到厅堂，落在席上，坐垫上；有些吹进厕所，落到茅坑里。这完全是偶然的，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象您，生在皇家，就如飘落在席上、坐垫上的花；象我，就如落到厕所里的花。"这个生动的比喻，说得萧子良哑口无言。后来，范缜发表《神灭论》，进一步批判佛教思想中的核心——唯心的神灵不灭的谬论，指出信佛的动机，是由于"自私的打算过多，救人的意思太少"；揭露佛教"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夸大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使得"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嗣灭绝"，"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范缜对佛教作了严正的谴责。

《神灭论》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认为人的神（精神）和形（肉体）是互相结合的统一的东西，肉体死了，精神也就随着消灭。肉体和精神的关系，肉体是本质，精神是作用，象刀的锋利是刀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离开了刀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肉体也就没有精神。

《神灭论》的发表激怒了整个的腐朽统治集团。许多佛教徒纷纷写文章责难范缜，但没有一个人拿得出事实证明"鬼神"的存在。有个叫王琰的人搬出儒家尊敬祖宗的教条，妄图难倒范缜，他说："范先生啊！你竟不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哪里！"范缜回答得很妙，说："王先生啊！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哪里，怎么不自杀去追随他们呀！"有个叫王融的人，妄图以利禄来打动范缜，他说："象你这样的美才，还怕做不到中书郎那种

高官，何苦坚持这个议论，阻碍自己的前途呢！”范缜大笑答道：“假如我出卖我的神灭论主张去求官，再大的官也做到了，岂只是一个中书郎呢！”

范缜的骨头是硬的，是当时敢于斗争，坚持真理的一面旗帜。梁武帝统治时期，他在“离经背亲”的罪名下，不许再发表议论，被流放到广州，不屈地死去。

范缜生动地以落花来比喻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但他不知道贫富之分是由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缘故；他看到佛教流行对社会生产所起的破坏作用，对人民的苦难充满了同情，但他不知道佛教的流行正是腐朽士族统治的结果；《神灭论》正确地指出了精神是派生的，坚持了唯物论，但他不认识精神对物质（肉体）的反作用。从主要方面来说，范缜毕竟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浪子”，从士族的营垒中出来，“反戈一击”，成了捍卫古代唯物论的一名战士。《神灭论》也不失为污浊的宗教迷信空气中的一阵清风，以充满了战斗性的无神论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中发着光辉。

三十七　魏太武帝和周武帝的灭佛

——北朝政教冲突

寺院经济和坞壁经济是南北朝封建地主经济的一对双胞胎。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样，占有土地，剥削人民，而且享有士族的特权，不负担租赋和徭役。梁朝寺院蓄养“白徒”、“养女”（没有出家而为寺院服役的男人和女人）。有人上书给梁武帝，说天下户口几乎被寺院占去了一半，这样下去，朝廷如何得了；主张废除“白徒”、“养女”，允许僧尼蓄奴婢。北魏寺院控制的

户口有“僧祇户”和“佛图户”；北魏末年境内有佛寺三万多所，僧尼多到二百万。北齐的佛教更盛，境内有佛寺四万多所，僧尼在二百万以上。北周的佛寺比北齐少些，后来周武帝灭佛，被迫还俗的僧尼也还在一百万以上。

南朝初期，僧侣中已经出现了百万富翁。有个和尚叫竺法海，一次被人劫去财物几百万钱。寺院不仅广占田园，还放高利贷。江陵的长沙寺，贵至黄金，少到一束麻，都可拿去押钱。北朝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贷出二十万钱。僧侣放债，还要地方官为他讨还本息。

在经济上，佛教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势力。

十六国时期，佛教得到一些少数族统治者的扶植，他们认为佛是“胡神”，把佛教当作实行民族压迫的精神武器。汉族传统的思想儒家的经学和道教，也被汉族的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反对少数族统治的刀剑。这就是当时在思想领域内和宗教战线上的“华夷之辨”。

一百多年的“胡”汉斗争，为拓跋部统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北魏的皇帝表示自己是黄帝的子孙，魏太武帝更禁止事奉“胡神”（佛）；周武帝灭佛，更宣称自己不是“五胡”，不怕佛教所说的地狱的痛苦。

“华夷之辨”具有实际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南朝和北朝比较，南朝是汉族的“正统”所在，不发生所谓汉化问题，因而，南朝佛教和儒、道的斗争，仅仅限于教义上的谁是谁非，互相较量长短，来争取君主的荣宠。北朝儒、道、佛的斗争，却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经济原因；斗争的形式，也就以和南朝极不相同的“灭佛”而出现。

魏太武帝的灭佛，一方面在谋求和汉族士大夫的合作，表示他的亲汉；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同寺院争夺剥削对象。周武帝时的

"法难"(是说佛法遭受到打击和禁止),除了"华夷之辨"一层薄薄的轻纱,更为主要的是在经济上摧毁佛教的势力,来增强那个在当时已经中央集权化了的政权。

太武帝以前,北魏皇帝对于佛、道两教,兼收并蓄。太武帝在四三八年规定五十岁以下的和尚要还俗,为朝廷服徭役,供租赋。这就不能不引起皇帝和寺院的冲突。四三九年,北魏灭北凉,北凉崇奉佛教,有许多和尚为北凉守城,城陷之后,三千个和尚被俘。太武帝说,和尚应当修行,现在竟然作"贼",实在可恨,下令一律斩首。后来经人劝说,只罚作苦工,但有不少人中途逃去。四四五年,关中各族人民起义。关中过去是后秦的中心,后秦统治者姚兴崇信佛法,州郡信佛人家,十有八九。这次起义,可能有不少贫苦的教徒参加。前面说过有一次太武帝在长安佛寺中查出大批武器,认为佛教徒和起义领袖盖吴有关系,便把和尚杀光了。

这一切,都促使太武帝和佛教为敌,何况那个红得发紫的天师道徒崔浩在他左右,时时怂恿他和佛教进行斗争。崔浩是汉族士大夫的头面人物,在这以前,已经和道教天师寇谦之一搭一档,在太武帝面前讲治道,使太武帝登坛受了符箓,把道教当作国教了。

四四六年,魏太武帝宣布要杀光和尚,捣毁寺、塔,焚烧佛经、佛像,永远禁绝佛教的流传。

太武帝杀和尚,并不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从北凉来的大和尚释玄高和慧崇,早在四四四年便因参与北魏宫廷争夺政权的阴谋被杀了。同年,北魏宣布不准王公贵族和臣僚私养和尚和巫觋(当时从事迷信职业的人),说这些人"妄生妖孽"。禁止佛教的流传,是这件事的继续。

魏太武帝不可能用行政手段禁绝佛教的流传,事实上,他也

不过是用一种宗教（道教）来代替另一种宗教。他灭佛时，杀了不少和尚。他死了以后，对佛教的禁令取消了。但北魏对出家当和尚，在形式上是始终加以限制的。

周武帝是继魏太武帝之后禁佛的另一个皇帝。也许是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吧，他不杀人，在明令禁止之前，还进行了一场儒、释、道优劣的公开辩论。

这场辩论是由一个叫卫元嵩的人引起的。卫元嵩家在四川，本来也是个和尚。他的老师告诉他“佯狂”（装疯卖傻）可以得名，他便在家乡开始了“佯狂”的活动；后来到了长安，和长安的权贵往来，行动言论装得与众不同。五六七年，卫元嵩上书周武帝，崇道抑佛，他自己也还俗不当和尚了。在他，这也是“佯狂”的表现，但他的话却打中了皇帝的心。卫元嵩说：“应该用建造寺塔的热情来筑城池，把皇帝看成‘如来’（佛）。唐虞（我国传说中的太平盛世）没有寺庙，国家太平；齐梁寺庙很多，却很快地亡了国。”这些话打动了周武帝，卫元嵩从此受到了尊礼。

西魏和北周一直沿着中央集权的道路发展，周武帝时，国力已很强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比较缓和。从卫元嵩上书的那一年开始，周武帝召开了七次大会，让臣僚、和尚、道士辩论儒、道、释的优劣。每次辩论，他都亲自参加。和尚、道士斗争得很剧烈，互相谩骂，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周武帝是袒护道士的。五七四年，周武帝叫双方信徒大会长安，道士辩不过和尚，他便亲自出马，当众批评和尚，说“佛不净”。和尚很不服气，举了道教许多不净的事实，周武帝很不高兴，第二天便下令禁止佛道二教。禁佛是真的，禁道是为了堵住和尚的嘴。禁令中，规定和尚、道士一律还俗，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产。五七七年，灭北齐，周武帝在邺城又宣布禁止佛教。有五百个和尚出席这次宣布禁令的大会，一个个都不敢说话，只有个叫慧远的多次发言，

和周武帝争论，并且吓唬周武帝，说禁佛要堕入地狱。禁令宣布之后十个多月，还俗的和尚任道林上书谏止周武帝毁灭佛法，周武帝说："佛生在外国，我不是'五胡'，一点也不相信它。"后来在北齐境内禁佛，还俗的人有二百万，大大增加了北周朝廷的收入。

佛教的存在，有它的社会原因，想用行政命令消灭它，是不可能的。魏太武帝做不到的，周武帝当然也做不到。周武帝死后，佛教又流行起来。等到隋唐统一，南北朝士族门阀统治在隋末农民战争中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后，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经巩固了，唐朝的皇帝便宣布儒、释、道并存。这三种精神武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都很得力。

三十八　云岗和龙门石窟

——北朝的雕刻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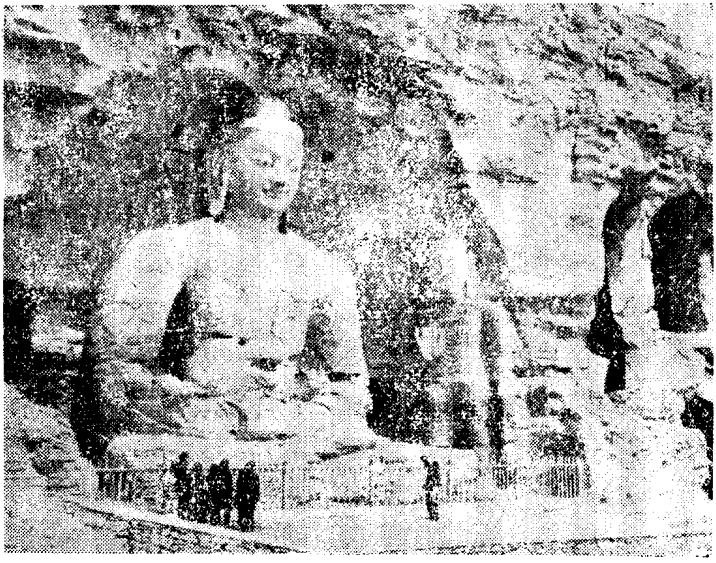
北朝雕刻艺术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明珠，云岗和龙门石窟造像代表了它的最高成就。

现在山西大同市西三十里，有一座武周山，山南断崖峭壁，东西绵亘着一个两里长的石窟群。这就是驰名世界的云岗石窟。大同市过去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是当时我国佛教的一大中心。

云岗石窟保留到现在的洞窟有四十多个，其中较大的二十多个。在现在的编号中，从第十六窟到第二十窟，开凿得最早，称为"昙曜五窟"，是由一个叫昙曜的和尚主持开凿而得名的。开凿工程开始于魏太武帝的儿子文成帝，数以万计的各族人民和雕刻家参加了劳动，文成帝以后，还继续开凿了四十多年。

"昙曜五窟"在石窟群的西头，每一窟都有一尊大佛，有的

站立，有的盘坐，气象庄严雄伟。现在第二十窟的顶和前壁都已倾圮，只剩下一尊“露天大佛”，鼻高、唇薄、目长，耳大垂肩，不象佛经里描写的佛像，也不象汉族人的样子。历史书上说，昙曜建造佛像，为的是替魏道武帝以下的皇帝求“冥福”，这些大佛，大概就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北魏初诸帝的形象。



云岗“露天大佛”石雕像

石窟内部壁上和门楣之间，雕镂着大大小小的佛像、菩萨像、供养人像，大的两三尺，小的不过一寸；有七个佛像并列的叫做“七佛”（释迦和他前世诸身的六佛），有一千个佛像分成整齐的行列的叫做“千体佛”（千体表示释迦的无数化身）。此外，还有伎乐，有飞天（又叫做天人），有奇禽怪兽，有名花异草。有的石像沉思默想，有的俯仰顾盼，一颦一笑，都富于内心的表情。第八窟中有一个口衔小珠的猛禽，半蹲半立，爪趾雄健，形

状有点象孔雀，佛经中叫做“那罗延天”，是古代印度人想象中的灵异。

石窟群中最大的一窟是现在编号的第六窟，开凿在魏孝文帝时。洞口有一座四层的大楼阁，洞内从地面到顶高二十米，中间矗立一个大方塔柱。塔柱的主要部分刻了佛像。佛像的长裳下部翻转飘扬。“昙曜五窟”中佛像的服装紧紧地贴着躯体，和这种宽缓的形象不同。这是鲜卑人进一步汉化的反映。第六窟又是云岗石窟中最壮丽的一个，窟内有十七幅表现佛经故事的浮雕，人物动态和人物与背景的关系明显地表现了借鉴外国之后的汉族传统艺术的风格。现在编号的第五窟中，有一尊大佛是云岗石佛中最大的，高约十八米，脚长大约四点六米，中指长约二点五米。第五、第六两窟，据说是孝文帝为了纪念他的父母而建造的。

云岗石窟的雕刻，虚构了一幅封建统治的和谐图。大佛像高大雄伟，象征着皇帝，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比一个低，环绕着大佛，仿佛为了大佛的存在而存在。自然界的山和水，动物和植物，人世的苦乐悲欢，都一一被理想化了。担负着沉重苦役的“侏儒”（短小、壮健的一种造像），也那么洋溢着欢乐。统治者借助于美妙的宗教艺术，引诱人们忘记现实世界中的苦难，顺从皇帝的意旨，起着“潜移默化”的麻醉作用。这正是北魏在完成了“武功”之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佛教的中心随着南迁，石窟的建造也从武周山移到了洛阳的伊阙。

伊阙在洛阳南面二十五里，伊水自南而北，两岸山崖峭立。西岸是龙门山，东岸是香山。北魏开凿的石窟寺都在龙门山，最著名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

古阳洞是在四九五年开凿的，洞北壁上现在还留下一幅北魏贵族穆亮在这一年写刻的铭记。四九八年，比丘（募化僧）慧成

正式营建古阳洞石窟，造了一尊石佛，为他的父亲求福。洞内布满了许多佛龛，佛龛旁边镌刻着铭记，记录了造像人的姓名和建造的年月与动机。这些铭记是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它的书法为前人所重视，有一部分编成《龙门二十品》，作为学习书法的范本。另一个由一组石窟组成的宾阳洞，五〇〇年开始建造，继续了二十多年。它布局的完整，规模的宏大，雕像的精美，在北魏首屈一指。历史记载说，这个洞窟的开凿，费了八十多万人工。劳动者的血汗，凝成了这些艺术珍品。

《龙门二十品》拓片之一

走近宾阳洞口，便看见一座方坛，坛上有一尊佛像，佛像的两旁有两个罗汉和两个菩萨像。五尊雕像构成一组，成为整个洞窟的中心。佛像的面容清癯，含着亲切近人的微笑。洞壁上布满了浮雕和装饰。浮雕有四层，上层是维摩、文殊对问图，中层是佛前生的故事，下层是帝后礼佛图，最下一层刻着凤、龙、河、树等十个神像。浮雕的明净、柔和与佛像的庄严、厚重构成了奇异的和谐。最精美的《皇后礼佛图》早在抗日战争前，就为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破坏，并盗去陈列在他们的博物馆里。这是帝国主义劫夺中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罪行的铁证。

石窟艺术随佛教传播来到中国，经过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在北魏末年达到了成熟的阶段。石窟艺术的光辉成就，是我国各族艺术家和劳动人民高度的艺术才能和智慧的反映。

三十九　自然科学的发展

——祖冲之对科学技术的贡献

南朝在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祖冲之是最出色的一个。他计算的圆周率数值准确到七位数字，根据现有材料来看，一千年以后，十五世纪阿拉伯的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了他。

祖冲之（生于四二九年，死于五〇〇年），字文远，范阳遒县（现在河北涞源县）人。祖家从范阳南迁，大概是在西晋末年。祖冲之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宋朝做过官，祖父祖昌当大匠卿，是一个管理土木修建工程的官职。祖冲之年轻时爱好天文和数学，通过亲自的观测、计算，常常指出过去文献中在这方面的错误。他在三十三岁那一年，提出“大明历”，纠正了当时通行的何承天制定的“元嘉历”中一些计算上的误差。

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一直误认为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永远吻合，“天周”（恒星年，即地球绕太阳真正公转的一个周期）和“岁周”（回归年，即太阳正射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再回到冬至点的周期）不分。东晋时，虞喜开始测出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有一些差距，太阳并不能回到它一年前的起点。这个差距，天文学上叫做岁差。何承天知道岁差的存在，但是在制定“元嘉历”时，却没有应用岁差的原理。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是已经知道闰年的，但是定闰年还不太精

确。“元嘉历”制定时，凉州的学者已经提出六百年中有二百二十一个闰年的比较精确的意见。但何承天仍然墨守古代的成法，没有接受这一新的科学的成果。

祖冲之应用岁差的原理，精确地算出一个回归年有365.242814811天，比近代科学测量所得的日数，误差不过六十万分之一。在凉州学者计算闰年的基础上，他作了进一步推算，得出三百九十一年中有一百四十四个闰年，测定月亮环行地球一周的日数为27.21223天，比近代科学的测定，相差不到一秒。

但“大明历”提出之后，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与压制。保守派认为天文历法，“非凡夫所测”，“古人制章”是“万代不易”的，把“诬天背经”这顶大帽子加到祖冲之的头上。“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祖冲之是在大明六年（四六二年）提出他的新历来的，所以叫做“大明历”。这个新历，直到五一〇年才被梁朝所采用，这时，祖冲之离开人世已经十年了。

在数学方面，祖冲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成就是很辉煌的，留下来的几个数据，令人惊叹人类巨大的思维能力，虽然他的著作都已失传了。

一个闪耀着思维能力的光辉数据，是他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算出这个数字，需要从六边形算起，一直算到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六边形；运算中，需要把同一程序反复进行十二次，每一程序包括加减乘除和开方等十一个步骤；对九位数字的大数目反复进行包括开方在内的各种运算，需要一百三十次以上。

“密率”$\left(\frac{355}{113}\right)$和“约率”$\left(\frac{22}{7}\right)$是祖冲之留下的用分数表示的圆周率的数据。“密率”近于3.1415929，这是用来表示圆周率最佳的渐近分数。直到一五七三年，德国的鄂图(Valeulinus

Otto）才求得这一数值。

一千四百多年来，祖冲之的科学成就，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唐朝的国立学校，把他的著作《缀术》定为课本，学习期限四年，是最长的课程。日本和朝鲜，在十二世纪时，也把《缀术》作为教科书。现代的日本学者就主张把“密率”改称祖率。因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西方数学史家误认为$\frac{355}{113}$这一数值是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Adriaen Anthoniszoon）首先发明，因而称为安托尼兹率。

除了天文和数学，祖冲之还制造了各种精巧的机械。有一种叫“千里船”，不用人力，在新亭江（现在江苏南京市西门外）行驶，每天能走一百多里。刘裕灭后秦，从长安运来一辆“指南车”，内部机械全损坏了，要用人力才能转动。宋末，萧道成让祖冲之去修理，祖冲之在车内装了一些铜制的机器，机器一开动，车子便转动不已，恢复了指南的性能。据说，这种机械，从三国时马钧以后，就没有人能够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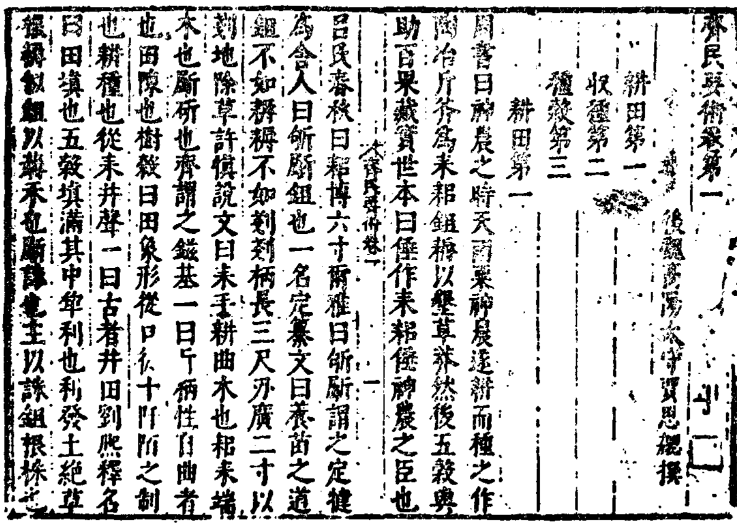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之，幼年传习家学，当他深思入神的时候，连打雷也听不到。有一次在路上行走，撞到大官徐勉身上，徐勉叫了他，才惊觉。祖暅之用立体几何中的一种方法求得圆球的体积，又造铜日圭（测日影用）、漏壶（滴水计时器），都很精密。祖暅之的儿子祖皓，也传家学，擅长历算。侯景作乱，祖皓被杀。自祖昌以来父子相传的科学技术的世家，被覆灭在这次大乱中。

四十　农学的珍贵遗产

——《齐民要术》和它的作者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一部农书。作者贾

思勰，山东益都人，曾经做过北魏的高阳太守。这部书的写作，可能在北魏末东魏初，即公元六世纪三十年代或稍后，距现在已经一千四百多年了。


齊民要術卷第一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耕田第一

收種第二

種穀第三

耕田第一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世本曰倕作耒耜倕神農之臣也呂氏春秋曰耜博六寸爾雅曰斪斸謂之定犍爲舍人曰斪斸鉏也一名定纂文曰養苗之道鉏不如耨耨不如剗剗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剗地除草許慎說文曰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斸斫也齊謂之鎡基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也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從口十阡陌之制也耕種也從耒井聲一曰古者井田劉熙釋名曰田填也五穀填滿其中犂利也利發土絕草根耨似鉏以耨禾也斸誅也主以誅鉏根株也

《齐民要术》（明刻本）

贾思勰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科学家。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研究了前人有关农业的著作，搜集了民谣农谚，访问了有经验的老农，在实际生产斗争中作了细心的观察和比较；从书本知识到调查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放松。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引用的古书有一百五六十种，绝大部分现在都失传了，靠了它才保留下来一鳞半爪；他以农谚为据，对农业生产知识作了生动的说明；向老农请教，更使得这一著作具有丰富深刻的内容。

《齐民要术》全书九十二篇，分为十卷，和当时通行的文体一样，分正文和自注，正文约七万字，自注约四万字。在《齐民

要术》这个题目下，作者也自注了一番。用我们现在的话翻译出来，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人民群众谋生的重要方法”。它包括了农艺、园艺（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林木、畜牧（家禽、家畜的饲养）、养鱼和农产品制造（如酿造、食品加工）及其他农业、手工业等；其中，农艺和园艺占了重要的篇幅。从西周以来，我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在《齐民要术》中，都作了总结性的叙述。

在农作物的种植方面，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就注意了天时和地利，贾思勰进一步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否则，便要象“到泉水里去砍树，到山顶上去捉鱼，只能空手回来”，或者象“逆着风向泼水，从平地往坡上滚球”，用力多而收效少。他正确地提出要按照季节不同、气候不同和土壤特性不同，来进行不同作物的栽培和管理，也就是“看天、看地、看庄稼”。

在“顺天时，量地利”的原则下，他把栽种的时间，按照不同的农作物，分为上、中、下三时。例如，种谷子，二月上旬为上时，三月上旬为中时，四月上旬为下时，等等。他又把地利分为上、中、下三等。例如，谷子以绿豆、小豆为底（即前茬作物）为上；以麻、黍、胡麻为底为中；以芜菁为底为下；而且同一农作物因地力和季节不同，播种量也要随之而不同。

在强调因地、因时制宜的同时，他对土壤的改良和耕作技术（耕、锄等）也十分重视。他提出要经常保持土壤中所含有的适量水分，要增强土壤的肥力，要利用作物吸收养料的不同，进行作物的轮作、间作、混作和套作。他首先总结了耕地的深浅是按不同情况来决定的经验，他说，“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又说，“秋耕欲深，春、夏欲浅”。深耕的好处是可以根除杂草，防止病虫害，又能多吸收水分，疏松土壤，农作物的根扎得深，就能长

得好。这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生产所积累起来的知识，贾思勰总结了这些知识，提出耕地在什么情况下要深，在什么情况下要浅。

贾思勰在耕作技术方面，还有许多极宝贵的经验总结。

在蔬菜栽培方面，他认为应该高度利用土地，生产上要粪大水勤。在果树种植方面，他详细介绍了嫁接法，书中的接枣法和现在河南新郑枣区所用的方法相同。在家畜的饲养方面，他注意了喂料和喂水。他说，喂料喂水，要适合牲畜的特性；做到了这一点，牲畜就没有不肥不壮的。他引用民谣“羸牛劣马寒食（清明节）下”（瘦牛弱马过不了寒食）来说明牲畜过冬，喂不好就要造成死亡。对于肉用家畜，他提倡“阉割法”，这种方法，我们现在还在使用。

《齐民要术》中还介绍了二十多种做酒的方法，详细说明了酿造的过程。食物加工和烹调，这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食物的加工有果酱，有果仁粉，有干果，有蜜拌，等等。

贾思勰的故乡山东，是我国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从西晋末到北魏统一北方的百余年中，这个地区经历了长期的战祸，但劳动人民在坞壁武装自保的情况下，从事生产劳动，为大族豪强提供财富。每一个坞壁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北魏统一北方之后，长期的安定为这种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均田制”实行，自耕农生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农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较大的进展。《齐民要术》反映了这一情况。粮食作物的品种被记录下来的相当丰富，以粟而论，便有八十六种之多。果物有十大类，作者说：“种数既多，不可一一列举。”蔬菜不但品种多，产量也大，有一顷一顷地种的，有一车一车卖的，有的蔬菜种子一收一百石。干椹的收获，“大家”（大地主）多到一百石，收得少的也有几十斛。红蓝花、栀子之类，靠近城市的好田，一年种

一顷，摘花时一天要一百个劳动力，每年收益值绢三百匹。在畜牧业方面，生产规模也不小，以羊为例，一家养羊千口，需要多少喂料，怎么种这些喂料，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

来自塞外的鲜卑人、高车人具有丰富的畜牧知识。《齐民要术》从这些知识中吸取了营养。关于用乳类加工制成酥酪、用羊毛制成毡毯的技术等，显然是这些塞外部族生产经验的总结。

生产斗争为贾思勰的科学活动提供了不尽的源泉。

贾思勰在农学方面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前人。在他以后，我国几部重要的农书，从他那里吸取了重要的养料。但是，南北朝是一个弥漫着宗教迷信思想的时代，贾思勰自己又是一个不小的地主。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使得这部科学巨著好象在黄金中夹杂着沙粒，在光辉里呈现着暗淡；有科学的真理，也有迷信的糟粕。例如，他说，“在东边栽九棵桃树，可以多生子孙”，就是十分荒唐的。他还教人在五谷菜子初熟的时候收购五谷菜子，下种时卖出这些东西，买贱卖贵，乘机进行剥削，也就表现了地主阶级贪婪的本性。

四十一　山水诗和《敕勒歌》

——南北朝的诗歌

唐朝诗人李白的诗里，几次提到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这一句下面，还有一句“园柳变鸣禽”。这两句诗写一个人和自然隔绝已久，忽然置身于明媚的春光中的感受，春天的颜色与声音，仿佛在纸面上浮动。

对于南朝另一个诗人谢朓（玄晖），李白也是很倾倒的，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他唱道：“解道‘澄江净如练’，令

人长忆谢玄晖。”“澄江净如练”是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中的名句，上面还有一句“余霞散成绮”。这两句诗描写春江日暮的风光，用彩色的绮来比喻落日余晖渲染着的缤纷云影，用洁白的练(一种柔软洁白的细绢)来形容江水的平静无波，把人们带入一幅春江日暮的美妙画图中去，心情和景物好象融成了一体。

象这样描写景物的诗，在南朝达到了一个高峰，一般称之为山水诗。山水诗是南朝诗坛的一个特色，作者很不少。山水诗和东晋抽象说理的玄言诗一样，是士族文人的作品，表现了南朝剥削者物质生活的优裕和消极遁世的精神世界。但在艺术技巧方面，山水诗受到后来诗人的重视。杜甫在《解闷十二首》诗中，便以掌握了和谢灵运、谢朓同样高的艺术技巧而自豪，他的“孰（同熟）知二谢将(共)能事(熟练的艺术技巧)”一句，就明白地表示了这一意见。

谢灵运和谢朓都出身于江东第一名门的谢家。谢朓出生的时候，谢灵运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他们在诗坛中的活动，一个在宋初，一个在齐朝。

南朝诗人写诗，欢喜用典故，讲究声律。梁朝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对这表示不满。他认为真正优美的诗歌，都不是堆砌典故的。他在《诗品·序》中举了一些例子来作说明，其中之一，便是谢灵运的“明月照积雪”。他说，“明月照积雪”好得很，难道有什么“经史”的出处么！钟嵘的意见是对的，山水诗中有些好诗，都不是“镕经铸史”而来的。“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是谢灵运《岁暮》中的诗句，和“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等诗句一样，都自然清新。当然这不是说谢灵运做诗不用典故，不雕琢。

谢朓在诗坛活动的时候，南朝诗人讲究声律的风气很盛，用字有许多禁忌。根据汉字的声、韵等等特点，有人提出有八种毛

病（“八病”）要避免，力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谢朓受了这个影响，非常注意诗的音调美。但他并未拘守过于束缚诗人的声律。最脍炙人口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就是他的名句。“识”字和“辨”字把人物内心的感情表达得那么真实，那么富于形象。这两句诗的音节是美的；“寒城一以眺，平楚（平野）正苍然”，在音节方面，简直就是唐诗了。唐朝的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由南朝诗人开了先路。

五言诗从建安(汉献帝年号)以来，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这时候已经成熟。到了唐朝，它便和七言诗共领诗坛，如急管繁弦，吹弹着一个新时代的悲欢。山水诗的作者在艺术技巧上给了唐诗不少借鉴。北朝的民歌，更为唐诗输入了新的血液。

北朝民歌表现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动态，不象山水诗那样狭隘地只是流连于山光水色，表现气候变化引起的士族文人心情的激动。

《敕勒歌》和《木兰辞》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让我们先来读一读《敕勒歌》吧：“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短短的二十七个字，不是把我们带到一幅广阔无边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图画中去了么！北方民族生活的面貌，被那么富有音乐性的有魅力的语言，简洁而丰富地表现出来了。这是具有深厚生活基础的诗人，对于养育着他的土地无比深情的流露，绝不是在书斋、在锦绣丛中讨生活的文人所能达到的。有人说，这是一首用汉语翻译出来的鲜卑诗。纵然是这样，翻译本身也表现了译者对于鲜卑语和汉语的精通，对于塞北风光的熟悉和热爱。否则，是不会这样质朴自然和这样富于语言的魅力的。

数百年来，我国北方各族的融合，为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世

界。诗的风格是刚健的，语言是质朴的，感情是真挚的。

《木兰辞》反映生活的面更广，更深，艺术上的成就也更高。在我国长篇叙事诗中，它和产生于建安年间的《孔雀东南飞》，可以称为“双璧”。

作者在《木兰辞》中出色地塑造了一个女英雄的形象，木兰未必实有其人，形象却十分真实。女子的压倒须眉，也突破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木兰是一个出身于普通家庭中的纯朴姑娘，在一次战争中代父从军。凯旋归来以后，她不要做官，不要赏赐，重新回返家园。和她一同出征的战士，在她回到了父母身边，脱下战时的服装以后，才发现她是个女子！诗人塑造这个形象时，借助于一些细节描写，使人物内心的活动，表现得非常突出、鲜明。当木兰凯旋归来时的一刹那，作者细致地描写了人物的动态：爹娘听说女儿回来了，“出郭相扶将”；妹妹听说姐姐回来了，“当户理红妆”；弟弟呢，“磨刀霍霍向猪羊”，把人民对英雄的热爱，从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中渲染出来。写木兰回到家门，也写得细致、简净：“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打扮起来）。”动作中人物内心的感情，是那样生动，音调是高昂的，思想是质朴的，充满了感染力。

当女英雄在她的伙伴面前出现的时候，作者写道：“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皇。‘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此外，再不说什么了。还用得着再说什么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四句结尾，只不过是歌者充满了诙谐情趣的比喻。

十年的从军生活，作者却写得极概括，只用了六句三十个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但是，通过壮士（包括木兰在内）的英雄

气概所表现的战争的正义性，不是跃然纸上了么！道路漫长而不觉其长；塞上严寒，战士却愈战愈勇；经过百战的将军倒下去了，但战士却一个接着一个上去和敌军搏斗；个人是渺小的，人民群众是不朽的……。简单得好，反而会表现出无比的丰富。

《木兰辞》是人民的集体创作，不是一人、一时写成的；在唐朝，可能还经过加工。唐诗中那些雄浑的，充满了健康气息的诗篇，从北朝的民歌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

清朝有个诗人在写诗方面作过自我批评，他嫌自己的诗“幽燕气”太少，要到冰天雪地里去寻找生活，来弥补这个缺陷。“幽燕气”三字，可以借来譬喻北朝民歌的特色。但“幽燕气”深深植根于人民的生活、斗争当中。从人民生活中吸取清新刚健的思想感情，吸收生动的语言，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北朝民歌的作者是一个榜样。

把《敕勒歌》、《木兰辞》和南朝士族诗人的山水诗来比较一下，山水诗不过是秋风摇落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北朝的民歌却象春天，气象是迥不相同的。

四十二　从《世说新语》到《颜氏家训》

——南北朝几部重要的著作

南北朝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世说新语》、《文心雕龙》、《诗品》、《文选》、《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这几部书，表现了一定的时代特色，代表了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成就。

《世说新语》是宋朝刘义庆编写的，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全面地记载了上起汉末，下迄东晋这一时期士

大夫的言行，揭示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

魏（曹魏）晋以来，士大夫崇尚老（子）、庄（子），饮酒吃药（五石散），生活上不修边幅；平时品评人物，玩弄抽象的名词（“谈玄”），十分讲究语言的艺术，提倡用很少的话表达丰富的意思，往往说得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便是当时人所说的“清谈”。西晋时，清谈的领袖王戎向阮瞻问孔子和老庄的异同，阮瞻只答了三个字：“将无同”。王戎却非常佩服，马上给阮瞻做官。“将”、“无”二字是助词，没有什么意义。对于王戎所提的问题，阮瞻实际上只答了个“同”字，可是在王戎看来，却答得言简而意赅，是清谈的上品。《世说新语》就是这一时期“清谈”的记录，它的文笔也就以简洁著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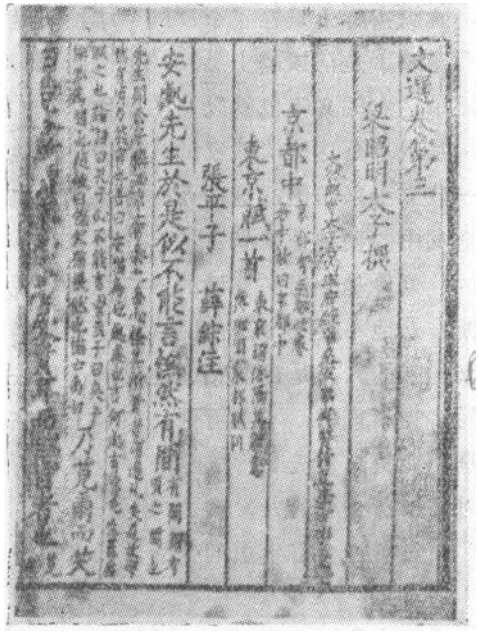
刘义庆是宋朝的贵族，是很羡慕这些清谈家的言行的。当他编写这部书的时候，找了一些文士来帮忙，这些人的思想和他也大致相同。《世说新语》全书中的精神是崇尚自然，一切言行，只要自然，都被认为是好的。刘伶是个出名放诞的人，在家里脱得一丝不挂，有人来访问他，劝他不要那样，他说自己把天地当房屋，房屋当衣服，到他家里来的人，是自愿钻进他的裤子里去的。象这一类的言行，编写者据事直书，不加可否，实际上是在赞美。山简是个大官，做荆州刺史，整天喝得醉醺醺，也被认为是名士的风度。本来，那时候出身士族的人，就是要做名士，“痛饮酒，熟读《离骚》”，过着社会寄生虫的生活，什么事情也不做。

魏（曹魏）晋的名士，喝酒吃药，本来反映了地主阶级贪图享受的腐朽本质。但喝酒这件事，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的身上，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刘伶喝酒是愤世，山简却是玩世。愤世的人，牢骚满腹，“熟读《离骚》”，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派对于政治压制的反抗；玩世的人，“熟读《离骚》”，只说明了

这批剥削者闲得无聊，闷得发慌而已。

《世说新语》这部书，可以使我们了解那时士大夫思想生活的全貌。梁朝刘孝标搜集了四百多种书，为它作了注，补充了一些材料，纠正了一些错误，使得它的内容更加丰富。

魏（曹魏）晋以来的清谈，在南朝接近了尾声，《世说新语》恰好替它作了总结。后来有不少人著书，模仿《世说新语》，但总学不象。社会情况不同了，没有了那时的清谈，这样的书也就不可能再出现。



《文选》（宋刻本）

唐朝以后，有一部在我国流传得最广的文学总集，这就是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编集的《文选》。唐朝大诗人杜甫教儿子“熟精《文选》理”，把它当作文学的教本；赵宋时有人说：“《文选》烂（读得熟），秀才半。”把它当作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因此唐宋（赵宋）以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这部书，日子久了，研究《文选》便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称为“选学”。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选》的影响是很不小的。

萧统是个文学家，勤奋好学，收藏了三万卷书，招集了著名

学者，编选了这一部上起周秦下迄齐梁的文学总集。在当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盛事。我国古代文学，经过建安年间的繁荣，在南朝已经到了总结的阶段，萧统的编选工作，正适应了这一要求。

《文选》这部书选集了我国周秦以来各种不同文体的作品，原分三十卷，后来唐朝李善作注，重新分成六十卷。萧统在《文选》序文里说过，他选文的标准是很严格的，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才得入选。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既要有独到的见解，又要有动人的文采，内容与形式并重。但萧统毕竟摆脱不了当时士族文人重形式的风尚，有一些好诗便被摒于《文选》的门外；当时的民歌，更全部落选了。

比《文选》早一些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总结性的文学评论著作，价值在《文选》之上。作者刘勰，年轻时家里贫困，和名僧僧祐同住了十几年，后来在梁朝当小官，最后出家了，僧名慧地。

刘勰是一个学者，精通儒家的经典和佛学，在文学方面有很卓越的见解，超过了前人，他同时的人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当他完成《文心雕龙》这一巨著时，不过三十三、四岁。

《文心雕龙》几乎涉及了文学中所有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有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是我国自西周以来文学的大总结。

当佛学和玄学盛行的时候，刘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倾向。他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认为文学的变化是由于时代的不同，指出建安文学的“雅好慷慨”，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初步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在文学上形式主义风靡的时代，他赞成“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主张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相反。他不承认有抽象的文学天才，认

为一切好作品，莫不是对事物作了仔细的观察，在表现方法上下了苦功的缘故。

刘勰之后，在封建社会，文论的著作很多，但没有一个作家象刘勰那样严肃而系统地探索过那么多的问题。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著作中，《文心雕龙》不愧为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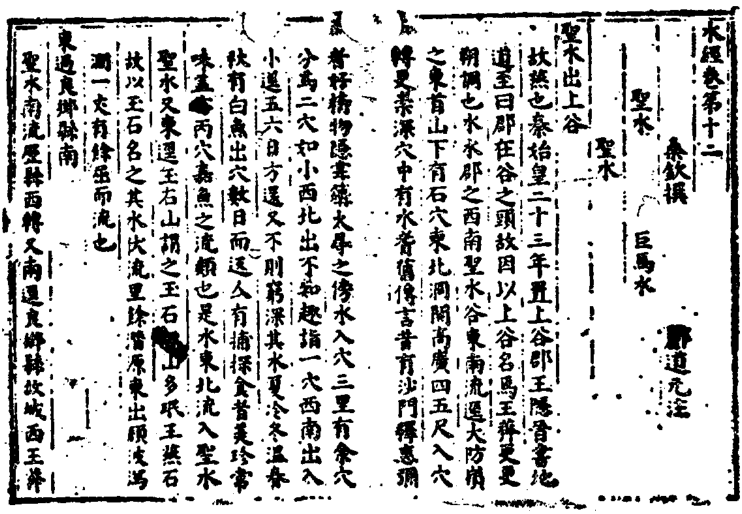
钟嵘的《诗品》，是在《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专门评论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钟嵘在齐、梁时做过小官，对当时文学上的形式主义的风气是很不满意的。他借用了东汉以来品评人物的办法来品评诗歌，对汉魏（曹魏）以来的五言古诗做了总结。被他品评的诗人从两汉到梁朝一共有一百二十二人，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的三十九人，下品的七十二人。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注意探索每个人在风格上的源流派别，指名批判了当时专门讲究用典故和重声律的作家。评语有很多是切中时病和有独到见解的。在反对形式主义的同时，他提出最好的诗，是由于“直寻”（出于自然）而得。

但钟嵘毕竟摆脱不了当时文学上形式主义的影响，当他品评诗人时，往往重词采而忽视思想内容。因此，陶渊明被列入中品，而“甚有悲凉之句”的曹操竟被列到下品中去了。

东汉以后，我国长期分裂。四三九年，北魏统一北方，文化和其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对于祖国的山河形势、历史传说、风土人情有了更多的了解。郦道元的《水经注》在北魏末年出现，不是偶然的。《水经注》是一部地理书，也是一部历史和文学的书。《水经》据说是汉朝桑钦著的，记录了我国一百三十七条水道；郦道元为它作注，水道增加到一千多条，引用书目，多到四百多种，大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

郦道元在北魏末年当过太守、刺史，读了许多书，走了许多

路。在《水经注》中，他搜集了大量的地理、历史的材料，引用了地方流传的神话和传说，歌颂了一些在生产斗争中建立过功勋的人物，谴责了一些对生产起了破坏作用的暴君、污吏，描写了我国美丽富饶的河山。


水經卷第十二
桑欽撰　酈道元注
聖水　巨馬水
聖水
聖水出上谷
故燕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隱晉書地
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更名
朔調也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大防嶺
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尺入穴
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彌
者好精物隱尋窮水穴之傍水入穴三里有餘穴
分為二穴中小西北出不知趣指一穴西南出入
小逕五六日方還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溫春
秋有白魚出穴數日而返人有捕採食者美珍常
味蓋亦丙穴嘉魚之流類也是水東北流入聖水
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
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頹波瀉
澗一丈有餘屈而流也
東過良鄉縣南
聖水南流歷縣西轉又南逕良鄉縣故城西王莽

《水经注》（明抄本）

郦道元的文章写得十分美妙，精采的地方，又象诗，又象画。《江水》篇的注是后世传诵的名篇，写三峡七百里中的山，说“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中午）夜分（半夜），不见曦（太阳）月。”和大诗人屈原的“山峻高以蔽日兮”写得同样真切、美妙；写山间的急流，说“有时朝发（动身）白帝（地名），暮到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不更快）也！”又不禁使人想起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写两岸的猿声，说“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下面再引渔者的歌，说“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仿佛就是出自作者内心的感

叹。

《水经注》使我国学者对于祖国水道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切于实用的；作者文笔的优美，又为实用增添了不少方便。

北魏迁都洛阳，鲜卑贵族日趋腐败。壮丽的佛寺，豪华的邸第，充斥着这座汉魏（曹魏）以来的名城。放荡的贵族生活，使洛阳成为声色犬马征逐的中心。曾几何时，这个曾经统一北方的政权，在各族人起义的冲击中瓦解了。

《洛阳伽蓝记》便产生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作者杨衒之，当洛阳在统治者内部火并中残破以后，重新回到这个曾经是壮丽的故都。他充满了“黍离之悲”，对于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作了刻意的描绘。可贵的不是他绚烂的文采，而是对于北魏末年王公贵族深深的谴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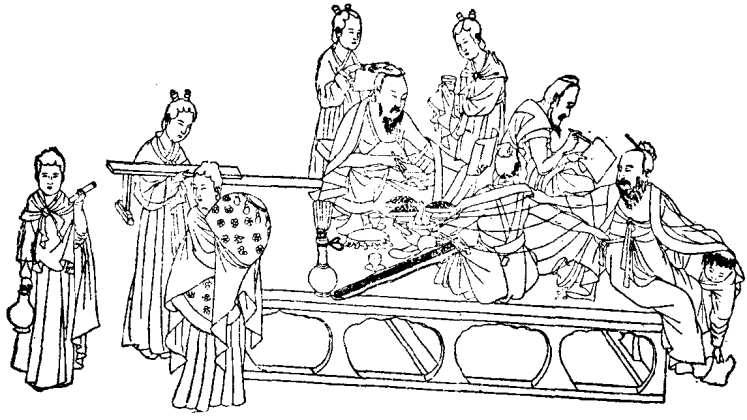
全书展示了洛阳盛时的全貌。帝都的气象，是壮丽而庄严的。永宁寺、景明寺建筑的奇伟，装饰的华丽，写得光彩夺目。以佛寺为中心，作者曲尽地描写了这个城市的百态，北魏末年统治者的腐朽堕落，令人感到惊心！庄严的佛事里，隐现着卑劣的灵魂；包藏在宽袖大袍中的是一些禽兽般的心。

书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活了几百年的隐士，经历了西晋以来的沧桑。这个隐士说，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书，都不是实录。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呢？”隐士说：“有些人活着的时候，本来是很平庸的，死了以后，碑文墓志却把他们捧上天：当皇帝的不是象尧，便是象舜，当大官的不是伊尹，便是皋陶（伊尹和皋陶是儒家经典里一再歌颂的两个宰相）；活着的时候，明明贪婪得象虎狼，死后却被说得和伯夷、叔齐那样，为了讲求‘道义’，宁肯饿死。”作者借了假托的隐士的嘴，辛辣地揭露了剥削者对于历史的伪造。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时流传至今的一部名著，既是史书，又是地理书。它文笔隽秀，叙事简括，又是极为优美的文学著作。

杨衒之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北魏灭亡之后，宗教迷信之风，依然泛滥。他被认为是反对佛教的一人，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也在于使帝王以佞佛为戒。在他看来，“释教虚诞”，祸国殃民。就这一点，在当时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了。

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篇幅不多，只有二十篇。它对于当时各种知识，都有所论述；不少地方，还讲得切实、精到。



北齐校书图（主题部分摹本）

颜之推原来在梁朝做官，侯景之乱，逃往江陵；西魏占领江陵后，回到北方，在北齐担任官职；后来北齐又灭亡了，一生历尽离乱。因此，对南北情况，很是熟悉，而且作了比较研究，发的议论都有事实作根据。

对于北方鲜卑贵族的民族统治，他是很不满的。他说：“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在北齐统治下，汉族士大夫，不想和鲜卑

贵族合作也不可能。有些士大夫，奴颜婢膝，教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以便伺候鲜卑贵人，博得他们的欢喜。对此，颜之推表示了极大的轻蔑，他对自己的儿子说："你们要是这样，即使做到卿相，我也不乐意。"

南北士族，这时候已经腐朽不堪。颜之推在书中讽刺了他们脱离实际的可憎的作风，引了邺城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来刻画这些人的嘴脸；揭露了他们的虚伪无耻，说有的人竟虚伪到用巴豆涂脸，使得脸上生疮，来表示对父母死去的哀伤，好象流了过多的眼泪，泪水渍得脸皮都溃烂成疮了！梁朝不少士大夫，在他的笔下，是一批养尊处优、不学无术、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废物；有个官吏，看见了马，竟畏之如虎，吓得连脸色都变了。

颜之推对两汉"盛世"，十分欣羡尊敬，有着无限的缅怀之情。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自己所目击的一切，正在消逝，他所处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在北周统一之后，他很哀伤，很郁抑。但是他的《颜氏家训》，却成为后来地主阶级教子的课本，广泛地流传在士大夫当中。当然，这部书的全部观点，都是属于封建时代的。

附表一　南朝帝系表

宋

武帝刘裕(1)——少帝义符(2)
　　└文帝义隆(3)——孝武帝骏(4)——前废帝子业(5)
　　　　└明帝彧(6)——后废帝昱(7)
　　　　　　└顺帝准(8)

齐

高帝萧道成(1)——武帝赜(2)……郁林王昭业(3)
　　　　　　　　　└……海陵王昭文(4)
　　└明帝鸾(5)——东昏侯宝卷(6)
　　　　└和帝宝融(7)

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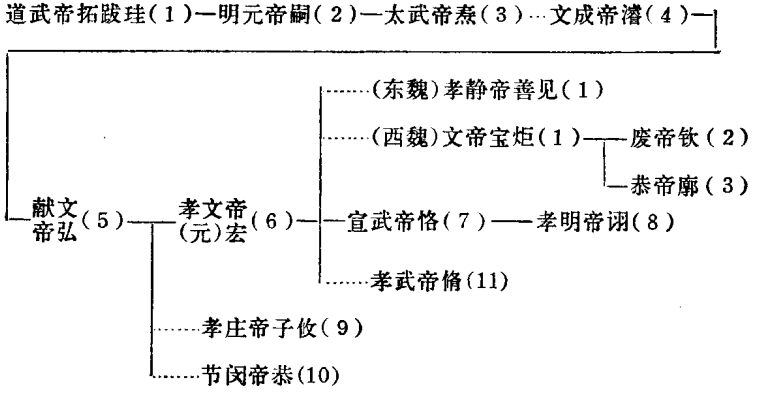
武帝萧衍(1)——简文帝纲(2)
　　└元帝绎(3)——敬帝方智(4)

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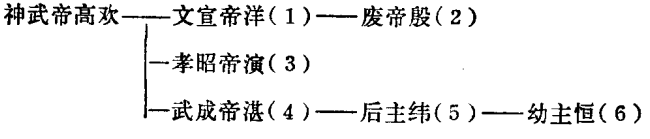
武帝陈霸先(1)——文帝蒨(2)——废帝伯宗(3)
　　└宣帝顼(4)——后主叔宝(5)

附表二　北朝帝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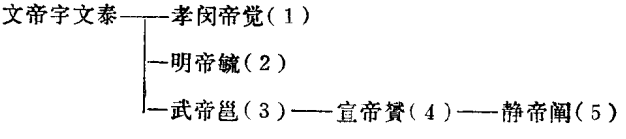
北魏（包括东魏和西魏）



北　齐



北　周



附 表 说 明

1．两表中括号内数字表示帝位次序；未称帝的不计．如北齐的高欢、北周的宇文泰，都是死后追上的称号。

2．两表中的实线，横的表示父子关系，如宋少帝、文帝为宋武帝子，竖的表示兄弟关系，如宋孝武帝、明帝为兄弟；虚线表示祖孙关系，如齐郁林王、海陵王为齐武帝之孙；曲线表示叔伯子侄关系，如陈文帝、宣帝为陈武帝之侄。

3．北魏自孝文帝以下，改姓元氏。

后　记

好久就想为这本小书写一个后记，因为它出版了，因为它得以和读者见面是很不容易的。一九六四年，全书写完，不久又看了全部校样，以为很快可以出版了，但却经过了十五年，才迟迟得以问世。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它的出版是怎样的艰难！

知道它可以出版，是在一九七七年初，北京出版社的同志要我对它作一些修改。这一年的九月，我到了北京，住在周游同志家里，开始改书。周游同志是建议我写这一本书的人。另一位促成我写这一本书的就是吴晗同志，可是，我在北京再也见不着他了。在北京住了五十天，往往独立窗前，对着蓝天，充满了对他的怀念。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细雨，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他的五言律诗：

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
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
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
劳人还草草，憔悴待春归。

诗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但在当时，也还不敢轻易示人。现在是春天了，形势大好。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呈现着欣欣的生意。可是在我写这首五律时，我的感情还是很抑郁的。遗札指的是一九五〇年夏季吴晗同志给我的一封劝我认真学习马列，而不要在大学里担任马列名著讲授的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而我那时却自以为是懂得马列主义的。这封信，当然也和其他几封信一样，被当作我的罪证，从我家里搜去，不知下落了。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尽可能想给读者以正确的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的，也尽可能利用我在青年时代学习过写作的一些知识，把它写得具体、生动。写完了南朝，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同志很快便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我："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我想你不会反对。"后来这一部分印了出来，在北京讨论过，出版社还把讨论的大致内容寄给我了。写作过程中，我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他都明确地表示了意见。

我是个有点孤僻的人。平生有限的几位师友，吴晗同志是其中的一个。在昆明时，我常去看望他，分别之后，又还通信，虽然不多。姚文痞对他的《海瑞罢官》，深文周纳，极尽诬陷的能事，造成冤狱，株连所及，远逾封建时代的"十族"之诛。多少年来，我在梦里见到他，似乎他仍在西仓坡那一间挂着闻一多先生篆书条幅的小屋，横眉怒斥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我在受林彪、"四人帮"折磨的时候，也想到他在受林彪、"四人帮"折磨……。一九七四年中秋，我知道他死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直到今天看到黎澍同志的文章，才确知他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病死在北京的狱中，距离一九七七年十月我去他家看望他的遗孤，翻阅劫余的他的藏书，已经八年了。

这本书终于出版了，死者有知，是会高兴的。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还应当在我的晚年为我国史学作出一点什么来。这个短短的后记，对死者是纪念，对生者则应当是鞭策。

程应镠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南北朝史话
作者=程应镠
页数=166
SS号=10114006
出版日期=